

南 華 大 學
建築與景觀學系環境藝術碩士班
碩 士 學 位 論 文

A THESIS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PROGRAM IN
ENVIRONMENTAL ARTS,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AND LANDSCAPE DESIGN, NANHUA UNIVERSITY



嘉義縣番路鄉公興村
生活場域轉變與離散認同關係之研究
The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fe field and diasporic identity
of Gongxing Village, Fanlu Township, Chiayi County

研 究 生：林耿暉

指 導 教 授：陳惠民 博士

GRADUATE STUDENT : Ken-hui Lin

ADVISOR : Hui-min Chen

中 華 民 國 一 〇 一 年 六 月

南 華 大 學
建築與景觀學系環境藝術碩士班
碩 士 學 位 論 文

嘉義縣番路鄉公興村
生活場域轉變與離散認同關係之研究
The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fe field and diasporic identity
of Gongxing Village, Fanlu Township, Chiayi County.

研究生：林耿暉

經考試合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

曾旭正
陳惠民
魏光慈

指導教授：陳惠民

系主任(所長)：陳正宏

口試日期：中華民國 101 年 6 月 15 日

本文獻給愛我及我愛的人

南華大學建築與景觀學系環境藝術碩士班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碩士論文摘要

論文題目：嘉義縣番路鄉公興村生活場域轉移與離散認同關係之研究

研究生：林耿暉

指導教授：陳惠民 博士

論文摘要內容：

本文以嘉義縣番路鄉公興村為研究場域，試圖透過解析現代性的時空性質轉變、現代化及社會、經濟轉變過程中，公興村民離開原鄉流移而後歸返原鄉，其生活場域轉移與離散認同之關係；論證公興村民與社會、經濟變遷的再結構所造成生活場域的轉變，實是地方居民以抵抗與歸返的方式，展現面對心理上不安定時，具自主性調適的能力；村民以原鄉為基礎，尋找適合於現代的「定居」型態。另一方面，公興村民在時空流變性提高與資本社會經濟結構的影響下，認同並未與原生活場域斷裂；而是具有脈絡性的持續流變，傳承、延續著地方文化與認同。此觀點有別於國內時下社會的主流論述，具鄉愁性的詮釋城鄉變遷現象，其與文化理論發展脫節的實踐論述。筆者欲透過本文在國內城鄉發展長期處於二元式論述的對立狀況下，試圖提出不同論述方向的可能性。

本文首先回顧現代性對近代論述觀點的影響，而後回顧近代認同理論由固著的地方感到離散認同的論述發展與辯證過程，以建立本基礎論述觀點。另一方面，國內城鄉聚落研究，大多視鄉村主體的流移為單次性的移動現象，而缺乏將流變性作為先驗的理論概念之認知；本文則試圖導入離散認同的概念，運用至探討城鄉關係、空間的研究範疇之內，以突破筆者以往自身對城鄉、空間的論述禁錮。

關鍵字：生活場域、離散認同、遷移/定居、城鄉關係、公興村

目 錄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緣起－普遍的鄉愁與二元式城鄉論述.....	1
第二節	問題與假設－認同危機是否存在以及認同斷裂與否.....	3
第三節	研究方法.....	5
第四節	研究場域與對象－鄰近嘉義市的山地農村.....	9
第二章	理論及文獻回顧與探討.....	15
第一節	現代性具流變特徵的影響－時空定義轉變的論述生產與實踐.....	15
第二節	認同的論述發展與性質－由固著到流變.....	27
第三節	定居、遷移與離散－人口學與離散觀點的差異.....	39
第四節	台灣近代認同、地方論述以及城鄉發展研究的觀點 －論述發展與地方研究觀點的斷層.....	48
第五節	小結－認同的流變性質與國內社會實踐論述的矛盾.....	55
第三章	公興村民生活場域的轉移過程－外移與歸返.....	57
第一節	公興村在台灣現代化、經濟轉型過程的地方狀況－城鄉不均衡發展... ..	57
第二節	公興村民向外流動、轉移生活場域－公興無法維持生活.....	64
第三節	公興村民的歸返－公興產業興起及生活場域擴張.....	74
第四節	歸返後的持續轉移－時空性質與社經結構轉變後的地方「定居」調適.....	79
第五節	小結－時空流變性提高、移動能力增加的生活場域轉變過程.....	88
第四章	公興村民生活場域轉移過程中的離散認同狀態.....	92
第一節	流移過程認同的離散狀態.....	92
第二節	生活場域轉移過程的認同轉變狀況 －離散的認同再生產與文化傳承.....	95
第三節	計畫性認同的支配力量－認同自主性的壓抑.....	108
第四節	城鄉的相互依賴關係－時空性質轉變下新的認同、文化與聚落樣貌.....	121
第五章	結論－時代性文化、社會自主的平衡力量.....	125

圖、表目錄

圖表 1：多重辯證示意圖.....	5
圖表 2：內外辯證力量示意圖.....	6
圖表 3：暫時性研究架構.....	7
圖表 4：嘉義縣番路鄉行政區域圖.....	9
圖表 5：公興村聚落圖.....	11
圖表 6：公興活動中心.....	12
圖表 7：公興衛生所.....	12
圖表 8：嘉義市、番路鄉、中埔鄉交通關係圖.....	13
圖表 9：訪談對象列表.....	14
圖表 10：現代性的多義性與多重向度.....	16
圖表 11：現代性進程的歷史分期及核心特徵.....	17
圖表 12：中國近代空間縮短形勢圖.....	20
圖表 13：通過時間消滅空間在交通方面之發明的世界縮略地圖.....	21
圖表 14：認同論述發展脈絡.....	30
圖表 15：Heidegger 對建造與定居的解釋.....	39
圖表 16：公興村歷年人口.....	69
圖表 17：公興村及其周邊聚落教育資源位置圖.....	72
圖表 18：居住區位與公興、嘉義市、道路關係圖.....	83
圖表 19：移動場域階段圖.....	90
圖表 20：居民聚會空間.....	100
圖表 21：居民聚會空間.....	100
圖表 22：日常移動場域與認同空間關係圖.....	106
圖表 23：支配型鄉愁介入後的認同場域變化.....	118
圖表 24：生活場域擴大與文化、認同互動場域示意圖.....	123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緣起－普遍的鄉愁與二元式城鄉論述

1.1.1 恆常的流變與鄉愁

人存在於世，是藉由開拓、群居、構築、生產等持續的活動，達到自身想像的、所認同的生活樣貌；並在不同的時空階段持續的活動與構築，社會、文化、體制等人類文明的型態也隨之改變，是處於不斷更迭的狀態之中。而人身處流動的時間過程中，是以過往所經驗的記憶與情感做為基礎，實踐、開展出新的文化樣貌；謹記著過往記憶、帶著鄉愁而前進。即便處於獨立而隔絕的部落中，仍是在不斷逝去的時間中，不斷推進文化與社會的流變。

1.1.2 現代在經驗上與傳統的差異－傳統與現代的分野

現代化、科技、資訊等技術發展，使人在空間上的移動、資訊傳播的狀況、在流動變化的性質上比傳統更加提高快速。因此，原本即處於持續移動、變化狀態的環境、社會、文化，產生更劇烈的變化。儘管變化是必然存在的，但現代與傳統狀態相比之下，在心理、精神等層面所被感受的經驗有極大差異，使其認為傳統的樣貌是恆定而穩固；現代是片段、流變、轉瞬即逝的。經驗上的差異，也使得人常將歷史時期區分為兩者、前與後，認為現代與傳統是決裂的。

1.1.3 時空流變性提高造成的不安－鄉愁式的論述生產及實踐策略

此差異強化了社會與文化中鄉愁的成分。時空性質轉變使現代與傳統之間出現疏離、無法維持原本物質樣貌的狀態，人在心理、精神上也無法再依賴過往的形式獲得存有與生活的安定感；時空性質轉變的過渡期中，未能及時適應時空流變性的劇烈提高，因而處在不安定、無安全感的心理感受之中；人需要尋求新的安定與存有的方式，重新建構、界定各自所屬的生活場域。促成了近代城鄉聚落、社經文化樣貌的劇烈轉變。換言之，人類即是在不斷的面對不安、遭遇變化的處境中，不斷促使文化、社會的推進與轉型，以定居於世作為恆定的目標。

另一方面，在現代心理、精神層面上的不安感擴大下，國家、社會同時也會尋求重返安定的方法。個人在既有社會結構的規範與框架下，尋求獲得安定的方式；而具有權力、社會行動力量的組織、機構單位，則將以更具計畫性的實踐力量來界定自身的樣貌；試圖提供一套具體、迅速、直接的方式，達到社會的安定與鞏固支配正當性的目的。不安定感因與過去快速的疏離而劇增，重返安定則寄託於鄉愁式的實踐；不安帶領了人步入歸返安定的路途，而論述、知識、計畫與

制度則是在過程中所必然生產的。如同戰爭與抵抗必然是具有意圖性計畫策動群體的實踐所促成，個體無法脫離其中生產明確的實踐意圖，因而向國家與社會尋求實踐的正當性動機與實行方法，是為不斷在不安與安定中流移的循環。

1.1.4 流變的不安是一種日常狀態

現代時空的流動性，將世界文化、政治、社會、物質、經濟等層面連結，即全球化現象。單一群體的變動可能即影響多數的群體，流變所產生的不安定將成為日常性的狀態；若持續訴諸於歸返過去的樣貌，將使人群失去面對威脅而調適的能力，無法在不斷推進、變遷的結構中尋求新的寄託。應該安定於流變，而不是在流變中試圖維持已逝去、不合時宜的樣貌。在現代時空流動性不斷提高的狀態下，個人、社會、文化在未來將持續處於流變與不安定的情境中。

第二節 問題與假設－認同危機是否存在以及認同斷裂與否

1.2.1 生活型態變遷－生產與居住空間距離擴大

若由上述觀點來看，現代性過程與地方文化、社會與經濟等層面的辯證，促成了城鄉聚落、社會、文化的變遷，即是人在流變當中，試圖在其中持續尋求安定的方式而造成物質性或形而上的轉變。也是人在恆常的流變之中，不斷藉由此實踐而對時間與空間的再詮釋與重新定義。

本研究觀察嘉義縣番路鄉山區農村－公興村，其居民的生活場域與移動型態之狀況。發現公興村民的生產活動空間仍在公興村原本的生活場域之中，但村民所居住的場所並不在公興村之內，而是向外遷移、處於靠近嘉義市的周邊區域。相較於傳統的生活場域樣貌，居住場所的改變擴大了日常生活移動的範圍，日常性的頻繁往返兩地是公興村目前的日常生活型態，生活場域也在此種流動的狀態下而擴大。

1.2.2 城鄉發展觀點的二元辯證－文化特殊性與經濟同一性

此現象以上述觀點來看，是為地方為與現代結構接合所做出的調適。而國內城鄉發展策略與論述，則有幾種觀點。首先為將此變遷現象視為城鄉差距，認為鄉村在交通、公共建設等資源發展落後，而欲以提升鄉村生活機能、並促進鄉村經濟發展的發展主義觀點。

其次為認為發展主義與資本主義注重經濟價值轉換與硬體的開發，並欲以都市發展角度建設鄉村的作法，是將鄉村視為一種都市的附庸之地，無視於鄉村與都市兩者文化、環境上根本性質的不同、忽略鄉村文化、傳統的特殊性與延續性；認為資本主義對於鄉村資源的掠奪，破壞了地方文化的脈絡，導致人與空間在認同上、地方感的喪失。發展主義與資本主義下對鄉村策略的失敗，而造成鄉村人口外流等危機。

而後則出現以注重鄉村永續發展、注重地方文化特色、維護鄉村自然環境的新都市主義。此觀點以鄉村文化為主，試圖利用鄉村環境，思考能將其轉換為資本經濟價值的策略，如觀光休閒農場、地方傳統文化體驗、深度文化之旅等類型，即是欲透過轉換鄉村資源至得以與市場經濟結構接合的方式，延續鄉村、農村的活動與文化。而此觀點背後則隱述了地方經濟的維持，即是鄉村得以持續發展、運作的關鍵。此為過去發展主義下，鄉村經濟價值轉換失敗後，並藉由對發展主義的批判聲浪，進而改進策略而衍生出的觀點；一方面注重文化特殊性，一方面以其作為經濟市場，積極將鄉村資源轉換、與資本結構結合。

然而，上述活絡鄉村經濟的方法與策略，同樣面臨其他觀點的批判聲浪。其

認為在資本消費邏輯之下，上述鄉村經濟策略造成鄉村居民與地方文化脈絡的疏離。將自身文化作為經濟收入方式，成為消費文化。而諸多以後現代方式呈現出來的文化經濟，其特殊性在大量複製、傳播、製造，以及資本流動的滲透下，消弭了文化真正的存在方式與價值。除了成為財團收囊利益的工具之外，其宣稱創造鄉村經濟、解決鄉村危機的願景，也未盡確實的對鄉村帶來經濟收入。而認為該由更深層的地方文化、生活脈絡之中，思考更符合貼近地方的發展策略。

1.2.3 城鄉變遷是認同與地域的斷裂，或是文化自主性的調適與延續？

上述對城鄉發展的觀點，以二元對立的方式進行辯證。一方為經濟、發展主義的擴張與進程；另一方對其擴張、滲透後所造成的變遷提出批判，認為地方文化、歷史脈絡應該被延續，重視人與自身文化的連結。本文則認為，此兩種觀點所實踐的策略，在上文時空流變性提升的現代性狀況下，皆具有造成地方文化、社會、經濟等結構產生普同性與差異性的結果。資訊、交通技術進步，得以使資本、國家、社團組織等各種力量，在時空流動、滲透的效率提升。在此結構之下，方能達到上述兩者的策略執行與實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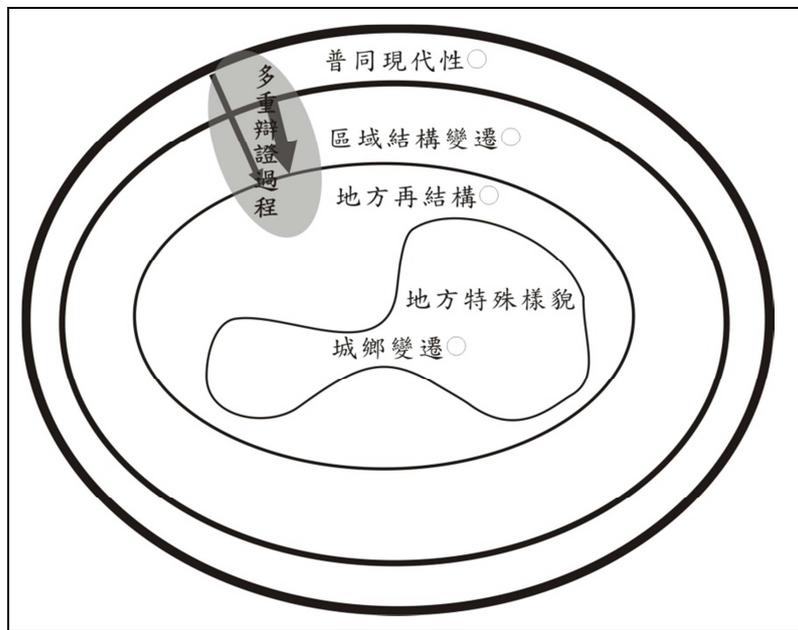
那麼上述對於城鄉、社會、文化變遷發展的觀點何來之有？究竟是現代性狀況所促成的社會、文化變遷背後所體現的是文化、認同上的斷裂？抑或是人為適應、合乎新的時代中的生活規範與價值，而激起自我調適、修補的能力？本文以此作為研究發問，尋找是否有不同與上述二元對立觀點的論述方式。透過建構公興村生活場域的變遷過程，探討認同在其中的轉變狀況與運作方式，以及不同於當前國內城鄉發展的論述觀點。

第三節 研究方法

1.3.1 內外辯證式生活型態、地方變遷過程建構

地方與經濟、社會結構的持續辯證，促使地方的變遷，其文化、地景樣貌則是人群的生活實踐所建構，因此透過生活內容與方式的轉變即呈現出不同的文化與地景樣貌。另一方面，生活場域是人持續在一空間中移動與活動，滿足了自身生活中的需求而開展；而為得以在持續轉變的社會中生活，生活場域的一棟則是持續的。

然而各個地方與社會、經濟再結構後所呈現的樣貌也各自不同，即是各個地方具有不同的特殊之處，而造成在地方在現代性的過程中呈現出不同的樣貌。而此為時空中一具有複雜層次的多重辯證過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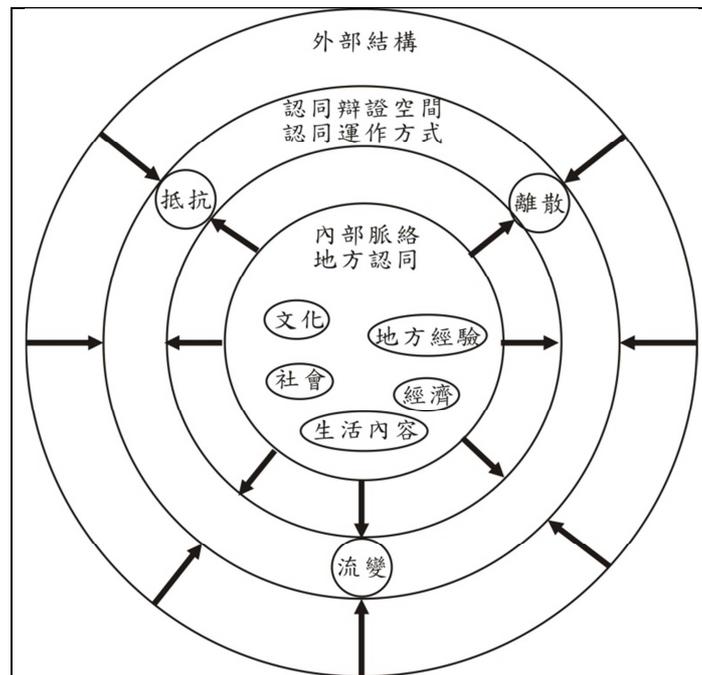


圖表 1：多重辯證示意圖

因此，若欲建構影響公興村生活型態變遷的因素，則需理解外部結構對於地方內部影響的範疇、方式為何，盡可能的理解並貼近地方的狀況，以提高研究書寫與實際現象的真實性。本文欲先回顧台灣遭遇現代性，其現代化、經濟策略的發展過程；該過程與公興村內地方的經濟、資源、建設等變遷狀況之關係為何？透過此研究的態度與方法，探究促成公興村居民移動、生活場域轉變的脈絡與因素。而之後進而探討移動、生活場域轉變與認同的運作、流變關係。

1.3.2 以離散論述解釋認同與生活場域轉變之間的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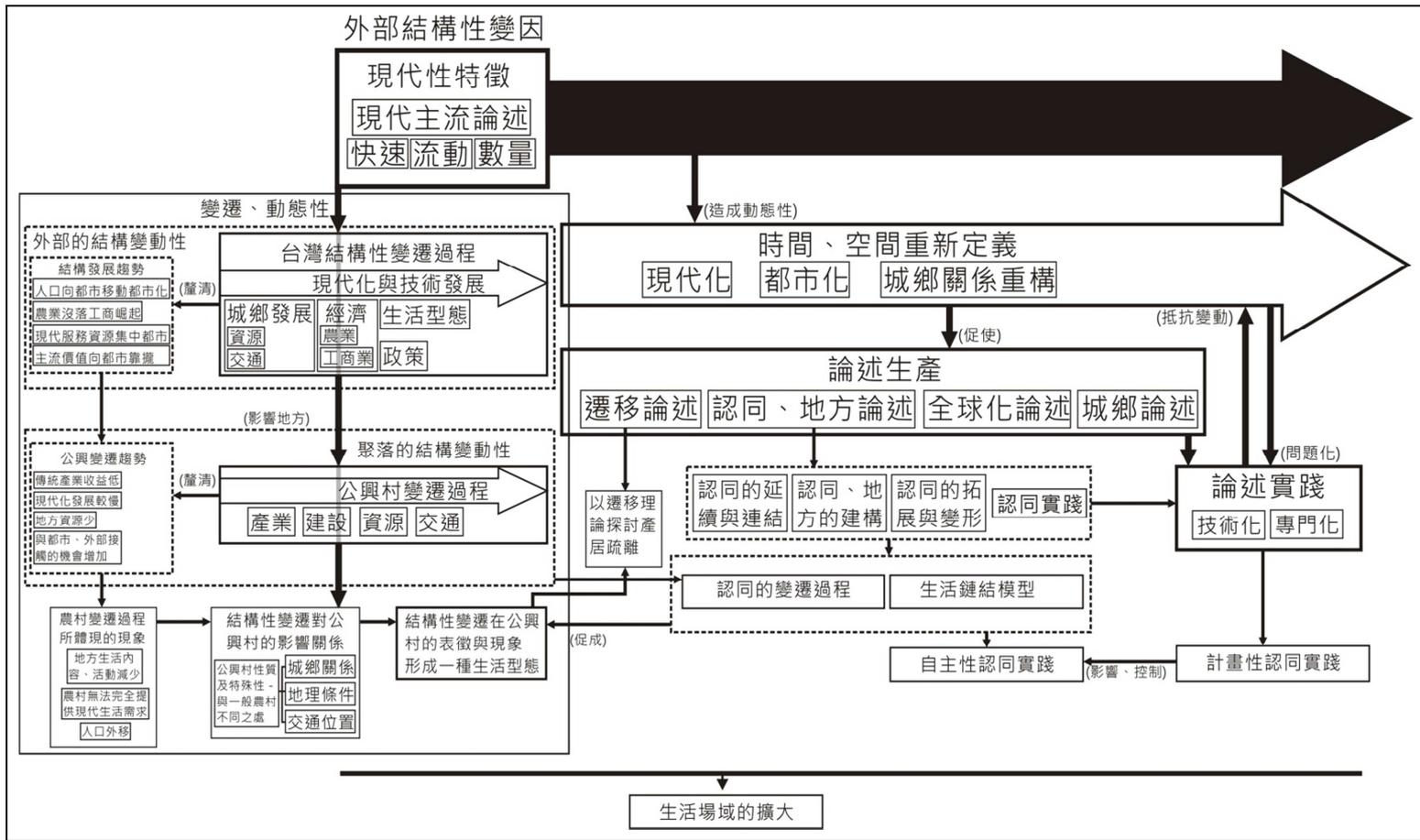
以公興村自身環境、社會文化的特殊性來理解公興村變遷脈絡，並理解居民生活場域轉變的原因後，則試圖以離散的概念來論證村民在生活場域與日常移動過程中認同與地方、原生活場域的關聯性。公興村變遷使原本具固定疆域、界線的生活場域樣貌處於流變的狀態中，居民原本「定居」於公興村的方式不再適宜，生活上不安定感，使居民處於離散、游移的狀態，公興村居民必須重新調適自身的生活場於來重回在社會中的安定感。



圖表 2：內外辯證力量示意圖

而這一連串的移动過程，本研究將藉由探討公興村民的生活移動狀況，如產業活動、社會網絡、地方生活經驗等，以離散的概念來解釋此移動過程背後認同的流動情形，並以認為移動與流變是持續恆常的觀點，試圖與一般認為遷移是單次性的研究觀點做出區別。

1.3.3 暫時性研究架構



圖表 3：暫時性研究架構

1.3.4 研究目的與章節安排

(一)研究目的

筆者欲透過探討公興村生活場域與認同轉變之關係，試圖提出不同於當前國內主流城鄉發展之論述觀點，嘗試開展新的論述方式以提醒社會行動者當前社會普遍處於二元對立、僵持不下的論述窘境狀況；以提供社會行動者、決策者在實踐過程中反思自身行動論述適切與否的一個切入點。而本文欲達到之目的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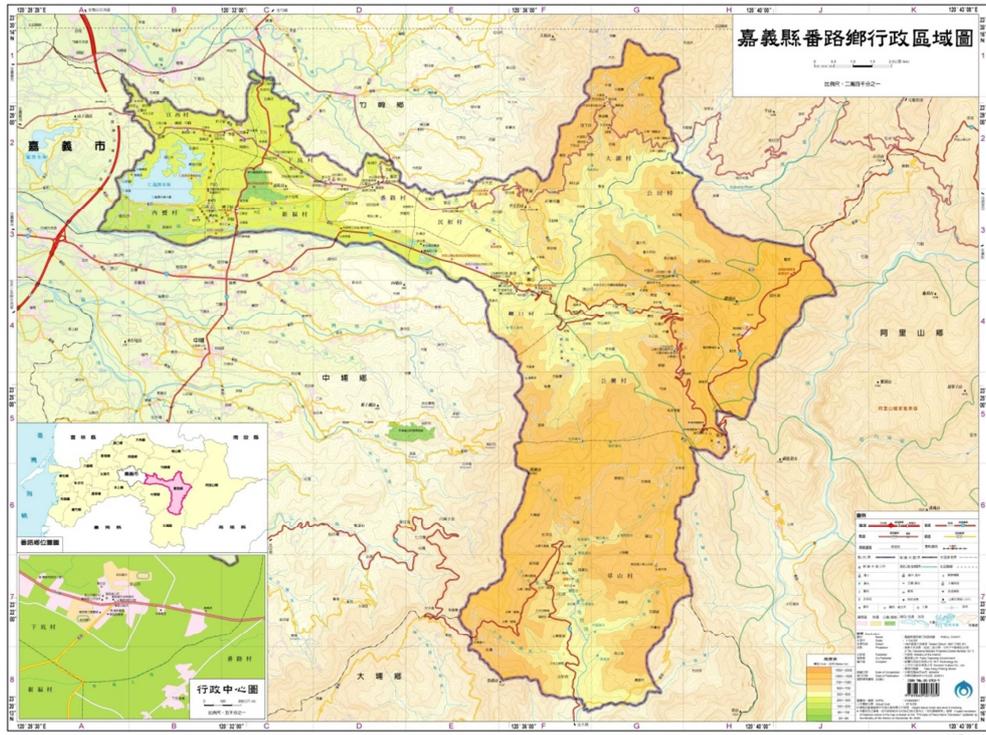
1. 回顧當前社會行動之論述與理論之間的溝通狀況，嘗試點出當前城鄉論述的普遍盲點與矛盾之處；提供決策者、實踐者可參考的論述修正與思考方向。
2. 將離散理論運用至空間、城鄉論述之範疇中，嘗試建構新的理論與經驗及現象之間的詮釋方法、溝通關係與論述方式。批判國內社會長期普遍對於城鄉變遷狀況的單一詮釋、危機化等較權威性之意識形態。
3. 透過理論與實際地方經驗的交互討論，論證現代城鄉流動現象是認同的延續與再建構，並非具有普遍的認同危機。

(二)章節安排

本研究以現代化發展的後促成的時空性質轉變之角度來觀察公興村遷移、生活場域轉移之過程，及其過程認同轉變之狀況。首先第二章回顧現代性、認同及遷移的相關論述以確立本研究的論述基礎與觀點，而後第三章探討公興村在台灣現代化、經濟、發展政策等層面的轉變中，公興村民生活場域轉變之脈絡。第四章則以第三章所歸納出的公興村民生活場域轉變的因素與過程，由其中的活動性質與內容，探討公興村認同、地方感的流變狀況；而後以離散論述，試圖建構移動過程與認同的流變關係。最後綜合理論回顧與經驗研究的結果，對當前社會行動方法及策略做出批判性的回應與建議。

第四節 研究場域與對象－鄰近嘉義市的山地農村

公興村屬嘉義縣番路鄉境內，番路鄉東鄰阿里山鄉，西鄰中埔鄉；而公興村在行政區域劃分上便屬於連接阿里山鄉與中埔鄉的位置；橫跨平地、丘陵、山區三種地形的番路鄉之中心區域。在區域上屬於大阿里山山區之內，公興村受阿里山的發展狀況而有些許影響。



圖表 4：嘉義縣番路鄉行政區域圖

(資料來源：番路鄉公所)

1.4.1 公興村的獨特性質－地理條件的隔閡所產生的特殊性

公興村全村地勢變化大，屬於山地形村落。由於地形因素，適宜居住與生產的區域相當零散。因此全村各聚落分布型態，也散落在全村各處。山地地形為主的公興村在地理條件上，對人的生活、產業、聚落發展所影響的基礎因素可分為幾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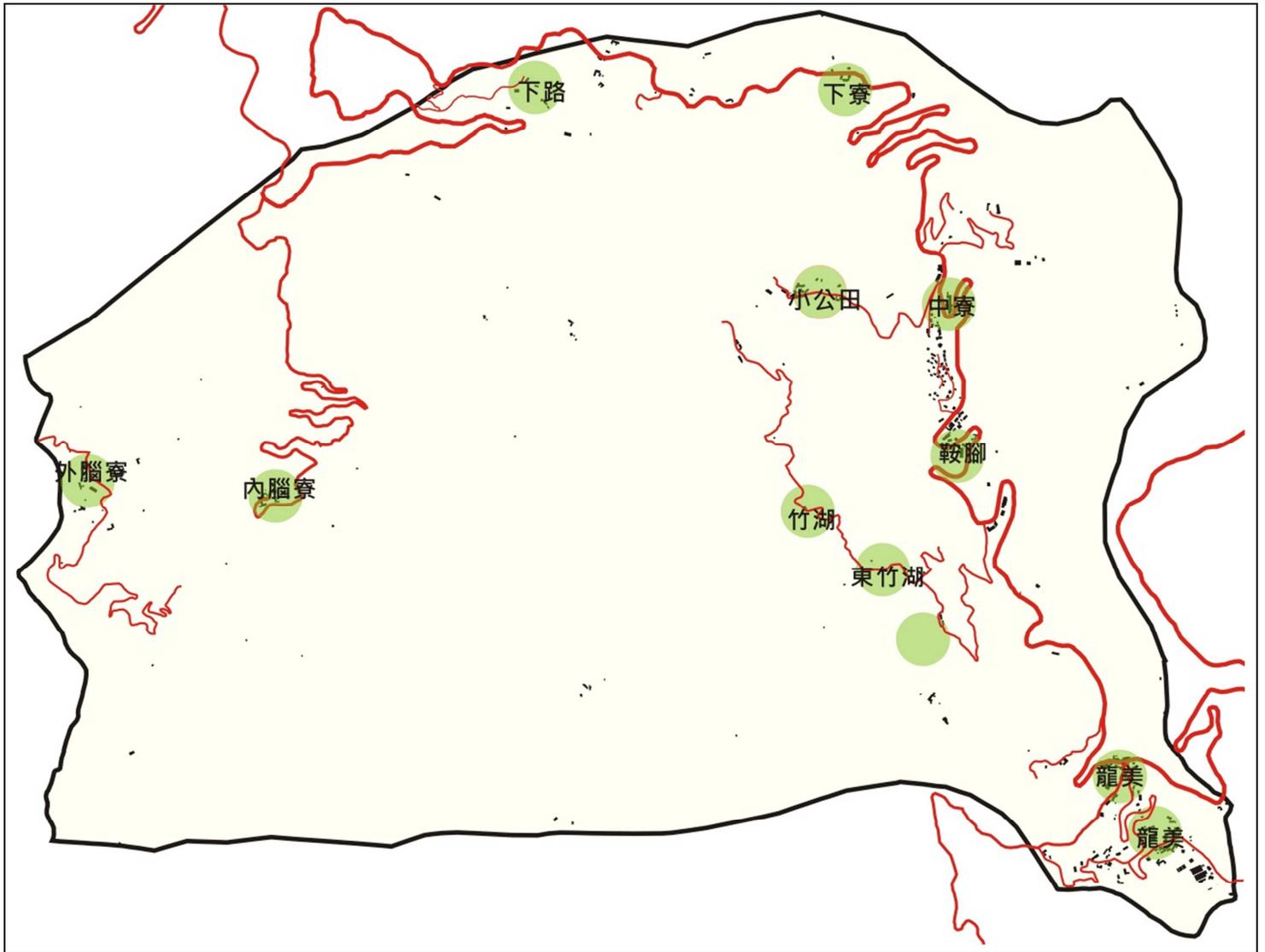
1. 可利用之土地零碎、面積較小
2. 山勢地形、海拔高度
3. 地理移動自由性相較於平原地為低

由於上述的性質，公興村區域上受外部社會、經濟結構變遷以及軟硬體發展的影響並不是平面、均質性的。在時空壓縮、流動的狀態下，受公興村自身地理條件的影響，其滲透、溝通性仍而相較於平原區域來的低，即是因地理、地形區位的性質，公興村在整個空間區域上的性質是較具獨立性的。

上述為公興村基礎的環境性質，以此性質作為不變的基礎，綜合隨時代進程的物質層面轉變，共同形塑出公興村自身獨特的變遷過程與生活樣貌。如交通、資訊技術的進步，使公興村區域間的時空距離隔閡較為縮減；但仍受上述公興村的固有性質影響，公興村交通、硬體等物質水準的變遷仍較一般平原區域具有組閣，成本較高。因此在既有的物質水平底下，公興村的時空距離的隔閡性仍較一般平原區高，而導致地方與結構之間的辯證上有特殊的建構脈絡。其特殊的結果體現在幾個層面：

1. 經濟、產業狀況
2. 資源與建設狀況
3. 政策落實的影響程度
4. 價值觀與認同轉移
5. 聚落分佈型態

上述五個地方特殊性的層面，是彼此交互影響而構成地方的變遷。下圖 5 可看出公興村聚落分佈的狀況，由道路的連接各聚落的狀況來看，雖然同在公興村內，但實際上時空的關係並不緊密；僅有少數的區域有聚落形成，並且各自之間相當分散。以下將敘述公興村各層面特殊狀況的交互關係。



圖表 5：公興村聚落圖

(圖片來源：本研究描繪自 Google 地球)

1.4.2 公興村特殊性的狀況－於獨立與開放間游移

公興村在該地理區位條件下，產業以農業做為基礎。相較於平原農村多屬於原本都市郊區，並隨著都市發展與擴張而逐漸轉變為都市地景的一部分。由於與都市較無地理隔閡與建設阻礙較少，因此時空距離的壓縮幅度更高，並多種植主流需求作物，因此結構轉變與價值觀有直接的滲透性。至於山地農業區，由於地形因素使得與周遭城鎮、都市的交通易達性較低、建設較為緩慢；並且因地形、氣候因素使得所種植的農產量較少、也較為零碎，並不適合種植糧食作物或需大量面積生產的主流需求作物。因此山地型農業在台灣經濟結構轉型前期來說，由於其農獨立性較高、環境條件性質的差異，而使其難以納入經濟轉換的結構之中。而在農業政策與經濟發展策略上，其大多是針對主要需求作物與糧食作物；雖然

山地型農業少量零碎的作物則不受政策影響，但仍然受到經濟結構轉變的衝擊。

整體來說，山地型農業因應結構性的轉變，而產生的變遷相較於平原型農業是較為緩慢與間接的，其變化的緩慢也代表其經濟模式、生活方式並未跟上社會、經濟結構轉換的腳步，雖然緩慢但仍對山地型農村造成深遠的影響。而平原型農村儘管被快速的改變，但恰能在傳統農業社會至工商業社會的轉變中銜接、轉變至工商業的生活方式。但反過來說，正是因為公興村此種處於封閉獨立與開放之間的性質，方能一方面保留原本地方文化的基礎環境結構，並與時代需求、價值觀、認同的變化有所結合。



圖表 6：公興活動中心



圖表 7：公興衛生所

1.4.3 公興村與嘉義市關係—隨現代化發展而日趨緊密

公興村距嘉義市約 20 公里，此地理距離在交通發展上代表的意義為公興村與都市互動頻率趨向日常化。在交通建設、現代化的道路(阿里山公路)鋪設尚未完備之時，公興村需透過步行至大眾運輸節點，才得以透過現代化的交通工具接觸嘉義市；而在現代化道路與交通工具普及化後，進一步提高了公興村與嘉義市的互動頻率。然後 20 公里的距離，儘管在無現代汽機車的時代下，仍在人的行動能力範圍之內，此種距離代表公興村與嘉義市一直以來有直接的互動關係，彼此具有相互依賴的基礎需求。以公興村的山地地型來說，公興村與嘉義市 20 公里的距離，在近代交通現代化過程中，是時空距離壓縮效率最高的距離，也因此對於公興村生活型態、地方變遷上的影響最為顯著；此物質條件的發展，將公興村與嘉義市之間的距離，轉換成可做為日常性的內容，並在外在結構與地方辯證過程中，具有上文闡述的性質。



圖表 8：嘉義市、番路鄉、中埔鄉交通關係圖

(圖片來源：底圖截取自 Google 地球，本研究繪製)

1.4.4 訪談對象—生活場域外移與歸返的離散族群

基於上文所敘，外部結構與地方的辯證過程所體現的生活、城鄉狀況，即是人的移動，在離去與歸返的持續移動所建構。在國內社會、經濟結構性轉變之初，公興村在無法調適生活、經濟型態而造成村民向外流移；在醞釀一段緩衝時間之後，基於公興村既獨立又開放的性質，歷經與外部再結構過程，地方經濟、社會、生活型態再次得以被納入社經結構之中，而使人再次向內移動、歸返。而在地方具備「定居」條件之時，仍隨著持續的時空、與社會、經濟結構變遷而不斷移動與調適。

公興村居民在此種地方性質下，大多都具有生活場域轉移的經驗，其轉移經驗包含頻繁、日常性的區域移動，以及階段性、任務性的移動如通學等。此種移動經驗以及移動的原因構成了公興村民的共同記憶與經驗。而本文的訪談對象，將以具備上述生活場域轉移的經驗之族群為主；另一方面，其生產空間皆在公興村內，而在公興村內屬於行動較活躍的族群。對其訪談之後，以訪談稿做為本研究實際案例分析之材料。

受訪者	訪談次序-訪談對象編碼(訪談日期)	角色	職業	居住狀況	年齡 (年次)	訪談對象狀況
○○○	1-A1(2011/10/13) 2-A1(2011/10/25) 5-A1(2012/1/11)	社區營造協會理事長	農(茶為主)	現住嘉義縣中埔鄉後庄	42(59)	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熟悉公興村及社區事務、發展過程，流移歸返族群。
○○○	4-A4(2011/12/19) 5-A4(2012/1/11)	專案社造員、社區幹部	農(茶為主)、零工	現住嘉義縣中埔鄉隆興	45(56)	社區主要幹部之一，流移歸返族群。
○○○	3-A3(2011/11/29)	村長兼社區協會總幹事	農(茶為主)	嘉義縣番路鄉公興村	52(49)	村長兼總幹事，熟悉社區、公興村事務，有流移歸返族群經驗。
○○○	6-A5(2012/1/11)	社區幹部	農(茶為主)	嘉義縣番路鄉公興村	37(64)	社區協會幹部，子女即將面臨就學需求。
○○○	7-A6(2012/1/12)	社區幹部	農(茶為主)	嘉義縣番路鄉中埔鄉社口		社區主要成員之一，回到公興村製茶，流移歸返族群。

圖表 9：訪談對象列表

第二章 理論及文獻回顧與探討

科技、技術的突進，使動態、速度、流動性成為當代現代性的特徵，在此特徵的影響之下，時間、空間進入了一個不斷被重新定義與詮釋的變遷過程；而該定義過程則伴隨了社會、文化、城鄉發展關係、生活型態的改變，其所呈現的樣貌也體現出時代所具有的特徵。這一連串的變遷與其衍生的現象，成為了近代論述關注的對象，促成了論述的生產；該論述試圖解釋與釐清時下社會、文化的現象，其包含了地方、認同相關的論述、人口遷移論述、全球化論述等。公興村民流移歸返的過程，即是現代性特徵的影響並伴隨現代化、都市化過程所促成的現象。本研究之文獻回顧將分為幾個部分討論，以建構本研究詮釋公興村民移動與認同關係的理論依據與討論方法。首先探討現代性對論述生產、文化與社會變遷的關聯。而後探討關於人口遷移理論對於遷移的定義、遷移的原因及對生活場域之詮釋。之後回顧認同意論在空間、社會領域的運用狀況及發展脈動，包含認同在空間場域上的形成與建構、認同與空間場域的關聯方式、認同的變形與流動性、認同的拓展與實踐。最後整理認同論述在國內學術領域內的論述觀點與應用範疇。

第一節 現代性具流變特徵的影響—時空定義轉變的論述生產與實踐

2.1.1 現代性特徵概述—傳統與現代之差異

現代性是近代最受學界討論的關鍵字之一，其定義、內容的解釋相當的龐雜，而以其為做為主題的研究、討論、辯證等文章的數量也相當龐大，現代性對近代理論、社會、文化、政治、經濟等各個層面確實有有深遠而全面的影響力。本文對現代性的討論僅是在眾多討論、定義現代特徵及應用之中，擷取、釐清現代性中對本研究有所觸及的層面。

黃崇憲在〈現代性的多義性/多重向度〉一文中指出，現代性並不是孤立的範疇，其概念與現代、現代化、現代主義等詞是經常一起出現在具體語境中，因為現代性的概念本身即是多義與多向度的(黃崇憲，2010：1-2)。即說明現代性代表的並不僅指涉單一意涵與層面，而是得以全面描述時代特徵的多向度概念。而黃崇憲進一步的整理出現代性可能的四個向度的代表意涵分別為：

1. 做為一種歷史分期的概念，如前現代與現代。
2. 做為一個社會學概念，與現代化的歷史場景密不可分，如傳統社會至現代社會、農業社會至工業社會。

3. 做為文化與美學的概念，如波特萊爾所指稱的現代性的短暫、操縱即逝等特徵。
4. 做為規範性的概念，指涉價值觀的層面，現代性可理解為一種告別傳統社會的價值秩序。(黃崇憲，2010：2-3)

分析維度	關鍵字	強調面向	主要研究學門
做為歷史分期的概念	現代 (modern)	時間意識	歷史學
做為社會學的概念	現代化 (modernization)	(物質化)進程	社會學/政治學
做為文化/美學的概念	現代主義 (modernism)	(精神性)體驗	文學/藝術
做為規範性的概念	現代性 (modernity)	終極價值	哲學/社會理論

圖表 10：現代性的多義性與多重向度

(資料來源：黃崇憲，2010：4)

現代性作為描繪現代變遷的基礎，對時代具有全面的影響性，以至於在各個領域包含文學、藝術、美學、社會、文化、歷史等層面皆受到現代性的影響。一般對於現代性的認知，是關於在思維、技術、科技上的突破，以至於能與過去的狀況做出一個可區隔的歷史節點，如前現代與現代。黃崇憲指出，與傳統相比，現代性體驗多了對現代社會和工業文明成就造成的短暫、流變、偶然和破碎的感觸，而前工業社會和傳統農業社會則是一種永恆、穩定、必然、統一和整體感受(黃崇憲，2010：10-11)。因此在現代性影響的滲透之下，除了以最具體的現代化做為影響一區域最為直接之外，現代性還透過了各種形式傳達了一種不同於過去、傳統的結構特徵轉變意義。

2.1.2 現代性激起的反動與抵抗－由穩固到流變所形成的鄉愁

以此種時間性、歷史性的角度來看現代性特徵，便得以得知在受現代性具短暫、流變等特徵影響之下，人與原本建立的生活世界產生了疏離。而此種疏離在無法適應的現代性前所未見與突如其來的流動與變化的狀況之下，被視為一種與過去文化、認同、精神的決裂；視現代性、現代化為將過去的抹平、否定與破壞，而造成的不安定的心理。現代性的初始影響便促使了現代性的持續推進。黃崇憲

指出，在現代性以理性、工業化、非人性的發展狀態，激起了美學、文學、情感上的反動，即是美學現代性。而這樣的反動、衝突彰顯了現代性的矛盾之處，而不斷在歷史過程中相互辯證(黃崇憲，2010：12)。此推進便是在早期現代性下對前現代社會所造成的緊張關係而產生；衍生現代性所指的是對過去全盤否認的意識形態。

現代性在上述短暫、流變的特徵之下所造成的現象；而反動意識的形成源自於與傳統、前現代的狀況差異度大與改變的速度較快，在初遭遇現代性而對其特徵的不適應性、不安定感。因而激起在政治、經濟、文化、文學等的與試圖與現代性抗衡的鄉愁現代性。

歷史分期	傳統	現代
核心特徵	封建化	理性化
經濟領域	農業經濟/低商品化	工業化/商品化
政治領域	人治/集權化	法治/民主化
社會領域	機械連帶	有機連帶
文化領域	宗教化	世俗化

圖表 11：現代性進程的歷史分期及核心特徵

(資料來源：黃崇憲，2010：10)

2.1.3 傳統與現代接合或斷裂？－現代性的神話

上述反動的力量，一般認為是因現代性與過去的決裂所造成。但 David Harvey 則認為現代與傳統的完全決裂是一種神話：

現代性的神話之一，在於它採取與過去完全一刀兩斷的態度。而這種態度就如同一道命令，它將視世界為白板，並且在完全不指涉過去的狀況下，將新事物銘刻在上面－如果在銘刻的過程中，發現有過去橫阻其間，便將過去的一切予以抹滅。(Harvey，2007：18)

Harvey 忠實的描繪出現代性與過去的決裂態度，此種態度可能是一種因實際歷經現代性的所造成的劇烈轉變之過程中，而對現代性所產生的誤解。Harvey 提到聖西蒙(Saint-Simon)認為，除非造成變遷的因子早就潛伏在社會秩序的既有的條件中，否則社會秩序是不可能改變的。但 Harvey 並不否認因現代性與過去決裂的

意識對生活世界衝擊後而促成的運動力量，包括革命、社會運動與論述的生產等，Harvey 認為這是「創造性的破壞」。而此力量確實也實踐出了新的社會型態與文化樣貌。

一般對現代性普遍的認知為，其所造成與傳統的決裂，是一種無脈絡性、倏忽形成的斷點；認為現代性會將人帶往一個無歷史、無過去、失去明確認同的未來，忘卻前現代與現代性在變遷速度上的相對性，現代性也是歷史建構的事實，迅速流變而造成感官、心理的強烈刺激，確實也激發了帶有部分創造性、推進新的社會型態的力量。Harvey 指出 Simon 與 Marx 不否認此反動力量的意義所在，並指出傳統與現代之間的脈絡在近代論述中日趨明朗。

2.1.4 現代性促成的變異與論述生產－論述與真實的落差

由上敘述可以得出現代性論述對於文化、社會變遷的釐清與詮釋，與真實社會文化變遷狀況的差異所在。首先，在歷史過程中，理性及技術的發展在某一時期上有不同與以往的突破性，藉此影響到文化、社會、藝術等各層面，造成了實質生活世界上的變異，也形成了上所述的反動力量；而後才促進了在論述上對現代性的概念以及對於現代性內容、詮釋的推進。李謁政認為這是一種對現代性的診斷：「尚有許多理論探討現代性的經驗所形成的歷史背景，進一步地對現代性提出診斷，是理論探討的必要工作，試圖去揭露『現代性的脈絡』，是有助於釐清其空間後果，也有利於實踐策略的自我反身性的形成。(李謁政，2006)」Peter Wagner 則在《現代性的理論化之路》的緒言中引用康德的觀點，Wagner 指出：

社會理論與社會科學皆在規劃一個適合自身的認知範疇，已使得原則上既沒有無法擺脫的問題，也沒有找不到的答案。社會科學一直傾向於棄絕有關無法逃避性(Inescapability)與可達致性(Attainability)的議題，並將之視為敵手而必須加以對抗(Wagner，2009：1)。

現代性作為一個當代時代特徵的描述概念之後，當代社會、文化、世界內容的變遷成為促使論述生產、解釋的對象，一切論述皆指向現代性的詮釋。如討論時間、空間定義之上層論述，抑或以現代化的觀點的城鄉發展論述、全球化與地方論述、認同論述等。而當論述被生產之後，便得以用以解讀社會、文化現象，社會進一步視自身需求生產論述實踐的可能性。Wagner 指出的現代性的雙重意涵，同時具有哲學性與經驗性；社會科學的崛起將和哲學分離，而當社會科學旨在處理簡單的現代性議題時，這種分離將更為明顯。在假定現代與過去之間是斷

裂的情況下，社會科學無可避面的採用過去的概念，以及過去和現在的關係，但卻鮮少闡明自身對過去可觸性的看法(Wagner, 2009: 3-4)。

在上述指稱的現代性下的經驗、歷史性與論述生產的關係之下，筆者希望藉由本研究來驗證現代性下的論述實踐，與實際歷史、社會、文化變遷的脈絡上的落差，並在現代性的脈絡之下，觸及過去、一般指稱已決裂的過去之間的關聯。而下文將先由現代性所造成「時間」與「空間」的定義重構的相關理論談起，以接續因時空變異而造成的城鄉關係、認同變遷之後續探討。

2.1.5 現代性下的時空定義轉變—現代性、現代化造成的「時空壓縮」

上文已提及，現代性與現代化、技術發展的緊密關係。而時間與空間的定義則在資訊傳播、交通技術的發展資下，被重新定義，並改變原有的生活場域的定義。Harvey 在《後現代的狀況》一文中認為空間與時間在現代性與資本的影響下必須被重新解釋。Harvey 指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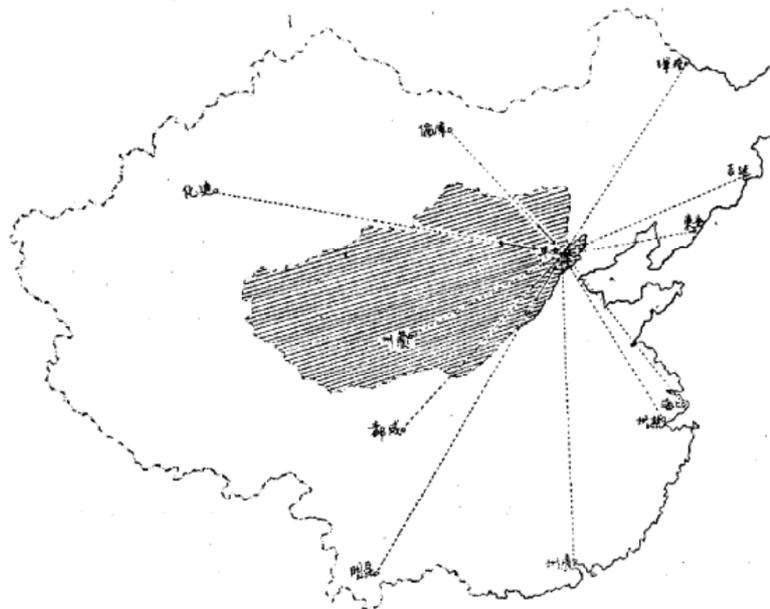
既然資本主義已經成為了一種革命性的生產方式，社會再生產的物質實踐活動和過程在其中始終在變化，因而結果必然是時間與空間的客觀品質及其意義也在變化。在另一方面，如果知識的進展對於資本主義生產和消費來說是至關重要的話，那麼我們概念機器中的各種變化(包括對空間和時間的表達)就可能對日常生活的秩序產生各種物質性的後果。(Harvey, 2003: 255)

Harvey 指出，在現代性造成的結構性變化的同時，空間與時間的意義同樣在變化，而這些變化藉由資本主義、現代化對經濟、生產、科學、技術、知識等層面的引導，其改變將實踐在日常生活中的各種可見的現象。也就是說，現代性所造成的時空定義的重構，將透過論述實踐、社會實踐等層面，具體的表現在生活型態、城鄉關係等實質可見日常生活實踐活動的變化上。另外，Harvey 認為在這看似「天然的」時空觀念與造成的變遷之下，其實隱含著矛盾和衝突。其中因為各種主觀的時空觀念的交涉，並且在科學、社會、美學理論的實踐領域中，不斷試圖解答如何表達空間和時間，並如何對世界採取行動。(Harvey, 2003: 256)本研究認為 Harvey 所述的，便需要由依據地方文化、社會對時空的詮釋，並關注地方在現代性影響下的變遷方能理解此矛盾所意旨。

由上文已知，現代性造成了時空定義的轉變，此轉變在社會實踐、生活實踐、理論實踐的回饋與體現在物質性的轉變，並成為時空的詮釋方式。而促成時空定義轉變的方式與內容是如何？一般來說，現代性的時空壓縮概念可從幾種層面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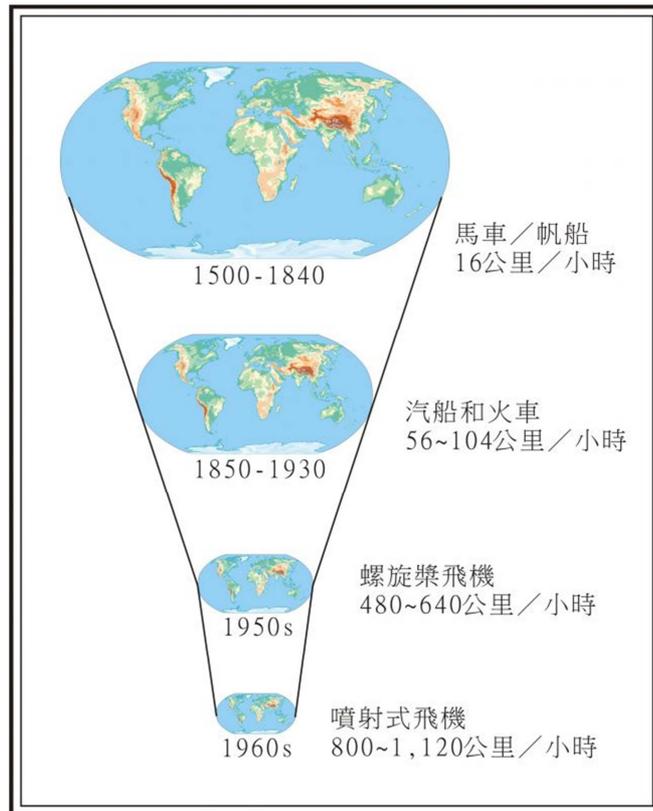
看。首先是最容易理解的交通技術的進步，R.D Macenzie 1933 年在《都市社區》一書中探討交通對人與社會組織的影響，繪製了一張美國近代空間縮短形式圖 (Hudong 互動百科)。之後 1949 年美籍華裔學者楊慶堃發表了〈中國近代空間距離之縮短〉一文，而後 D.G.Janelle 在 1968 年提出時空收斂(Time-space Convergence) 說明兩地的旅時和距離隨交通革新而縮短(全人教育百寶箱)。上述幾篇文章為時空壓縮理論的基礎，主要針對現代化、交通建設與技術的發展後，對於區域上與人在距離移動的時間縮短。

楊慶堃所著的〈中國近代空間距離之縮短〉寫到，距離決定了人群之間的緊密關係的程度，但其程度又必須視交通運輸的方法而有所不同(楊慶堃，1949：151)。其概念直指現代化之下，交通運輸的進步方改變了人與人之間的時空關



圖表 12：中國近代空間縮短形勢圖

(圖片來源：楊慶堃，1949：157)



圖表 13：通過時間消滅空間在交通方面之發明的世界縮略地圖

(圖片來源：全人教育百寶箱，柯佳伶、廖婉彤繪)

係。文中由中國清代的交通方式開始檢視，指出過去在中國廣大的幅員之下，因時空距離大，而造成區域之間的溝通性不足。而後探討了以鐵路建設之後交通運輸方式改進，透過新的交通運輸方式，得以增加人群之間、區域之間的互動、緊密程度。

Harvey 以資本流動的概念提出「時空壓縮」，其在《後現代的狀況》一書中用了大量的篇幅試圖解釋這個概念。Harvey 融合了過去時空距離因交通技術而有所縮短等現代性造成時間與空間定義轉變的各種內容建構了他對時空的論述，不單單僅以交通、技術層面來看，而是綜觀現代性的內容，並包含社會、文化、資本、心理、經濟、個人等層面共同討論。Harvey 在書中前半部分大量描述、分析了現代性的狀況與內容，其認為這種社會、文化變遷與現代性造成的時空變異有密切關聯。在該書的最初 Harvey 寫到「1972 年前後以來，文化實踐與政治—經濟實踐中出現了一種劇烈變化，這種劇烈變化與我們體驗空間和時間的新的主導方式的出現有著密切關係。(Harvey, 2003)」近代社會與文化變遷、城鄉聚落的發展現象與時空定義的變遷有密切關聯。因此，Harvey 所論述的「時空壓縮」可作為近代現代性討論關於時間與空間定義的一個關鍵的理論依據。

Harvey 的現代性與文化變遷理論可以抽取幾個論述方法。首先，現代性特徵造成的時空變異，所造成生活、社會的實踐並回歸至時空定義的詮釋之上；而其詮釋大多來自現象的發生，包括都市文化、城鄉發展關係、聚落變遷、生活型態的轉型、社會與都市運動的興起等，而其中解釋的方式又包含了抵抗的力量、認同的建構、抵抗與流動、人口遷移等論述的發展。因此可以得知在現代性下時空變異所促成的論述生產的脈動與取向。

2.1.6 台灣遭遇現代性的狀況與台灣的時空壓縮－壓縮現代性與抵抗

台灣遭遇現代性的狀況，不同歐美國家歷經啟蒙時代，工業革命等扎實的現代性脈絡。而是在不斷被殖民的狀態下，植入了現代性，也造就了台灣遭遇現代性的獨特狀況。黃崇憲提出了四點台灣現代性的性質：1.殖民現代性 2.壓縮的現代性 3.沒有現代化的現代主義 4.被禁錮的片面現代性。(黃崇憲，2010：17) 台灣在具殖民性與壓縮性的現代性過程之下，由傳統到現代的轉變速度比起西方現代性更為迅速。也因此，上述段落所提的現代性特徵造成對社會、文化的影響，以及所造成的反動，都更加的強烈；感官、精神所體驗的與過去決裂的神話也更加明顯。Georg Simmel 在〈大都會與精神生活〉一文中指出，現代都市與鄉村精神特徵上的差異之處，正表明現代都市是現代性最具體的代表；然而現代性造成的變動是結構性的，但相較在能實際直接存於現代性、現代化的都市區域之中，則可想像都市與鄉村之間遭遇現代性的方式與造成變遷之不同所在。台灣在壓縮的現代性之下，面臨快速的現代化、都市化的狀況，台灣在由緩慢、熟悉、平穩的變化性質中，瞬間面臨現代化、資本化、都市化等狀況。隨著台灣社會科學、現代性論述崛起，試圖處理主流論述、現代化、資本主義、現代主義等衍伸的現象，如認同議題、都市與鄉村議題等。即是上述現代性下的反動所造成論述與論述實踐技術生產的原因。

夏鑄九以城鄉論述的發展，指出了現代性論述的發展脈絡：

過去的都市研究中，都市/鄉村觀點是現代/傳統的意識形態兩元對立關係的再現，它既非兩元對立，亦非像自然般的連續演化。我們現在已經知道，是生產與社會結構決定了空間組織。其實，都市與鄉村，是社會組織的空間形式的分化，這是一個社會的空間形式的社會生產(social production of spatial forms)的過程。(夏鑄九，2007)

此段引文明白的表示出，時空定義與地方、區域上的文化與社會結構的生產方式有緊密的關係，由一文化對於時空原本的認知與詮釋，在該文化遭遇地域性的現代性過程後，而建構出不同的社會、生活型態。因此地域性的、以地方脈絡與發展狀況為基礎角度來作為回饋、描述現代性狀況的方法是必要與可行的。夏鑄九在〈台灣西海岸全球都會區域的形構〉一文中，以台灣、東亞區域的現代化過程敘述起，指出台灣在都市化、城鄉移民、交通與現代化發展、不均衡區域發展等脈絡，並以台灣高鐵建設後，台灣區域發展狀況變化作為案例。該文雖然並無將論述落實到更細緻的地方文化、生活脈絡的研究中。但夏鑄九在 1988 年發表的〈空間形勢演變中之依賴與發展－台灣彰化平原的個案〉一文中已稍呈現出該論述的概念。文中指出「依賴性」，及一社會的空間結構，依賴於地方上、區域上自身所具有的獨特脈絡與性質而建構。文中列舉殖民依賴、商業依賴、工業依賴、地緣政治依賴等。「不同類型的依賴性往往就有不同的空間結構的表現。不同種類的支配之間並無好壞差別的問題，它是不同的依賴力量，也不不同的歷史與社會。(夏鑄九，1988)」夏鑄九提到歷史與社會，因此要釐清一地方生活型態在現代性所代表的意義，由理解該場域的文化、歷史與社會並追溯其變遷原因，是可行的方式。

而〈台灣西海岸全球都會區域的形構〉一文，則是以高鐵做為案例敘述了交通運輸速度的加快如何造成區域上結構性的影響。但此文並無將論點觸及現代日常生活型態之中討論，也忽略了 Harvey 在論述「時空壓縮」之時，在現代性造成文化、社會變遷過程中，人與場所在實踐其文化與認同的過程中所隱含的「抵抗」力量，忽略的地方文化、生活與人在面對現代性所遭遇的況狀、困境之時，憑藉自主意識抵抗、選擇與調適的力量，即「創造性的破壞」抑或「因破壞而萌生的創造性」，可見此詞之中隱喻了現代性的結果中擁有現代性對社會、文化的影響向度，以及社會與文化向現代性回應與抵抗的兩個交互向度。而本研究便意指提出在現代性在時空壓縮的狀況之下，地方文化在創造性的破壞概念之下，地方、文化、社會所回應的方式與抵抗的力量，解釋生活型態背後的過程與代表的意涵。

2.1.7 Harvey 的現代性論述

台灣在上述壓縮的現代性過程之下，所造成的社會、文化變遷將更為劇烈。同時所造成的論述的生產與辯論、以及鄉村(傳統、穩固)與都市(現代性、流變)之間的張力更為激烈與緊迫，因而促成大量解決現代性後果的實踐與技術方式，並將主流意識轉向抵抗國家、發展主義與資本霸權。Harvey 已解釋上述社會、文

化變遷與實踐，以及其論述、運動等現象之間的複雜關係。Harvey 提到時空定義是隨社會、生活實踐而變遷，並認為此變遷內容與過程是複雜的。「任何社會的意識型態的和政治的霸權，都取決於控制個人與社會體驗的物質語境的能力 (Harvey, 2003 : 283)。」Harvey 並回顧了德勒茲(Gilles Louis René Deleuze)及 Michel Foucault 與 Gaston Bachelard 等重要理論家所談論時空之論述。

傅柯把空間視為一種壓制、社會化、約束和懲罰的力量，受其規訓。「其基本所指不是自然狀態，而是一部機器中精心附設的齒輪，不是原初的社會契約，而是不斷的強制，不是基本的權利，而是不斷改進的訓練方式，不是普遍意識，而是自動的規訓。(Foucault, 1999 : 190)」Foucault 在《規訓與懲罰》中以監獄空間來解釋空間內涵權力與規訓力量，而 Harvey 將其概念擴大解釋，運用到解釋社會、文化現象之中。以 Harvey 的觀點來看，在金錢力量的統治與影響之下，鄉村(傳統)必然性的會受到現代性、資本勢力的影響與規訓。如一場域的環境與條件是否能「轉換」為金錢價值來衡量，若無法轉換，該場域則將被邊緣化，而得以轉換的區域、或欲將其區域轉換，則其空間內容則包含了更多「權力與規訓」的力量。而 Bachelard 所述對人與場所之間詩性的對話，則是 Harvey 用以說明自身論述之中也已將人的記憶、思想與場所、物之間的關係。Harvey 說到：

“存在”，充滿著無法追憶的空間記憶，超越了“形成”他鎔鑄了失去的童年世界的所有那些懷戀的記憶。這就是集體記憶的基礎嗎？是所有那些影響到我們對於鄉村與城市、地區、環境與地方、鄰里與社群意象的、受到場所限制的懷舊的顯現嗎？被追憶的時間始終都不是流動的，而是對體驗過的場所和空間的記憶，倘若這是真的，那麼歷史就確實必須讓位於詩歌，時間必須讓位於空間，成為社會表現的根本材料。空間意象於是就對歷史表明了一種重要的力量。(Harvey, 2003 : 274)

根據上文 Harvey 在建構現代性之於時空意義變遷與社會、文化變遷與實踐力量之論述，得以作為本文建立研究方法與理論架構的基礎。Harvey 指出：

在任何社會中，空間和時間的實踐活動都充滿著微妙性和複雜性。由於他們是那麼密切地蘊含在社會關係的再生產和轉變的過程之中，所以必須找到某種方法去描述它們，對它們的用途做出概括。社會變遷的歷史部分地表現在有關空間和時間之概念的歷史之中，那些概念或許被附加了意識型態的用途。此外，改變社會的任何規劃都必須把握著空間和時間概念及實踐之轉變的複

雜棘手問題。(Harvey, 2003: 274)

本研究認為以公興村的生活與移動型態變遷脈絡，可做為描述現代性下時空實踐活動對社會、生活、城鄉關係變遷現象之影響關係之案例。台灣遭遇現代性的過程、因技術進步造成的時空壓縮中，促使公興村在生活、移動的形態上有所轉變所內涵的意義為何？以下將持續回顧以現在性範疇下的論述如認同理論與人口遷移理論等，作為本研究解釋的方法之一。

2.1.8 現代性對文化、社會影響的特性

本節探討了現代性及其對社會、文化變遷的相關論述與內容，以建構本研究的論述依據與架構。綜合上述回顧與討論，整理出關於現代性與本研究相關的幾個要點：

- (一) 現代性是一種整體結構性的變遷，各個領域、層面皆受其影響。主要的討論在於對時空定義上的變化與詮釋，因而有 Harvey 的「時空壓縮」之概念。
- (二) 時間與空間的定義與「時空壓縮」之概念，是由現代性對文化與社會造成的影響，而藉由社會、日常生活的實踐與生產，並回饋至詮釋時間與空間的定義之上，遂形成現代性的結果。意即現代性造成與過去生活世界的疏離與差異，因而造成社會與文化的再生產，而其再現將回歸至詮釋時間與空間。
- (三) 現代性之實踐所造成的結果，是具有「創造性的破壞」意涵，如生活型態轉變過程、社會運動、城鄉關係與發展的轉變等，皆是傳統在遭遇現代性所帶來的與原生活世界的疏離後，激發社會、文化與人自主調適、開創的能力，而這是社會、文化與族群自主萌生具創造性的鄉愁現代性之力量。
- (四) 現代性的結果是依賴地方、文化、社會的脈絡性，因而生產出各自對現代性及時空的在地詮釋。
- (五) 現代性的實踐所造成的結果，促進了近代論述的生產。由對時間及空間的論述，到都市、城鄉發展、地方與認同的論述等，皆指向於詮釋現代性的範疇之中，或指向現代性所造成的現象與結果。

(六) 論述上對現代性詮釋上的差異，影響了現代性實踐的結果。如第三點所述「創造性的破壞」的自主鄉愁現代性力量，包含美學與文學的、文化的、族群的、地域的等領域，本研究稱此為「創造型鄉愁」或「自主性鄉愁」；而另一方面，是社會的、政治的、權力的、資本的鄉愁現代性，後者的論述力量的介入影響、支配了前者的鄉愁現代性，而削弱的「創造性的破壞」之力量，本研究則稱此型鄉愁為「支配性鄉愁」。

本節回顧 Harvey 與夏鑄九等人的現代性與文化、社會變遷論述之中，並無看到對現代性所造成的文化與社會變遷、「創造性的破壞」、以及現代性的社會、地方與日常實踐的生產等，提出一套解釋方法與案例。但本研究在其同屬現代性下所生產的對認同、地方、場域的論述之中，得以作為解釋現代性的社會、文化變遷的理論方法。下文將回顧有關於認同的建構、延續、流變、離散等認同相關的論述。

第二節 認同的論述發展與性質—由固著到流變

現代性的結果，促成了近代論述的推進與發展，而在上述時空被重新定義，興起了人文地理學探討人與環境、場域之間，地方感與認同論述的生產。試圖解釋社會與文化變遷、城鄉關係與發展、移民議題等。而本節將回顧認同與地方論述的發展。包含認同感與地方感的建構、性質，以及認同的離散與流動等。

2.2.1 認同概念在空間論述上的運用—地理學對人、生活、經驗的關注

現代性流動、短暫、動態等性質，促成了社會、族群、國家、文化的變動、相互混雜與接觸，在現代性所產生的劇烈差異之下，認同藉由「差異」而被彰顯到空間的領域上。也正是這種變動與混雜，認同議題遂作為當代論述、研究上的重要對象。而認同(identity)的概念則逐漸在多個領域內開始被使用，包含哲學、心理學、政治學、社會學等。在這個背景之下，認同作為一個研究對象，已經牽涉到空間與地理的問題，而這也是在時空論述上推進的結果。認同概念落實到時空論述是在人文主義地理學的出現之後，因而看到了人與地方、生活方式、經驗等與空間的關係。《現代地理思想》一書指出實證主義地理學與人文主義地理學的差異在於，實證主義地理學看到了環境與空間，是理性、可被測量的客觀地理觀看方式。而人文主義地理學則看到了地方(place)，看到了人、生活及其經驗與理解空間的方式(Peet, 2005: 75-76)。人文主義地理學與實證主義地理學的理性與科學做出一種抗辯。因此人文主義地理學可以說是在早期現代性理性、科學與進步論所造成的結果下，並伴隨存在主義與現象學的興起而衍生出對人、地方、生活、經驗的一種研究趨勢。

有關於「認同」一詞，其所指涉的層面相當的廣泛。一般來說，認同是作為一種人在實踐、活動過程中，與自身生活世界產生關聯，並確立自身、理解自身的存在實踐意義的存在方式。另一方面，認同則被作為一種概念上的工具，用來幫助人們意識到社會、文化、經濟、與政治上的變遷(Woodward, 2006: 2)。而認同的該性質則被上述人文地理學的理論運用到論述「地方感」或「地方」的形成與建構之中。Hannah Arendt 在論述公共空間之時，使用了「共同世界」的概念，意旨人群在一場域藉由自身活動、日常生活之間，所拓展而認知的場域，具有一種共同的文化基礎，而在這個文化場域，方能作為與他者互動與自我實踐的基礎(蔡英文, 2002: 75-121)。而孟樊提到「我們與他人或想與他人共享的價值，則是認同的中心所在」(孟樊, 2001: 22)。因此由關注「認同」這個概念，則勢必會轉向關注人的活動、生活。而在近代論述當中藉由現象學、地理學對空間、環境與人之間的關係後，認同概念遂開展至空間領域之中。「人群並不只是定出

自己的位置，更藉由地方趕來界定“自我”」(Mike Crang, 2008: 136)，即是人文地理學之「地方」概念的背後哲學意義。

由人文地理學將空間以人、社會、生活現象學式的互為主體作為觀看方式，並提出地方之後，認同的概念被使用在其中。Gaston Bachelard 在《空間詩學》探討了人與物、人與空間之間在經驗、情感與記憶的關係。而 Peet 提到人文地理學的奠基者 Edward Relph 的概念—「社群(community)和地方之間有某種強烈關係，雙方都會強化對方的認同，所以人就是他們的地方，而地方就是人。」(Peet, 2005: 79)從中可以看到認同概念在空間上、地理學上的應用。

2.2.2 人文主義地理學的內在矛盾—對理性與現代的排斥

人文主義地理學所關注的人、生活與經驗所形構出的「地方」場域作為觀看、詮釋空間的方法，John Pickles 將其視為一種對現象學的誤解及對理性、科學上對抗的意識形態的「反科學」的態度。由於過於以傳統特徵作為建構認同與地方形成的論述方式，因此未能擴大解釋特殊社會、文化與時代特徵的脈動。而 Peet 最後提到，人文地理學對人類經驗、地方、生活世界展現了深刻而富同情心的關注，認為人文主義地理學哀悼一個世界的失落，其中包含了段義孚的地方感知和想像、西蒙的身體經驗等(Peet, 2005: 93-99)。

而本文認為，上述對人文主義地理學的批判話語，其實揭示的是本文上節中所提到的現代性的結果—論述在意識形態上必然產生的鄉愁。Peet 也在回顧對人文主義地理學的批判話語之後提到：

懷舊正好具有人文主義地理學批評者認定不符科學的感傷訴求。但是我們不能拋棄感傷(sentimentality)，反而是要探究它的性質。感傷的懷舊在保存、誇張和運用在倫理上評價地方的那些特質方面，經過了特定選擇。清除過往，讓它顯得更為誘人，而且能夠支持在比較粗暴的當前所施行的行動，這是一個令人愉快卻危險的辦法。結果，懷舊很容易受到政治和宗教操控，尤其是運用在領土、區域和地域的時候，支撐了「地方精神」觀念，使懷舊成為人與家園的精神連結的表現。(Peet, 2005: 101)

甚至，Peet 指出了人文主義地理學在“哲學立場的傲慢”，「他們宣稱可以向其他人展示「事物本身[該]是甚麼模樣」(Peet, 2005: 104)。

人文主義地理學由一種人的本質論方式詮釋了空間與地方的生產，已被指出其在論述之中內在的矛盾與意識形態，而使得其論述受到諸多的質疑。而此種屬

於論述範疇的鄉愁屬於支配性鄉愁，確實對於「創造性的破壞」之力量有所影響。但 Peet 也指出不能拋棄此種感傷所造成的力量，而該探究其性質與由來。確實人文主義地理學在現代性帶來的劇變之下，所帶來一種情感與意識上的不安定與惶恐，並宣揚認同的回歸，作為一種論述上對社會實踐的安定性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也容易引起社會、文化、族群的共鳴，並被轉化為策略或技術，作為現代性結果下的社會、政治行動指標。儘管人文主義地理學否認與忽略了時代特徵、及其推進中逐漸埋入社會、文化、生活的認同實踐。但另一方面，人文主義地理學著力在人、身體、經驗與感知等層面，確實提供了一種更能周全解釋地方文化、社會變遷的研究方法，而補足了社會學在關注結構性、較高層的論述之時，而較少著墨的個人經驗、地方文化與脈絡的部分。即是本文認為認同論述得以用以解釋地方生活、文化變遷與實踐，並回饋至 Harvey 所認為現代性的結果是必須依賴地方地方、文化、社會的脈絡性，方能生產出各自對現代性及時空的在地詮釋的原因。而本研究即是試圖結合人文主義地理學及現代性的特徵，建構出地方社會、文化變遷現象的意義。以下首先在此提出人文主義地理學的認同危機的存在與否之問題意識，並將敘述人文主義地理學、文化研究等領域對於認同論述的討論。

2.2.3 認同與地方的再結構過程—由固著到流變

如上文所述，在人必須在自身所認同、能辨識的場域中，方能立基於生活世界之中存有，進而實踐、拓展自我的價值。而在現代性的結果對社會、文化所帶來的疏離，被視為一種人在實踐價值、認同上的一種危機。在上述的基礎之下，許多論述則忽略了在現代性下流動的認同再現是否也是一種認同實踐的表現、忽略了此種認同流動的形式、忽略了動態時空的認同建構也能作為一種研究的對象，建構此種現代性流動性下認同的意義所在。而僅在前現代緩慢、固著的特徵之中，批判現代性對認同所帶來的危機。但後來認同論述的推進上，已經逐漸看到現代性下認同的新樣貌，與轉向流動的性質是得以用在認同之上的。

人文主義地理學者，針對人與場域如何彼此聯繫，進而達到「地方感」的生產。確實在人的身體、經驗、感知、經驗、情感與人事、物、空間的連結建構諸多論述。如段義孚在《經驗透視中的經驗和地方》由人的身體與經驗、感知空間的方式來探討，建構人與空間維繫的關係。而 Edward Relph 強調人與生活場域、經驗中所接觸的人群、事物，之間長時間建立的記憶、情感上所達成的關聯。並認為在現代化、資訊先進的文化所造成空間移動性增加侵蝕了地方，而造成地方感的喪失(Peet, 2005: 81)。上述兩個人文主義地理學的重要思想學者，皆抱持

對人對地方上的情感喪失的一種關切，將無地方性歸咎於一種認同危機的範疇之內。

David Seamon 提出了「身體芭蕾」與「地方芭蕾」的概念，Seamon 以 Merleau Ponty 的身體現象學來作為人的活動與生活構成地方的論述方法，關注於「空間的日常移動」。Seamon 認為此種習以為常的日常移動成為一種「時空慣例」，此種時空慣例藉由人在生活場域之中長時間、習慣性的不斷移動，人便與地方達成了強烈的地方感(Cresswell, 2004: 57-59)。儘管日後的論述對「地方感」的推展，已經逐漸將社會、時代結構考慮進去，而傾向「地方的流動」。但本研究認為 Seamon 的地方芭蕾的概念，實以觸及了地方、認同的流動性與時間性。

學者	主要論述	論述內容
Edward Relph	地方與無地方性	認為認同具有特定的樣貌與特定的根，而現代化、工業化的發展則削弱了、改變了地方認同的樣貌，使人與家園之間造成了普遍的疏離。(Peet, 2005: 81-82)
David Seamon	地方芭蕾	透過人的身體的經驗與身體的在時空中的移動，連續了人在空間上的移動經驗；而透過此種持續的移動，則持續的生產認同。
Allan Prad	地方感和感覺結構的形成	認同與文化在生活隨時間的流動，而持續的累積、傳承與流變；認同與地方感是 持續被建構與處於流變的。
Manuel Castells	網絡社會與認同的力量	以整體時代、時空性質轉向高度流變性作為論述的基礎，探討社會、認同在此基礎下的運作狀況與現象。

圖表 14：認同論述發展脈絡

(資料來源：本研究匯整)

上述人文主義地理學者所提出人的認同感與地方感建構論述，使後進之學者得以針對更具脈絡性的、結構性、社會性的層面提出對地方與認同更周全的詮釋。

Allan Pred 在〈結構歷程和地方-地方感和感覺結構的形成過程〉一文中，提到了人的感覺結構在生活、文化、世代與階層中的流動關係，「社會再生產是一種持續不斷的過程，因此，在一個既定的地區當中，每天制度化的活動不但會導致生物性的再生產，也會造成制度、必須被用於創造活動的知識，以及既存的結構性關係等地繼續存在或修正。(Pred, 2002: 82)」Pred 試圖建構得以更深入、更貼近特定地方生活、社會、文化脈絡的觀察方式，以解釋各場域地方感之差異；不僅僅考慮人文地理學者關注的個人的、內部的，而是一種外部－內部的辯證，將社會與文化進程、時空概念共同納入論述之中。

Pred 敘述段義孚與 Relph 主張：

[他們]強調，經由人的居住，以及某地經常性活動的涉入；經由親密性及記憶的積累過程；經由意象、觀念及符號等等譯譯的給予；經由充滿意義的「真實的」經驗或動人事件，以及個體或社區的認同感、安全感及關懷的建立；空間及其實質特徵於是被動員並轉型為「地方」。(Pred, 2002: 86)

而 Pred 自身則主張：

一個地方感的個體感覺，不會獨自出現，不能和他的發展和意識，以及一般的意識形態分離，或者不受複雜地深植在他先前的語言學習、其他形式的符碼所吸引，以及感知的約制的歷史所影響。其起源亦不能和他過去在社會、學校、工作場所和其他制度所提供的具體情境中的社會互動和社會化相分離。事實上，如果地方感不要成為另一個物化的範疇，指涉思想的流散，或者是純粹獨自存在的消極反映，他必須以具有時空特殊性的每日實踐來重新詮釋，藉此地方感成為伴隨了其他亦是發展和社會化的元素，是個人經歷的一部分。地方感也要以社會和經濟結構的特性來重新詮釋，這些結構乃是被相同的實踐所表現和再生產。(Pred, 2002: 88)

Pred 將地方社會、文化、政治、生活的時間性、歷史性脈動作為論述地方感的基礎，Pred 進一步提到「被我們感覺到的地方，是不能夠被凍結的，而是個體積極參與時空支流的結構歷程的不斷變化的副產品。」(Pred, 2002: 91)指出地方的建構、流動遂塑造出地景、社會、文化等可見表徵的變化。

Pred 在〈結構歷程和地方-地方感和感覺結構的形成過程〉一文中用了大量

的篇幅來試圖闡述地方感在地方文化(內部)與外在結構(外部)之間的辯證過程的重要性，而試圖用文化研究學者 Raymond Williams 所闡述的感覺結構來說明地方感在日常生活的實踐所具有的流變性、傳承性。此篇文章可謂將過去人文地理學建構出人在空間建構地方的論述作為基礎，並將其與地域的特殊性、地方歷史性、社會性、時代性特徵等脈絡共同討論，而將地方概念推向流動的重要文章。另一方面，Pred 提到了日常生活實踐中的宰制性、制度性與計畫等權力力量的影響，即政治或社團、有目的性的組織等，對於日常實踐的影響力。Pred 說到：

那些[影響日常生活軌跡的]定義和規則是那些持有權力的個體或個體的聯盟，生產及再生產為目標建立或決策達成的結果。資訊的輸入、圖像的解釋、價值觀、偏見、參與和內在的團體利益，含藏於計畫或規則所決定的目標和決策的構成之中，往往是非機械地導源於安置目標者和決策者早期的路徑和計畫的參與紀錄，或導源於業務管理者、政府官僚、工作場所的管理者、父母或其他團體涉入的外在—內在和生命路徑—日常路徑之間的辯證。

(Pred, 2002: 91)

Pred 指出這種地方內部與外部結構辯證的重要性，並指出一種不可分離的狀態，由此可以看到有兩股以上的力量在交互、共同進行地方的再結構。一股是源自內部的感覺結構所自主傳承的、實踐的；而又加上外部結構的，進行複雜的辯證。

不能和「那些人透過不完全的資訊而有限地獲取地域性或非地域性的資源和機會的察覺」切斷，[...]更不能和「對優勢的群體或文化價值的吸納或反對」切斷。[...]面對地方的或更廣大的基本衝突或矛盾和實踐與結構之間的辯證是不可分離的。(Pred, 2002: 91-92)

Pred 強調的是一種人在地方並不斷與外部的「辯證」過程，所變遷的、需求的出現。在人文地理學中所固守的「地方感」面臨外界如現代性、現代化、資本主義等所造成的社會、文化、政治、經濟上的結構性變遷之間的辯證張力。這個辯證過程和地方的感覺結構，推進了地方的流變。而本研究則認為這個辯證過程和力量，與「創造性的破壞」所意旨的有所雷同，都意圖闡述一種內與外、正與反之間複雜的溝通辯證過程，而 Pred 與 Harvey 相較之下，是提出一套更可以做為一種觀察生活實踐的研究方式的論述。以下段落將回到「認同」的層面，關切此種辯證過程在認同上的抵抗、流動、連結與離散。

2.2.4 Castells 認同的力量

上述 Pred 強調地方性再結構過程的內部與外部的辯證過程，Manuel Castells 則也抱持此概念，做出進一步的論述。Castells 在他的資訊社會三部曲之中¹以現代科技發展、資訊流動等時代特徵所造成的時間、空間之改變，做出一社會、文化變遷的觀察與論述。「我們的世界，以及我們的生活，正被全球化與認同的衝突性趨勢所塑造。資訊技術革命與資本主義再結構，已經誘發了社會的新形勢—網絡社會」(Castells, 2002: 1) Castells 充足了人文地理學所忽略的時代進程與社會特徵，關切 Pred 所提的流動性；以此種基礎與論述之下，由探討地方生活、文化、歷史的脈絡去追溯此種變遷的內容。在科技引發的全球化、現代化、資訊化等快速流變的時代狀態下認同被擾動，而隨著認同在再結構、轉化的時候，認同內部運作的力量、方式遂得以在論述中被穿透與敘述，因而回歸至「認同」上的討論。

Castells 認為：「認同可能源自於具支配力的制度，但只有在社會行動者將之內化，且將它們的意義環繞著這內化過程建構時，它們才會成為認同。」(Castells, 2002: 7)亦即認同的產生是透過一地環境、社會、文化，並在其上生活，而對自我產生意義。其「支配性的制度」與 Pred 提到的「宰制性的制度計畫」概念相同，而 Castells 則更將此股支配、宰制力量視為整體認同內容的一部分，在論述的真實性上更為完整。Pred 闡述支配力量與地方認同形成的脈絡的不可分離，Castells 已將各股力量其視為理所當然的整體。因此認同是個別的社會、文化、個體的自我在時代下的實踐所建構的，「認同」在論述、文字上被體現出來，成為一種辨識、理解變遷、實踐過程的一種方式。

Castells 體認到地方性再結構過程的內部與外部的辯證過程，並看到了擾動下認同所被明顯的運作力量，而以對「社會運動」的觀察之中，提出了認同的三種力量、形式與起源，分別為「正當性認同」、「抵抗性認同」及「計畫性認同」，其內容分別如下：

正當性認同(legitimizing identity)：由社會的支配性制度所引介，以拓展及合理化他們對社會行動者的支配。

抵抗性認同(resistance identity)：由支配邏輯下處於被貶抑或汙名化的位置/處境的行動者所產生的。他們建立抵抗的戰壕，並生存在以不同或對立於既有社會體制的原則基礎上。

¹ 《千禧年的終結》、《網絡社會之崛起》、《認同的力量》

計畫性認同(project identity)：指當社會行動者基於他們能獲得的文化材料，建立一個新的認同以重新界定他們的社會位置，並藉此尋求社會結構的全面改造。(Castells, 2002: 8)

由 Castells 所界定出來的認同的三種形式與起源之中，可以窺見過去段義孚、Relph 到 Pred 所不斷論述的地方建構方式及其內容的脈絡、運用及發展，以及 Harvey 所述的「創造性的破壞」的矛盾與張力等，諸多元素與力量之間的複雜辯證、交互的關係。而儘管 Castells 將其認同形式歸類為三類，但其三種形式則有不可分別敘述的緊密複雜關係，而回到認同的論述上，則將包含了價值觀、時代特徵、社會結構、族群等的歷史範疇上討論。

如以現代性的歷史分野來看，原本傳統的生活、文化之場域在未受現代性下的現代化等狀況影響之下，各文化群體之間的溝通與互動上較少，其聚落、族群內部的社會、文化、價值等層面較能為持自主性及穩定的結構與制度，而以人文地理學者所論述的地方生產方式，並依據地方自身的脈絡，地方在較穩固的場域之中流變，與場域產生關係。而後在現代化之後，各群體、國家能掌控的範圍、結構性的擴大後，彼此的辯證在空間上發生，外部結構以資訊、交通等方式滲透原本穩固、具正當性認同的地方、欲支配地方，而使得地方在經濟、社會、文化、生活的實踐有所轉向，此種上述回顧中所被提到的辯證的張力，即是此種抵抗性認同發揮的場域所在，而展現在人的行動抉擇之上。儘管 Castells 以社會運動的層次所做出的認同形式的定義上較為極端，如對於抵抗性認同的解釋之中提到「以支配性的制度/意識形態的措辭來建立防衛性的認同，並在強化本身疆界時翻轉了其原有的價值判斷。在這種情況下，被排除的/排除性的認同之間的交互傳播的可能性成為討論的議題。(Castells, 2002: 10)」Castells 以較強烈的用語來形容，但本研究認為認同的性質確實如 Castells 般所陳述，而僅是在表現的強度上有所差異。即外在的強勢、排除性的力量越強大、越迅速，則所激起的抵抗性認同將更為強烈與可辨識，而所造成聚落、地景、生活、文化的變遷也更加劇烈與明顯。

而計畫性認同，則是一種制度化、組織化、技術化的第三種影響認同辯證的力量，如是 Pred 提到的宰制性、制度性與計畫等權力力量的影響，即政治或社團、有目的性的組織等。而這股力量在資訊、空間、資本的流動性成為時代的狀況之後，此股計畫性認同力量藉由上述資訊、教育等傳遞而優勢的介入認同的辯證之中，即是背後受論述、意識型態、權力、政治所掌控的技術、知識、組織、理性管理等概念已滲透入日常生活之中，成為一種日常性的使用。如 Castells 指

涉出市民社會的崛起與國家權力機器認同上的相似(Castells, 2002: 9)。這是一種文化群體建立文化認同時所依靠制度、計畫、規範、甚至是宗教的力量來達到認同的實踐。

Castells 引用 Giddens 對現代性的認同建構之論述特性：「[...]如果傳統越來越失去它的控制力，那麼日常生活在地地方與全球的辯證性互動下被重構的傾向就越強，而個人則越將被迫在多樣選項中對生活方式的選擇進行交涉。[...]」

(Castells, 2002: 12)」Castells 認為其所述的網絡社會在崛起之時，該認同建構的特性與轉型遭到質疑，即上文所述受一種支配型鄉愁的質疑，而導致了一種新的力量得以介入社會變遷的過程中而同時影響其改變的形式(Castells, 2002: 12)。優勢的論述、權力、價值在網絡社會中的蔓延與流動，而使得該支配性的規範力量得以在脫離傳統地方文化脈絡之下，滲透、試圖取代影響地方原本穩固的支配性力量。

Castells 在認同上的論述與力量之間的關係仍有諸多論述，而本段落則初步回顧 Castells 的認同三形式，而其於較深入的論述則在本文描述所觀察的公興村流移現象的過程中，逐步詳加解釋。

2.2.5 認同的再生產、實踐、與維繫—遷移與離散認同

Castells 回歸到認同上的討論，相較於「地方感」上的討論，有較廣的可能性。如地方感在關注人持續的在場域、空間之中活動，實踐其認同，方建構出地方，那麼是否無實際的、頻繁的實踐活動地方就不能被建構呢？而這個問題會到認同的探討上便似乎得以回答，而不似在討論地方的時候，容易受一種想像、先驗的空間、場域概念所限制。Castells 說明「在網絡社會裡，對大部分的社會行動者而言，意義是環繞著跨越時間和空間並自我維繫的原初認同(primary identity)而建構的。(Castells, 2002: 7)」即是認同一旦形成，個體承載著認同是可跨越時間與空間並實踐其認同的，儘管離開建構認同的場域，但個體的認同仍在它地以一種鄉愁的方式持續的透過其生活方式而實踐，認同在自然的變遷過程中，不斷維繫著地方生活、文化與社會的獨立性與特殊性。因此可以得知，並非是具有清晰具體的認同實踐之現象發生之時，認同才被建構，認同並非透過持續性的場域活動之實踐方式方能維持、產生，而是認同一直以累積的方式存在、流變。

Castells 上述的認同性質，與近代文化研究中關注「離散」有所相關，而「離散」的認同概念與以往的認同具固著不變的本質論有極大的分歧。現代性的內容、特徵，與其造成的社會、文化的變遷之關係已在上文有所回顧；而正也是在此種脈絡下，循著現代化、全球化、資訊化等狀況，所造成的諸多現象如遷移、國族

等議題，而重新探討離散認同的論述內容。在過去的離散認同的論述中，「離散」是與因天災、霸權、種族淨化等暴力與傷害性的力量，因而人群被迫使必須離開家鄉，而「離散」的族群則是被以「受害者」的角色被觀看(Woodward, 2006)。若以上述對認同的本質論看法，人群在受到迫害、戰爭等外力被迫落難他鄉，而無法寓居在家鄉，是一種認同的失落；而這種論述的依據則是認為認同的存在是與土地、空間無法分離的、根植於土地的認同。但在後進的離散認同論述的許多學者，則已在晚期現代性下資訊、科技、交通等都高度發展的時代狀況下，對上述傳統的離散看法提出批判。

以遷移現象來看，現代資訊、交通技術的發達，促使離鄉而居的族群，也能有更多的選擇方式與更高的可及性與家鄉達到聯繫。「資訊傳播形式崛起的延伸性離散者連結，已經變得更加普遍。這並不是說，正是資訊傳播科技以某種方式，就網際網路上虛擬社群的意義而創造了離散族群，而是說，更廉價的旅遊和更簡便的傳播之結合，支援了原本就存在的情況。(Kalra, 2008: 32)」此說明了在現代性的文化、社會、資訊流動下，認同在空間上的真實互動性提高了。另一方面，在認同是被持續建構與可流動的概念之下，對於離散族群的認同實踐也有不同的看法。Woodward 以音樂、藝術等案例指出離散族群以一種血緣性的方式，在他鄉持續展示、實踐自身的認同。Woodward 認為認同在相同的經驗、基礎之下，未必以相同的形式具體化，並且是得以不斷加工的：

「相同」可以被保留，但不一定要被具體化，不一定要成為一個固定的東西；它可以不停地再加工。在這種再加工的過程中，「相同」顯然變成了一種不因襲守舊的傳統，並且維持與修正了它自己的內涵；所以「不因襲守舊的傳統」並不是一種封閉的傳統成規，或者簡單的複製而以。持續地混雜、離散，以及離散所具體說明的慶典政治，都向我們提出了挑戰，它要我們理解到：易變的、遊歷的形式，可以透過遷移、動態變異的相互調和，進而重新定義文化的概念。(Woodward, 2006: 609)

認同的離散與混雜，是藉由遷移、互動、衝撞、接觸等動作來達成，而這即是一種內外的持續辯證過程，此辯證過程即是認同的不斷變遷而體現出變化的場域，是一「辯證認同」的空間。

2.2.6 認同再生產過程的多向度辯證

本節回顧了地方與認同論述的內容與脈絡。首先理解地方感的形成與建構方式，而後敘述了人文地理學對認同與地方缺乏考量特殊的歷史、社會、文化之脈絡與外部結構的辯證，因而由認同根植於土地、認為認同與文化是恆定不變，而歷史的進程、社會的脈動無法改變其認同的本質論，進展至認同是社會建構、是流動的。最後離散的認同概念，使認同論述跳脫與空間、場域的絕對關係，並得已以各種有形、無形的方式與對家鄉的認同連結，並以其為基礎，持續的實踐、拓展其認同，並不斷的累加、混雜。

本節在回顧後有幾個要點，首先，無論 Harvey 的「創造性的破壞」以及 Castells 的認同三型式，以及 Pred 的感覺結構，除了認為認同、地方是被建構的，並具有流動的性質之外，其中即是那造成認同流動的認同的辯證力量。如 Harvey 認為，現代性下包括現代化、資本主義等價值的滲透，而激起與過去生活價值的疏離所造成的運動，是具有帶動社會進步的力量。而 Castells 也指出認同的三型，在原初認同、抵抗性認同與計畫性認同三股認同力量的辯證關係。Pred 也以感覺結構試圖說明認同、地方是源自於認同主體在不斷與外部文化、社會、價值碰觸後的累積與傳承式的建構性質。因此，本文依據上述學者所論述並將其綜合，則可以建構出本研究對於認同上的幾個性質。

以本文上述提到的「支配型鄉愁」與「自主性鄉愁」來看，認同在內與外的自然辯證過程，即以自主性鄉愁的運動實踐方式來達成生活、社會、文化的進步、變遷、調適的目的。此屬於 Castells 的原初、內部的正當性認同與外部正當性認同在抵抗性認同基礎上的辯證結果。但明顯的有另外一股能影響認同辯證的力量由另一個維度積極介入，如 Castells 的計畫性認同、Pred 指的宰制性力量；此力量是由原初的制度、主流論述、法律、政策、國家權力、政治等得握有直接控制社會變遷走向資源的擁有者，在接受同樣的辯證力量後所激起的計畫性、策略性論述上的運動，即為「支配性鄉愁」的力量。而這股力量將透過與結構上的調和之後，共同形成一股外部力量，而持續與內部進行辯證。而 Roland Robertson 認為：「當代社會學和社會理論或者說這些知識領域的所有實踐者都同樣捲入了這種懷舊態度的再生產。(Robertson, 2000: 210)」或者可以說，對於地方與地方文化的原初認同、原初狀態的推崇，是一種鄉愁借助將論述制度化、技術化並節由政治支配、社會的可實踐力量所造成的一種傾向與結果。(Robertson, 2000: 223) Robertson 也與 Castells 等人略有相同的提出，存在型鄉愁與存心鄉愁的關係；存在型鄉愁即是常民自主即存在的鄉愁，而存心鄉愁一種故意進行的政治操作，而其認為存在型鄉愁將被納入存心鄉愁的範疇之中，而受到權力、文化優勢團體

的控制與利用。

基於上述對於認同再建構內部的運作力量之論述，使得在國內已引起些許的批判與討論，將是下文回顧的一部份。而本文認為，上述的論述的辯證，在近代被論述方向被重新導向的「離散」概念中得以作為解釋方法，作為一種跳脫以往已經根深蒂固的對於社會現象、遷移研究、族群問題、認同與地方論述的觀念，而得尋求一種新的啟發性。如 Kalra、Kuar 等人說述離散論述的取向：「離散是一種批判方式，用以批判那些僵化類目即牽涉其中的本質主義。[...]潛在上，離散概念足以質問歸屬的觀念，也能質疑主流勢力把忠於國家的單一歸屬觀念強加於人的霸權行徑。(Kalra, 2008: 6)」在離散的論述中，遷移的因素主要以戰爭、種族壓迫等政治因素，而導致強迫性的遷移，此為外在、強制性高的力量所造成。而此種離散概念，本研究認為得以在現代性下的現代化、都市化、城鄉移民的現象中使用。離散論述其中一個重點研究範疇落在遷移研究之上，而遷移研究則更接近了城鄉、地方及空間的領域。但疏離概念較少應用至空間、都市研究領域，以及用做解釋、討論當下社會、城鄉議題策略的正確性與否。因此以下將試圖由現象學、人文地理學等延續下去的空間、地方論述，試圖與離散概念結合。而後回顧城鄉遷移的論述，從中理解除了戰爭、種族、政治因素所造成的遷移之外，在一般較無此類極端因素如經濟、需求上的轉移而造成的遷移，以應用離散認同的概念。

第三節 定居、遷移與離散—人口學與離散觀點的差異

2.3.1 生活、定居的意義與內容—現象學在社會、文化與時代狀況解讀的運用

現象學者 Martin Heidegger〈建.居.思〉一文中，對何為定居(dwelling)、如何定居做出一現象學哲學式的基礎論述。「我們達成定居，只有通過建造。後者，即建造，是以前者，即定居，做為目標的。」(Heidegger, 1991: 47)建造可以詮釋為為達到定居的目的，而在一場域中所實踐的活動，如生產、建築。因此欲在一場域中定居、生活，首先該場域必須充足能生產、建築的條件；而若在一場域上有定居，該場域勢必滿足了生產與建築等內容。Heidegger 所認為的，定居與物的存在，與所建造的、生產的「物」同在，而達到所謂天地人神，渾然天成的「四位一體」的狀態，是基於在環境上、人的心靈與精神上與人本身，共同建構，進而達到定居於天地之間，並存在。

1.建造(building)實即「定居」(dwelling)
2.定居，及人存於大地之上
3.建造作為定居，展露出作為栽培生長之物的建造以及作為修築房屋的建造兩種意思

圖表 15：Heidegger 對建造與定居的解釋

(資料來源：Heidegger, 1991: 50)

Heidegger 以一種基礎、起源、本質式的論述了人如何定居、存在於世間生活。由上文所回顧的論述，John Pickles 認為人文地理學在現象學上的誤用及對社會、歷史進程所造成的變因的忽略，以及後來認同論述在流變、社會建構，並須以地方特殊文化與社會結構來綜合辯證的方法，而回到 Heidegger〈建.居.思〉一文中來看，Heidegger 所論述的定居、居住、存有，是一種以人的本質式的書寫，在無添加社會、歷史、文化特徵脈絡下，而保有了一種論述上的可應用性及彈性。在此種僅以人與環境上的本質關係上，其實得以將其所述的天地環境，理解為一種當代社會、文化狀況的一種狀況，而人的精神層面，則可以視為一個族群中的特有文化。因此，社會、文化與歷史的狀況以及認同的流變與離散的概念，則將可以綜合 Heidegger 的定居論述進而詮釋當代社會在生活、居住、生產的變遷與狀況。

Heidegger 的定居論述，並不是意圖闡述一種認同與空間上在定居、生活上的恆定性，而僅僅是建構一種本質的狀況與如何達到定居的意義。因此，若能夠在一場域居住、生產、活動，保有生活上的完整性，而無論透過的方式及表徵出

的形式如何，皆能達到定居的意義。而將現代資訊、交通的發展、社會的特徵、價值觀等狀況視為一種人在現代生活中理所當然具備的條件，便可以理解。因此由上述離散與遷移的狀況來看，在解讀一種一般性的現代社會、文化與生活型態的變遷，應該要問的是，現代性下定居所需具備的內容為何？為何在此定居？又為何遷移？何為遷移？

2.3.2 離散認同—鄉愁、懷舊的恆常性

以上述離散的傳統概念來看，離散乃是關係到受迫性遷移、放逐和一種繼起的失落感，這種感覺來自於對歸返的無能為力。較傳統的因素，包含因戰爭、奴役、族群與政治等原因，而具有強迫遷移的力量；其在於居民受控於某種力量，導致無法持續的在家鄉生活、定居。因此在他鄉定居，對家鄉的思念與因對歸返家鄉有所困難而導致了一種失落感。(Kalra, 2008: 16-17)離散的遷移來自一種強迫性的力量，那麼若此股力量，是以間接、後殖民式的、較和緩以至於不感到受迫的形式呈現，是否仍屬於離散的範疇呢？若此種失落感，是源起於一種「無法歸返」的過去，那麼即代表失落或鄉愁是一種人類恆常的心理狀態，即便終其生活於家鄉之中，也不斷處於一種無法歸返過往的狀態之中，而僅因為該失落感與鄉愁的頻率穩定而溶於日常生活之中而使其失落感無所作為；因此，離散本是以一種常態性的現象存在，而遷移則是離散的具體現象，失落感則受強迫性程度越大而壯大。

而在以網絡、資訊發達的現代社會下，資本主義、都市主義或文化優勢團體仍持續的以一種後殖民的方式，來宣告生活與價值的定義之時，而達成一種介於逼迫與自願之間遊走的遷移。如地方產業、經濟受控於整體國家發展，導致地方無法維持生活所需的經濟，而被迫離開家鄉；或在緩慢的價值轉型過程中，向某價值靠攏而造成的遷移，具有遷移的自由度。另一方面，在交通與通訊技術的進步下，返鄉在技術上的障礙減少，而返鄉也未必要再透過實際的空間移動來達成，具有多種與家鄉達成連結的選擇性，而使得遷移、居於他鄉的失落感減少。此種曖昧的遷移是在加入人的價值判斷、社會狀況、歷史與文化條件後，人不斷在時代中以達到「定居」作為目標，而做出的遷移與改變的調適行為。而由前述現代性、人文地理學、地方與認同論述的回顧中，認為由認同的轉移與 Heidegger「定居」的概念，並由探討地方文化、歷史、生活與外部結構性變遷的辯證過程得以解釋此種遷移類型。因此以下將探討人口遷移、城鄉遷移相關的論述，以理解構成遷移的因素除了上述的政治、國族因素之外，現代一般造成遷移的地方因素可能為何，及其因素對定居、生活於一場域的重要性所在。

2.3.3 傳統人口學中「遷移」的定義—居所的流動

首先探討在人口學、遷移理論對於的遷移一般定義。在人口學的研究領域中，遷移的意義最為模糊、最不清楚。研究者常因研究方向與資料的性質而對遷移有不同的認定。遷移(migration)、流動(mobility)、移動(movement)，而遷移則是一種通稱，此三個詞經常交替使用。而依遷移距離、性質的不同，則在前冠上適當的形容詞加以區別（蔡宏進 廖正宏，1987：197）。在蔡宏進、廖正宏所著《人口學》一書中，對遷移常見的定義整理如下：

1. 遷移乃是指個人或團體從一個社會移到另一個社會。這種改變通常包括放棄舊的社會環境進到另外不同的社會環境(Eisenstadt,1955：1)。
2. 遷移乃是一個人的住處從一個地區換到另外的地區(Hannerberg,1957：28)。
3. 遷移在本文乃指個人或家庭自願從一個國家移到另一個國家(Thomas,1959：510)。
4. 遷移乃是永久住處的改變，若是臨時的，則也要有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如季節工的遷移。遷移乃是象徵人類生活從一個環境到另一個環境的改變(Weinberg,1961：265-266)。
5. 遷移乃是人們在一特定時間內，遷移一特定距離以改變其永久性之住處(Peterswn,1975：80)。
6. 遷移者乃是一個人為了改變住處從一個地方辦到另一個地方(Omari,1956：48)。
7. 遷移者乃是指一個人在某一段時間內，期初與期末有不同住處(Thomlinson,1962：357)。

而以上定義所包含之意義可歸納為：遷移是人在地域上的移動、遷移是永久性住處的改變、遷移可為個人的行動，也可能是團體的行動(蔡宏進 廖正宏，1987：198-199)。上述對遷移的定義，皆是以實質居住地的改變來做為定義遷移的基礎。但並未加入地方文化與社會因素等狀況來考量。由上述離散的概念來看遷移可以得知，遷移所涵蓋的意義其實更加廣泛，除了實質住所的改變，與個人動機或環境因素也有密切的關係。因此較完整的定義應包括心理因素和互動因素。孟加南認為「遷移乃是遷移者衡量各種價值，做成決定後從一個地方做相對的永久性(relative permanent)遷到另一個地方，而導致遷移者互動系統的改變(Mangalam,1968：8)。」即為嘗試將心理因素及互動因素納入遷移的定義。但因

其永久性難以定義清楚，遂孟式的遷移定義仍遭到諸多的質疑於討論。再者，遷移的定義往往牽涉時間與距離，但仍然在單位上有諸多的爭議。故美國學者許賴約克(Shryock)等人將遷移定義為「在特定的行政區域或統計區域間居住地點有較永久性的改變」(Shryock, 1978: 349)，該定義將擁有較大的彈性空間。(蔡宏進 廖正宏, 1987: 199-201)

整體來說，遷移難以有一完整、清楚的定義。遷移除了指涉個人也可指涉團體或家庭的移動；而造成遷移的形成，則與一地的文化、歷史、經濟發展、環境特性、政治背景等…有所關聯性。而過去對遷移的研究，大部分著重在定居地的變遷以判定是否達到遷移的定義，卻鮮少深入從歷史脈絡、社會變遷及文化背景來建構地方遷移現象的分析；也較缺乏先由地方生活方式來定義其定居的意涵，並建構遷移前與遷移後的關聯性、遷移前後的生活形態與經濟型態之關係。是否在遷移之後，其經濟模式必然跟著改變抑或與舊居地仍保有某種程度的關聯性？

2.3.4 遷移理論－經濟與需求層面為主

遷移理論的發展與討論相當廣泛，其立場、研究方式各有不同；有些著重以數據統計來分析社會與經濟變遷下的人口遷移現象，而有的則著重討論形成遷移的因子等。其不同的原因可能與研究者所屬的專業領域、研究的規模、研究對象的背景而有所關連，但仍是探究人口遷移的原因為最主要目的。因此關於人口遷移的理論及研究，雖然同是人口遷移的研究，但其內容的差異性往往相當的大。本研究雖不著重在討論人口遷移理論，而是針對人口遷移的型態來進行現代農村發展、社會變遷的研究。但人口遷移理論包含遷移決策、遷移原因等內容，以下將彙整與本研究較有關連之遷移相關理論及研究。

最早的遷移理論是由 E.G.Ravenstein 所提出的遷移法則，其要點如下：

1. 遷移與距離(migration and distance)：人口遷移受距離的影響，短距離的遷移較多，長距離遷移則多往市中心集中。
2. 遷移呈階段性(migration by stages)：以大都市為移動中心，逐步吸引周邊城鎮居民遷入。而更偏遠的鄉村則也逐漸遞補，朝都會中心遷移。
3. 流向與反流向(stream and counterstream)：每一人口遷移的流向同時也有反流向的存在。
4. 城鄉遷移傾向之差異(urban-rural difference in propensity to migrate)：城鎮居民比鄉村居民較少遷移。
5. 短距離的遷移以女性居多(predominance of females among short distance

migrants)。

6. 技術與遷移(technology and migration)：運輸、交通工具與工商業的發展使人口遷移增加。
7. 經濟動機為主(dominance of economic motive)：雖有其他因素共同促使遷移發生，但其中以經濟因素最重要，人為了改善物質生活而遷移的情形占多數。(蔡宏進 廖正宏，1987：213-214)

G.Ravenstein 的遷移法則引起後來人口遷移研究的討論，可說是人口研究的開端。雖然遷移法則以較簡明、通則性的方式試圖將人口遷移現象歸納出一有系統的規則，但大致上對人口遷移現象已有一定的正確性；而後來的人口遷移理論也多依循 G.Ravenstein 的遷移法則做延伸，如後來的人口遷移的推拉理論，遷移法則內已隱含其理論的概念。在往後的遷移理論及研究，大多落在遷移法則的範疇之中，或以推拉理論為概念基礎，多在其推力或拉力所指涉的類型中做出不同變動。

推拉理論主要概念是認為兩空間的差異性可造成遷移的形成，而其遷移因素則主要是由外在環境與各種條件來影響人促使其遷移。推拉理論隱含兩個假設，一為認為人的遷移行為是經過理性的選擇與判斷，並非一種隨機的過程。二是認為遷移者對原居地與遷入地的訊息有某種程度的了解，經過感受與價值判斷後決定是否遷移（蔡宏進 廖正宏，1987：212）。例如原居地的公共設施、工作機會或收入不佳，並認為另一地有較多的資源與工作機會，遂造成遷移。至於推力與拉力的內容，其包含相當廣泛；除了物質、硬體上較具體的層面造成推拉力之外，還有許多抽象性的因素可加入其推拉力的內容。如對原居地的認同、情感，以及熟悉的社會網絡、生活方式等，皆是在推拉理論中能影響人的遷移決策的因素。由於推拉理論的內容往往因研究者的專長與研究方法及對象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設定，並且較無時代的限制，環境與結構性的因素可隨時調整；故推拉理論是人口遷移理論中最被廣泛使用並沿用已久的論述。

至於不同於推拉理論的遷移理論有：人口轉變遷移說、生產關係變動說(生產與土地關係改變以致造成遷移，但遷移未必改變生產)、農業過剩勞動力轉移說、成本與收益、正負因素說、遷移社會心理說…等(程超澤，1995：126-140)。其理論不同之處，通常在於觀點及立場上的差異。例如人口轉變遷移說是帶有時代性的歷史脈絡，揭示了該時期人口遷移的情形；並將人口遷移分為不同的時期與階段。其理論創者人口地理學家 Zelinsky,W.認為人口遷移流動是與社會經濟發展呈相關關係(程超澤，1995：126)。至於生產關係變動是說明當生產關係隨時代變遷時，遂形成人口遷移的現象。「在相當長的時期裡，人和土地相結合所構

成的相對穩定性導致人口的絕少流動和社區之間的封閉性，只是在這種結合遭到嚴重破壞時，人口才被迫離開原地流入他鄉，去尋找生產資源，以便進行新的結合。(程超澤，1995：129)」資本主義與工業革命造成生產關係的劇烈改變，機械化造成生產力過剩，以至於改變了人以往與土地緊密的關係並投向新興生產方式，遂形成了遷移。而農業過剩勞動力轉移說主要是認為都市與農村有其生產力的差異，都市擁有無限勞動力的需求；而另一方面農村有潛在失業的隱憂，對都市產生嚮往與期望的心理。農村人口在農業及農村上不發展的情況下而產生一種對城市的嚮往與寄託。托達羅(Toda-ro)解釋勞動力轉移問題，對農村遷移至都市的現象的看法，「由於這種嚮往與寄託有極大的想像性與抽象性，因此在追求上也具有強烈的狂熱性。遷移者首先考慮的並不是在城市生存、發展的可能性，而更多的是把遷出農村地區作為一種目標。至於在城市中如何生活則是次要的(程超澤，1995：133)。」成本與收益理論，是認為人自身評估遷移的成本及收益後，若收益大於成本遂可能造成遷移。但成本及收益的定義廣泛，難以已實際的數字計算出其費用。例如成本也包含了心理成本，在原居地認識的親友與對環境的熟悉記憶等。至於繼 G.Ravenstein 的遷移法則之後，對人口遷移較有系統、整理較詳細的理論，則是 Everett S.Lee 的正負因素。他將決定遷移的因素分為四類各為原住地的因素、遷入地的因素、中間阻礙因素(intervening obstacles)與個人因素。正負因素理論的模型，將不同的族群或單一對象放入後，提供一種有系統性的分析方式，將個人主觀因素考量進去，是較能深入理解特定對象遷移因素的理論方法。原居地與遷入的各有正負因素，但對不同對象則可能有不同的正負因素影響，至於中間阻礙因素則是遷移可能遇到的阻力，如距離、身分、金錢等。

儘管遷移理論諸已盡力囊括心理、環境、經濟、歷史、技術及對象的差異性等，試圖建立一完善的遷移理論，但仍難以套用至所有的遷移現象之中。如生產關係變動說指出當生產關係與方式改變後，遂造成人口遷移。由上述回顧可知，人口遷移理論大多著重於實際人口遷移現象的研究，而較缺乏探討遷移形式的差異及原因的形成以及遷移對生活方式的影響。但理論不可避免的需顧及寰宇、共通性，而需藉由較深入、較長時間的區域研究來證實是否與理論相符。遷移法則在諸多人口遷移相關研究及書籍已有相當詳細大量的討論與整理；本研究不詳細討論其細節，而是知其遷移法則的概念，以利本研究做出分析的依據。

2.3.5 在現代、資本主義下「定居」之意義代換—建造、照料→貨幣

整體來說，人口遷移的確難以建立一個定義清楚且方法明確的理論方法。因能影響人口遷移包含社會、時代、地域、對象、文化與價值觀等因素，變數極大。

從以上列舉的各項理論，可看出有一部分人口研究學者認為經濟為欲遷移者在決定遷移的選擇中佔了相當大的比重，而往往也認為生產是與遷移形影相隨的。由「定居」(dwelling)的意義來看，產業即是為達到「定居」所必備的建造、照料(Heidegger, 1991: 49)，作為維持定居、維持生命的主要來源。儘管在資本主義邏輯之下，此建造被貨幣金錢化約取代，在經濟結構受到資本主義收編之後，若在資本邏輯之外的資源，便無法構成建造、生產的意義，而使得在達到「定居」的方式有所受限。但確實以勞動力、物品等形式轉換為貨幣，是現代取得維持生活、生命延續所需資源的主要方式。其概念如同過去一區域上是否適合耕作，足夠獲取生活上所需資源，方能在該區域上「定居」。

2.3.6 遷移與離散以「定居」為目標—離散作為一種進步式的遷移論述基礎

由上述的遷移理論的探討，可以得知大多較偏向以實證的方式作為論述的基礎，但在後期的人口學中發現在以純科學理性、與資本主義邏輯下實證、量化的方法無法完整解釋遷移的形式與成因，因而逐漸轉向人文、心理、社會性因素試圖做出更完整的論述。一方面透過現象學與人文地理學的崛起，得以將人對環境產生呼應的方法與經濟、社會、歷史等變因分開討論，而網絡社會與離散的概念則破除對地方與空間的本質論。一方面由現象學對「定居」的考察，可以將遷移理論的因素如經濟決定論、推拉理論(需求)，以「定居」作為解釋的方法；在現代資本主義邏輯與優勢文化價值，將藉助資訊社會做一後殖民式的滲透，人因而結合當下在經濟、社會、文化等層面，朝向人在時代中時代所認知適宜的「定居」方式而去做出文化與認同的實踐與再建構。

既然經濟、社會、文化、政治、價值、制度層面是變遷的各個面向，即也是處於不斷流變的狀態之下；因此僅要其中一小部分出現內與外的辯證力量，那麼「定居」便是個從來未完成的理想，也是人為了在世存有、實踐的目標與動力；如現代的職位階級的爬升、物質消費、需求的增減取向、城鄉遷移等皆屬於此範疇之內。如《離散與混雜》一文針對 Robin Cohen 對於討論遷移的理論中的質疑，認為 Cohen 過於果斷的認為造成遷移的因素起於某項層面，是造成形塑外觀輪廓、文化與定居的主因；而事實上遷移、離散是無數其他因素的涉入所形塑的。(Kalra, 2008: 20-21)以「定居」來看，即是「心之所向，便已到達」(Heidegger, 1991: 57-58)，在社會、文化建構下，人對於事物的看法已然不同，但都是通向一個完整的「定居」，而心之所向便已到達也表示人與事物、家鄉、空間連結的一種心靈方式；而無論身處何處，皆以心所向的地方，以其為目標、核心做出實踐，便是遷移的文化再現，也是離散的概念。

而根據以上離散概念的解釋，可以將離散視為一種遷移理論的進步論述。上述提到傳統遷移理論，多以實證、量化的方式來建構其論述；但其學者也多感到無法完整充足的解釋遷移現象，受方法論限制上的困擾。傳統遷移理論常無法解釋在價值、社會、文化、精神、感情、政治、權力等較質性層面的因素，而近代離散研究在關注離家、漂流的認同與情感上，以跨國、跨界移民做為研究的重點對象，同時吸收了過去遷移理論長期建構對於遷移的論述，並且較能結合時代特徵下與地方脈絡的特殊性辯證，做出詳細的遷移內在原因之探討。過去遷移理論將居住空間的轉移視為遷移的定義，將遷移、移動視為一種單次性的特例，而不把流動、移動性的恆常與持續視為一種人「定居」實踐上的一種常態與事實；而此種流動與移動的常態，即是人隨著在時間流動過程中結構性的改變，而不斷與所衍伸出的社會、物質、文化等層面試圖與其建立鏈結關係，持續行進並體現在實質可見的表徵之中，造成可見的變遷(Kalra, 2008: 23-25)。而這種變遷則在地方化、地方特屬的支配性制度與權力、地方的外部現代性狀況、以及地方傳統文化場域的彼此交互辯證分析下方能理解其內容。

2.3.7 離散認同作為一種解釋方法

現代性相對於前現代性在時間、空間定義上的差異與對立，區隔出了明顯的時代性；人在現代性倏忽的到來、結構快速的轉變中與原本安定、適應於前現代的社會、文化、生活等狀態產生了疏離，導致了整體生活世界進入了一種不安定、流動、再建構的狀態。而認同議題便是在這樣的結構狀態之下，成為近代理論發展熱烈討論的項目，來做為一種詮釋現代性結構的方法。如 Kathryn Woodward 對認同論述的描述：「認同就像是一種概念上的工具，可用來瞭解人們如何意識到社會、文化、經濟與政治上的變遷。」(Kathryn Woodward, 2006: 2)因此，認同論述的使用由心理學擴大到了地理學、都市社會學等空間領域，做為解釋現代性時空變異的方法之一。

本節回顧遷移理論，並與認同、現象學、人文地理學與離散等論述綜合探討，窺見了現代造成遷移的一般因素。而其內部的諸多因素，以「定居」來看，則可以理解「離散」論述中，造成認同形塑、地方形塑的流動性文化、社會的多元因素。人文地理學對認同與地方感建構的論述，則可以做為解釋其型塑內容的解析方式；在 Harvey 的時空壓縮、創造性的破壞，以 Pred 的感覺結構及 Castells 空間的流動、網絡社會、認同的三型式則闡述一種內與外的辯證關係，地方、認同的流動性。在確立了上述理論脈絡與關係之後，下文將回到台灣近代對於認同與地方、城鄉發展的相關研究與論述在社會實踐的狀況，以做出本土與論述上比

較，並進一步建構本研究之研究方法與架構。

第四節 台灣近代認同、地方論述以及城鄉發展研究的觀點

一 論述發展與地方研究觀點的斷層

基於上述理論回顧的脈絡，本研究所關注的概念範疇將落在離散、遷移及認同的建構與流動。本文以公興村生產與居住空間疏離現象做為研究對象，以現代性、認同流動、離散的概念下，試圖建構詮釋此生活型態、文化與社會、城鄉關係的變遷意義。因此在國內相關研究與文獻的回顧，將試圖釐清離散概念在國內運用到遷移、城鄉、聚落等論述之中的狀況。而另一方面，將檢視國內關於認同論述上在社區、聚落、文化、生活型態的應用觀點，以及國內在認同論述範疇下相對於城鄉發展實踐策略上的研究取向為何。

2.4.1 傳統遷移理論—實證、量化為主，認同為輔

本研究瀏覽國內以遷移作為主要研究主題之期刊、論文，得知大多以實證、量化作為研究方法，而多以針對特定族群、特定區域、特定類型作為研究對象，並探討其遷移的原因。如〈住宅改善與居住遷移行為--以經濟理性與社會關係雙元性觀點的解釋〉(靳燕玲, 2010)、〈台灣人口遷移屬性與動機的變化〉(洪嘉瑜、銀慶貞, 2008)、〈台灣 1.5 代年輕回流移民之適應與認同〉(陳鈺淳, 2010)、〈家戶遷移與居住品質變化關係之研究—台北縣市的實證分析〉(陳淑美、張金鶚、陳建良, 2004)、〈台灣地區近年來遷移行為變化之影響因素分析—家戶遷移決策與遷移地點選擇之聯合估計〉(薛立敏、曾喜鵬、謝鈺偉, 2007)、〈遷移、嬗變與認同：從加州蒙特利公園市到聖蓋博谷華人移民社區之型塑(1965~2006)〉(洪玉儒, 2007)、〈台灣區域重大交通建設對家戶區域間遷移與住宅區位之聯合選擇決策〉(葉淑婷, 2010)、〈區域人口遷入台北都會區地點選擇之實證研究〉(薛立敏、曾喜鵬、陳雅君, 2002)、〈日久他鄉是故鄉加拿大臺裔移民的心聲〉(姜蘭虹、黃禮強, 2009)。由研究篇名，即可看出以上列舉之研究，大多將遷移視為單次的、特例的；而直接該移動現象視為傳統遷移之中所定義的立場去研究，其中不乏由居住、生活品質改善、經濟觀點、遷移之因素與考量、單一的社會與物質環境因素的變化作為研究觀點。而其中也大約著墨在特定族群、遷移類型、特定條件，而未深入探討地方脈絡、文化、認同等較質性的層面。而其中儘管有部分有觸及認同、價值、情感的部分，但由於研究方法、研究性質與切入點並不是以認同為主，因此僅被作為附加影響的條件。

其中〈住宅改善與居住遷移行為--以經濟理性與社會關係雙元性觀點的解釋〉、〈台灣 1.5 代年輕回流移民之適應與認同〉、〈日久他鄉是故鄉加拿大臺裔移民的心聲〉三篇文章已比起其他文章較接近本研究所欲探討的內容，但仍相差頗大。

〈住宅改善與居住遷移行為--以經濟理性與社會關係雙元性觀點的解釋〉一文中，引用 Heidegger 「定居」的概念，試圖回顧何謂家與棲所。但文中其餘部分，仍多以市場、經濟的量化討論，而無明確建立現象學與遷移論述之間的關係，因此仍屬停留在傳統遷移的論述方式。〈台灣 1.5 代年輕回流移民之適應與認同〉一文，以跨國留學生日後的回流情形作為研究對象，並試圖探討其自我認同、國族認同與遷移的關係。該研究試圖探討家鄉與他鄉之間歸返的關係，但卻無將離散的概念應用至論述之中，而其認同的討論也僅在自我認同、國族認同上著墨，並無建立遷移與歸返此種動態過程的認同空間上、流動上的關聯性；儘管此文強調以質性研究做為該文的研究方式，卻無彙整出一有系統的理論脈絡作為該論文的框架，而導致該文在敘述上、論述上過於零散、無法深入討論，並時常落入政策的討論與傳統遷移論述的範疇之中，在實證與質性之間打轉，彰顯出一種遷移理論在方法論進步、跨領域上的困境。〈日久他鄉是故鄉加拿大臺裔移民的心聲〉雖然提到歸屬、認同、地方等概念，但仍無以認同、空間的流動概念建立出他鄉與故鄉之間的流動與聯繫關係，僅在抽象的歸屬與國族認同上稍加敘述其情感的連結。以特定類型與族群探討的遷移理論，較難以觸及個人由家鄉生活經驗、文化背景，由此層面探討背後的認同與造成遷移因素上的差異。因此，仍屬於較傳統遷移理論的論述方式，也無使用離散的概念作為解釋遷移內容的方法。

2.4.2 國內城鄉聚落變遷研究類型

上述傳統人口遷移研究，大多關注在都市、社會、經濟層面的一種量化的分析研究，較少涉及空間論述的討論；以城鄉、聚落為主要討論範疇的研究，則較有可能著墨在空間的論述之上。在空間、場域的論述基礎之上，則會落在幾個範疇上討論。首先為外部結構對內部聚落造成的改變，如現代性、現代化、經濟變遷對地方聚落的影響，即一種內外的辯證。其次是討論到遷移的情形，如農村人口外移、都市化等現象。其三為人與地方關係之改變，如認同感的變化。其四為政策、策略、計畫上的對於地方、城鄉的影響與改變，如農村再生條例、社區營造對於城鄉的發展與變遷之影響。以上所敘述的大約為國內關於城鄉研究之中所會觸及到的層面。

敘述城鄉、聚落變遷研究，國內已有相當大量的研究生產。其中又以關注地方產業經濟、歷史社會、策略、地方與認同等範疇作為各種不同面向像的切入點。如〈頂山村聚落發展的歷史變遷〉(陳彥文, 2010)、〈高雄市草衙地區聚落發展與變遷之研究(終戰後—2006)〉(林玲如, 2008)、〈朴子地區聚落發展與社會變遷之研究〉(李佳芳, 2008)等，以類似建立鄉誌、村誌的歷史性方式，以一個特

定區域中的特定時期做為對象，較直接的建構地方聚落的變遷、發展脈絡。而一般在探討地方、聚落變遷的同時，會以內外辯證的方式探討地方的變遷過程、同時也會敘述到地方、聚落的遷移狀況。但由於以建構聚落的變遷脈絡作為研究的主要目的，在理論部分則較欠缺討論的力道；在使用論述上，如文化、認同、地方、空間論述等層面則較無深入的探討，而大多在發展觀察、政策面向等層面上討論與批判。

另外有建構地方活動、生活內容與地方發展的關係之研究，如以產業狀況為切入點，建構產業變遷狀況及產業與地方關係。如〈客家特色產業與地方發展：以銅鑼杭菊為例〉(黃詩瑜，2011)、〈一個沿海漁村的產業發展與生活空間研究——以嘉義縣網寮為例〉(戴佑純，2003)、〈客家聚落之產業、地景與記憶變遷：以大湖草莓為例〉(劉憶萱，2008)。此類以產業作為切入點的聚落研究，也都以內外辯證的方式建構地方的發展脈絡，並多關切產業的發展狀況、性質、策略，以及產業與地方、生活、人之間的關係，並且也常引用地方、認同的理論作為研究的論述方式。此類研究試圖闡述產業、經濟活動與地方感、認同的建構有密切的關聯。

由以上對於城鄉、聚落變遷研究的回顧，可以大約知其研究的範疇。首先，聚落、城鄉的變遷脈絡之建構，其概念便是一種外部結構與地方之間的辯證過程之建構，如以台灣經濟發展策略、狀況來看地方的產業變遷過程。其次，此類聚落研究，由於研究重點大多在於地方歷史性變遷過程的建構，因此在論述上儘管經常涉略空間、認同、地方等範疇，確實常點到為止而無法對理論做出回應與批判。或者僅單一注重某一層面的論述，如以空間論述為主則在認同論述上較少顧及、若以認同、地方論述為主則忽略空間理論的探討，而導致批判的力道不足。儘管所建構的聚落變遷脈絡涉及眾多現象，往往無法深入對其做出討論。因此，對城鄉、聚落變遷現象有較深入論述探討之研究，則要轉向以文化、認同、空間論述為主要探討重點的跨領域研究，而無法以傳統聚落研究的方式討論。

2.4.3 認同、空間論述為主之城鄉、地方研究

以空間、認同等論述為研究主軸的城鄉聚落研究，是以城鄉狀況做為與理論的分析文本，試圖由觀察聚落、城鄉變遷之中的現象做出其原因的釐清與論述，將理論作為一種解析社會現象、城鄉變遷的觀看方法。此類論文也大多需先建構田野、地方的變遷、發展脈絡，並深入研究所欲探討的現象做出理論上的解釋。如認同的建構與拓展過程、全球化與地方的辯證互動關係、空間性質的詮釋等，此類論文通常建立現象與理論之間的關係與討論，在論述上有較深入的討論，也

較具有批判與檢討社會現象、理論的能力。

〈從地景觀點探討萬巒居民的地方認同〉(徐主驊, 2010)一文以認同做為主要理論主軸, 並以地景變遷的觀察、解析建構出認同與地景變化的關聯性, 並以地方日常生活內容做深入的分析, 討論日常生活實踐與認同、地景之間的關聯。

「萬巒居民地方認同的形成, 並不是來自於虛無飄渺的懷想, 而是來自於實實在在地與萬巒的互動。此形成過程根基於人與地方的連結, 而此連結必然透過與地方的感官經驗而產生[...]」(徐主驊, 2010: i)由此段敘述可以得知該文章對於地方認同的建構方式、過程以及與空間、地方的關係之關注。〈花蓮瑞穗地區感官導向文化產業之研究- 一個身體感官導向的空間論述〉(林佑軒, 2009)一文欲由觀察地方聚落、生活場域, 以建構身體感官與場所的互動關係, 而此種人與場所的感官經驗又如何與空間生產有所關聯, 最後則在回應理論之後, 對地方發展狀況、與政策做出討論。〈近代都蘭部落社會變遷與地方自主性之發展〉(陳佩儀, 2007)一文以建構地方時空歷程變遷脈絡來探討政治權力與計畫、策略等外力的介入, 對於地方認同的變遷之影響關係, 指出地方認同受空間、政治權力的影響, 文中持續的表現出一種內外的辯證張力, 如在結論之敘述:「[...]在大環境之改變與趨勢下, 透過報章媒體之散播, [...]產生Anderson所指稱跨越時空之結合, 也刺激青壯年民族自決、自信心、認同感之產生而回歸部落。[...]」(陳佩儀, 2007: 164)該文闡述了認同、權力、空間在一地方的論述。〈空間與認同-太魯閣人認同建構的歷程〉(沈駿祥, 2007)闡述族群、地方認同在論述霸權下認同的建構, 地方認同在不斷受到外部力量影響、刺激之下有所變化, 但仍能與過去的、傳統的認同保持某種程度上的聯繫。〈歷史性場所的地景變遷與空間再結構過程- 台北市西門市場更新再利用案〉(江宗霖, 2005)一文由都市地景變遷中, 以都市規劃的實行角度, 提出流動空間之趨勢在地方空間中的實踐關係。〈依附或割裂的地方經驗? 台北市寶藏巖聚落的地方認同研究〉(郭柏秀, 2007)一文則試圖辯證認同與地方的依附或斷裂, 在地方發展策略、權力、日常生活實踐等在認同上的複雜建構關係。

上述列舉之研究, 除了包含傳統聚落研究所具備的地方、聚落變遷與發展脈絡的內容之外, 並與該研究欲討論之理論相互討論, 如認同、地方、空間、權力、政策等層面, 有較扎實、深入的論述理論的脈絡, 並結合各自田野的資料與分析, 較能提出批判性、推進理論的觀點, 已較前述傳統聚落研究在方法、論述上更具開創性、進步性。儘管如此, 上述研究在各個理論上的關係之建構, 如時空、認同、地方等理論彼此之間並未建構一條具脈絡性的關係, 也未見在理論與城鄉、聚落現象的論述、提出觀點後, 將其落實到空間理論的討論之中。而推測其原因,

可能是無一具體、得以統整各層面內容的論述概念供各個內容整合，導致在論述的敘述上在認同、地方、空間、政策及城鄉田野現象之間徘徊、散落。

本研究認為，離散的概念可作為整合認同、文化、政治等因素，作為解釋城鄉聚落現象的方法，並得以用其重新詮釋時空之意義，如時空流變。以下將回顧離散概念在國內的研究狀況。

2.4.4 離散的研究範疇

離散(diaspora)在傳統的使用上大多用以描述一種受迫離開家園、伴隨著歸返的困難而繼起的一種失落、惆悵感。而最初生產出離散的現象，則是關注在受宗教、戰爭、政治等力量被迫離開家園的跨界族群；而此種失落與惆悵則是通常在文學創作之中得以被窺見。因此，基於上述離散的兩個基礎，離散研究則大多落在兩類範疇之中，一類文文學、藝術如，歷史文本、小說、電影、劇本、自傳等。另一類則是落在社會學的跨界、跨國的遷移研究，如族群的移動、國族或族群的議題、跨國移民等領域，該領域作為離散概念的藍本，因此而有相當多類似的研究生產。而離散研究則與文化混雜及後殖民論述有密切的關聯性，在資訊、權力受到主流優勢團體的操控，並在當代資訊、空間得以快速流動、滲透、覆蓋在廣大的空間範圍之中，外部結構如全球化、資本主義、國家權力、制度與策略是以一種後殖民的方式在價值觀、文化、物質上在傳統地方場域上表現出複雜的文化、認同的再結構。而此種辯證、再結構所體現出的社會、文化、聚落變遷、人的移動則可將其視為一種無意識的受殖民變遷。Kalra 等人指出：

從鄉村到都市的遷移，以及從勞工階級升遷至中尺階級的流動性，也牽引出離散的若干本質。[...]在跨國遷徙中，種族歧視、對國家的效忠以及歸屬的問題，全都變得息息相關，這些問題在從鄉村到都市的遷徙中，可以找到相應之處，但並非總市價帶著非常近似的迫切性或同樣的威脅。當然在不同的方式中，它也有可能是迫切和充滿威脅的。(Kalra, 2008: 32-33)

因此，離散概念在空間、城鄉領域用以解釋社會、文化、聚落變遷的方法是允許的。以下將回顧國內流動、離散概念的相關研究。

2.4.5 移民離散研究

儘管離散與遷移有密切的關聯，但離散研究仍多以文學類的研究為多，以離散作為討論遷移的研究仍屬少數。而儘管以離散、認同作為論述，但其研究則大

多以跨國移民作為對象。以下列舉較以認同建構、流變以及離散概念討論移民之研究，並概述其內容。

〈以伊里亞斯結構(Figuration)理論看城鄉移民社區之形成策略以花蓮縣海西村台北市田尾社區為例〉(何子安，2001)一文由時代轉變而造成的城鄉問題，探討城鄉移民的議題。該文認為在城鄉變遷過程中，生活場域出現「失序」的狀況，並認為城鄉移民、聚落變遷是一種為重新找回「秩序」而導致的調適與轉變。文中引用傅抑止(1997)對於城鄉移民的看法認為，城鄉移民儘管離開家鄉到他鄉生活，但其文化與生活未必就此與家鄉失去聯繫，而認為此遷移現象是為適應現代生活，而做出的調適；而在遷移之後，也有能力重新適應新的結構，並重組生活方式。(何子安，2001：13)該文試圖打破過去城鄉、公私、固著與流動等二元論的討論方式，認為都市、時代結構即是一種流動的集成。都市包含各種移民，作為移民共同生活的場域。(何子安，2001：75)。

〈遷移,文化與認同：緬華移民的社群建構與跨國網絡〉(翟振孝，2006)也指出移動是為適應當代生活方式之調適，是一種由傳統文化朝向現代的過度方式。而遷移、移民所代表的不是一種「失根的」、不是與家鄉場域、文化脫節的，而是在遷居地與不同的社會、文化、經濟相互衝擊，並反映出當代社會時空的轉變。(翟振孝，2006：5)該文試圖考察移民在遷居地的日常實踐、活動中，闡述移民族群與家鄉社會、文化的關聯性。

〈文化的認同與變遷--以居住台灣的雲南人為例〉(葉子香，2009)一文同樣以移民族群，探討遷移之後，其自身族群認同、文化上，在遷移地的再結構過程。文中以考察遷移族群的遷移因素、遷移後的經歷、遷移的路徑與形式及遷移後在遷移地所形成的聚落與生活方式，再考察遷移族群原本的在家鄉的集體記憶、宗教、文化、認同等內容，試圖建立家鄉、原族群文化、認同與遷居地上的狀況之關聯。族群文化是持續做為基礎在遷移地傳承、延續，抑或是與家鄉、族群認同脫節。

〈跨界流動中的族群保存與跨文化認同建構之間的辯證拉據--以在台灣工作的馬來西亞華人為例〉(陳心圍，2010)一文論及一文化接觸環境結構變遷之後，其認同會傾向流動的狀態。而移民則為在該結構中得以獲得更好的生活品質，因此盡力與其融合以寄宿在該社會、經濟結構之下。並認為認同是有彈性、不穩定、暫時性的。該文也以考察移民者遷移前後的生活狀況、文化、認同等層面，試圖建構兩者的關係。

2.4.6 文化領域與城鄉領域的論述落差

上述列舉離散之研究，以遷移現象作為研究對象，並視認同、地方、空間為流動之性質，對遷移有不同與以往傳統研究的論述。一方面藉由離散研究進展，得以對遷移、移民現象有更深入的探討與開創不同的觀點；另一方面，也藉由現象的解釋，將認同、空間理論建立更完整的論述、推進論述的進步。而在回顧離散相關的研究後，發現在人類學、社會學、文化研究等領域對空間、認同論述上有較進步式的觀點，但卻鮮少落實在城鄉、聚落、建築等領域之中。而前者的學科領域較少觸及實際城鄉、都市與聚落文化研究的使用。而後者則缺乏以離散概念來檢視空間、認同論述，並與城鄉現象結合討論。目前城鄉領域的研究多以過去人文地理學所論述的「地方」概念作為先驗基礎，直接在其概念下做提出對城鄉狀況、政策、實踐、規劃上的批判與討論，因而僅能成為策略、方法上的修正參考，而未能檢視其方法、策略實踐上的正當性。

然後在離散研究中，大多用以討論文學、認同、跨界移民等範疇，在上述案例中未能見到以離散概念作為解釋區域上城鄉關係與聚落變遷的現象。即在傳統離散研究中，以跨國、跨界遷移作為研究對象，因其較能彰顯、符合離散所需探討內容。因此，以離散的方式探討城鄉遷移抑或日常性的移動之研究則相當稀少，也無將離散作為解釋聚落型態方法之研究。而本文即意圖以離散、認同作為解釋現代城鄉關係、聚落型態、生活模式之方法。

第五節 小結—認同的流變性質與國內社會實踐論述的矛盾

2.5.1 空間、文化論述的轉型脈絡—鄉愁成為普遍社會價值與文化實踐方式

本節討論傳統與現代的特徵差異、認同固著到流變、遷移的單次性到持續性的觀點等論述上的轉型脈絡，試圖闡述論述轉型過程中所呈現出的辯證張力。現代性的時空壓縮對傳統結構造成衝擊，促成社會、文化結構劇烈快速的轉變；Harvey 稱其劇烈的轉變為「創造性的破壞」，顯示出社會、文化群體面對結構轉變的衝擊下具有調適、應對的能力，勢必會以新的形態來呼應結構與時空性質的轉變。然而現代性使人的生活方式、心理狀態與過去傳統結構快速疏離，文化、社會在與現代性再結構的過程中處於極不安定的狀態之中。此不安定狀態則促使帶有歸返性、抵抗性的鄉愁感擴大，歸返與抵抗的意識遂成為社會與文化中促成論述、策略制度與社會價值生產的核心方向。也因此此時所生產之文化、認同等論述與城鄉觀察觀點，大多將社會、文化、城鄉聚落的變化視為一種脫離本質性的異化、危機現象，如人文地理學。

之後在 Seamon、Creswell、Pred、Castells 等人對認同與地方的論述中，可看出論述的轉型跡象；文化、社會、認同與地方不再被視為具有固著不變的樣貌與本質，其被建構性與流變性在往後的空間、社會論述中，逐漸成為論述中的典範。然而在現代性所促使鄉愁性的現象詮釋論述大量生產下，其意識形態、制度策略、知識技術等以廣泛深遠的與社會、文化結構結合；因此在日後論述的轉型與修正上也日趨緩慢與困難，諸多過度鄉愁式、本質論的意識已與社會、文化的實踐緊密的結合而難以抽離。因此本章欲透過回顧空間、文化社會等相關論述之發展脈絡，以具備本文理解所觀察、分析現象之辯證能力，並建立本文論述觀點與立場，將分述如下。

2.5.2 論述觀點—時間性下恆定的認同流動與轉變

根據本章所探討與回顧之論述，可提出本文之論述觀點與立場。其主要欲站在與本質論相對的立場上，即時空性質的恆動性促成社會、文化、認同、空間地景等形而上以及物質性層面的持續再結構，無一是靜止、穩固、永恆不變的。以下將敘述對認同性質所持之觀點：

(一)文化、認同具累積性與延續性

為 Pred 所提的結構歷程概念，文化、認同隨時間流動而持續累積在主體之上，是不斷疊加、拓展、連續的概念，彰顯了主體的時間性，而非無時間性。

(二)鄉愁與認同具歸返性

而上述累積、疊加、連續的狀態，是在時間流動中透過不斷的在感官身體、心理精神上的追憶而得以形成。其過去僅能透過追憶而再現在腦中，透過不斷的追憶而形成鄉愁。累積與延續性是透過記憶而形成，而記憶則因追憶而得以存在、再現。因此在日常持續追憶之中，即是持續的處於欲歸返記憶所再現的樣貌之處；而其通常是個人在過去時間流逝所累積認同、具意義的場景，如對「定居」的記憶與想像。

(三)文化、認同具抵抗性的實踐與再生產

在上述鄉愁與認同的歸返性質下，即代表欲與時間的流變性抗衡，試圖延續、維持追憶中所認同的、具安定感的「定居」樣貌。而此心理的抵抗性質即影響主體的日常實踐，即是在時間的流動、日常生活中則會試圖盡力維持、試圖延續該認同的樣貌而實踐，而致使主體不盡然完全受時間流動性而行；而是具有抵抗性的、歸返性的持續地進行文化、認同的再生產。在此性質下，隨時間而變遷、所體現出物質性的現象如社會經濟、聚落地景的變遷，是已經過主體在認同具抵抗性的辯證所體現的。

(四)認同的移動性與空間性

而人存在於時間流動之中，即處於一個持續移動的狀態中；即在日常生活實踐過程中勢必在空間上持續的移動。因此隨時間的流動，在空間上移動則持續地累積記憶、促成文化與認同的再生產。

(五)認同的辯證性

認同具累積性、歸返性及抵抗性、移動性與空間性之下，其認同主體根據外部社會、經濟結構轉變而有所呼應。即是在上述認同所具備的性質、認同與文化地域的性質、社經結構的轉變趨勢之間相互辯證，而持續推進、改變認同與文化的樣貌。

根據以上認同的性質，可以做為本文觀察、分析現象的觀點，如探討鄉村人口外移的現象時，不再直接將其視為鄉村危機、視為單次的遷移現象；而可能是在地方再結構過程中，認同的轉變過程。以及認同的轉移、流變過程，是具有延續性、異地的聯繫性；而不是視為認同在變遷過程中可能是斷裂的、失根的。以下將闡述本文的研究對象性質、以及研究方法。

第三章 公興村民生活場域的轉移過程－外移與歸返

本章由交通發展造成的時空性質變化來看公興村民生活場域的轉移脈絡。公興村在社會、經濟結構轉變後傳統經濟衰退，促使村民向外流移；而後因阿里山公路開通，地方與外部區域的時空隔閡降低，促使公興產業得以轉型、經濟復甦，吸引在外流移的村民歸返。而在歸返後則持續調整日常的移動與生活場域，形成不同於傳統的生活場域樣貌；以能在時空性質與社經結構轉變後，以新的方式及文化與認同的樣貌持續「定居」於原鄉。

第一節 公興村在台灣現代化、經濟轉型過程的地方狀況－城鄉不均衡發展

公興村在環境、地理上的特殊性質之下，與外部的現代化發展狀況有所差異。如現代化的程度及與整體經濟轉型的接軌狀況；以嘉義市及公興村來說，都市在當時整體發展趨勢中，現代化力道集中在都市區域，資本主義工商業發展是適合於都市的經濟型態。現代化程度，嘉義市相對的比公興村來的高與完整，即現代化不是齊頭式的，而是先都市而後鄉村的空間不均衡發展狀況。另一方面，鄉村由於其基礎性質與區位條件上與都市的差異，因此在當時經濟發展策略注重在都市時，鄉村的經濟策略上則尚未有較多的轉型計畫。一方面也是因都市經濟市場正值開發，市場潛力、發展空間仍大，而尚未拓展至鄉村區域。

3.1.1 鄉村與都市性質上的差異－都市為資本經濟之象徵與現代化重點

鄉村與都市兩者之間之所以得以明顯區分，是與工業革命後的現代化推進與資本主義的崛起有密切的關係。

現代都市的發生與轉型與工業革命有很大的關聯性，工業革命不但帶來製造業工作機會與投資機會，改變傳統一級產業為主的社會結構，帶動農村人口流入都市就業區，就業區的組成也帶動了關聯性工業及商業機會，促成都市的成長與擴張，造就了都市文明的新價值觀與生活方式。(劉曜華，2004：7)

資本主義帶動的經濟轉型，影響了現代化工程進行的區域次序。資本、工商經濟青睞的場域條件，講究快速流通、集散的性質。因此一聚落區位在區域上中的性質，若處於交通流通、交會頻繁的地點，便具有成為日後經濟、現代化發展重點的潛力，並具有發展為較大都市的可能性。因此，聚落之所以各自成為鄉村或城市，是基於特定聚落的區位條件利於資本經濟發展，使其有較多發展的可能性；

此一發展，便顯現出聚落之間的差異，遂有城鄉之分。而此城鄉差異則在日後交通、資訊技術更加發展，時空流動與壓縮更為加劇後，其差異將更加突顯。

Georg Simmel 對都市的性質與鄉村的差異有深刻的描寫：

[...]大都會以其街道的縱橫交錯以及經濟、職業和社會生活的發展迅速和型態多樣，造成了他的心理環境。[...]與小城鎮和鄉村生活的感官—精神狀態那種更加緩慢、更加熟悉、更加平穩流暢的韻律形成了深刻的對比。[...]大都會一職是貨幣經濟的中心，因為商業活動的多面性和集中性賦予交換中介一種重要性，而這是鄉村生活的商業狀況達不到的。[...] (Simmel, 2008: 92)

Simmel 以精神、心理狀態的層面，以鄉村性質與都市做比較。即相較之下，鄉村是平穩而緩慢，都市是錯綜而快速。資本經濟崛起、貨幣高度流通、並集中於都市。現代化建設與資本主義皆具有流動、快速的性質，因此都市即成為資本主義、現代工商經濟的象徵。而一國家、區域在經濟結構轉向現代資本經濟過程中，將首重都市的發展，即經濟策略與建設將首重在都市區域，發展起步與速率相對於鄉村更早而快速。

3.1.2 經濟結構轉型過程鄉村的經濟空窗期—鄉村居民受迫性的向外流移

在上述資本主義促使都市現代化、使其得以與因時空性質轉向流變性而促使的經濟結構轉型銜接時，鄉村時空性質條件相對的與資本經濟的脈絡有所脫節；而此屬於國家、區域上整體經濟結構的變動，當主要社會、經濟結構逐漸由傳統農本經濟日趨轉向資本工商經濟時，其政策、發展重點皆著重於都市，鄉村舊有的經濟性質與策略則尚未能適應新的經濟結構狀況。此時都市則是正具有開發價值，市場潛力之時期，因此資本勢力尚未積極向都市之外的鄉村區域擴展。但也因此變使得鄉村經濟在經濟結構轉型過程中，出現了轉型的空窗期。

上述狀況在資本經濟積極介入經濟結構，鄉村場域尚未被納入資本經濟的市場之中。造成此空窗期的原因除了因應經濟進入下一階段發展進程的必然轉型，也與國家、區域城鄉經濟發展策略有關。此空窗期通常促使鄉村劇烈轉變、鄉村人群向鄉村之外移動的狀況產生。在上述都市與鄉村兩種狀況，即所促使的城鄉移動現象，通常以都市化作為統稱：

都市化過程伴隨著城鄉移民(urban-rural migration)的模式，這是都市成長的主要原因。城鄉移民基本上源於傳統農業的破壞。人們遷移並不是因為他們

如此樂於住在城市之中，也不是信服電視及廣告。人們大量離開農村，是因為他們活不下去，飢餓、子女無職業、得不到健康服務等。換言之，大部分第三世界的都市化並不是由於城市之工業發展，而是由於鄉村地區的農業危機，破壞了傳統的農業。這些過程在工業化伴同發生的地區，就吸引了更多由鄉村地區去的移民。(夏鑄九，1988：165)

因此鄉村居民在未能於地方取得生存所需的經濟，迫使必須離開鄉村、向外流移以尋找新的經濟來源。上述為資本經濟轉型、現代化過程，都市與鄉村的狀況之概念敘述，以下將概述國內現代化、經濟轉型過程的實際內容與脈絡。

3.1.3 台灣轉向現代資本經濟與現代化之歷程－殖民式的經濟發展主義

(一)日治殖民時期：支持日本現代化、工業化－「農業台灣，工業日本」

殖民時期日本對台灣的建設與政策，使台灣步入現代化的腳步與奠定未來經濟朝資本主義發展的基礎。如改革幣制、人口調查、基礎建設、交通建設、農業技術改良、開設銀行、水電建設等。(陳添壽，2009：182) 初期為支持日本現代化、工業化之需求固有「農業台灣，工業日本」；而在 1930 年之後則為供應日本戰爭之需求，遂開始在台灣發展工業。這一連串的轉折使得日治前與日治後的台灣由傳統農業社會轉型為半農半工之社會(張勝彥，1996：222)。另一方面，在日本在台灣引進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邏輯，其現代化即首先開始在都市發生。此時城鄉差異雖然仍不明顯，但卻已促使經濟結構開始初步轉型，都市化現象逐具雛型。如陳正茂指出：

由於工業的發展，三〇年代中期以後，台灣職工人數增加較快，顯然是戰時「工業化」所引起的。工人的來源為農村外流的人口。當時由於農村家庭人口增加，許多人耕種自己的土地而不出租，迫使佃農流向城市尋找就業機會。(陳正茂，2003：131)

即是台灣經濟結構越轉型至資本主義、現代化程度越高、整體時空流動與壓縮情形越為顯現，則鄉村越無法依靠農業，鄉村居民向外流移的現象也逐漸加劇。

(二)國民政府初期：土地改革－以邁向工商經濟、與全球經濟體系接軌為目標

在 1949 年國民黨遷台後，為穩定台灣經濟，首先推行的土地政策有「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耕者有其田」，快速恢復農業生產與電力、糖業、肥料、

水泥等工業，1952年已恢復戰前水準（張勝彥，1996：324）。此穩定鄉村農業經濟政策，實際上是做為支持未來快速現代化、邁入資本經濟、出口貿易進入全球經濟市場的基礎。初經戰後，鄉村農業經濟僅求回復戰前水準，而之後農業產品則做為初步開拓出口貿易市場所用；以農產品打開台灣的經濟外銷、出口的大門，與整體經濟市場接軌。而此時屬農業價值較高的時期，但隨農業技術提高，與現代化建設進行，城鄉移動現象仍持續發生。

(三)快速現代化：以農養工－全力支持經濟結構向工商服務業轉型

1953年開始，台灣是以「以農業培養工業，以工業發展農業」的原則在發展。以至於往後的20年台灣的農業資本不斷轉移至非農部門，使得台灣工業得以起飛（黃俊傑，1985：245）。一方面都市快速的現代化，使其得以與資本主義經濟接軌，持續往商業、服務業發展。而鄉村現代化過程緩慢，經濟結構轉向工商業後，農業成為經濟結構中的底層產業；此時期因工商業穩固、都市現代化發展完備，是台灣整體經濟狀況最佳的時期。都市得以完整轉換、獲得經濟轉型後的價值；相對的也是鄉村經濟最為衰退，鄉村人口大量向都市區域移動的高度都市化時期。

(四)抑止農業經濟衰退速度－補救性農村建設與政策

其後，政府則試圖挽救該鄉村農業；遂之後便陸續推行各項農村相關政策如1972年的「加速農村建設九大措施」，代表台灣農村由戰後時期的狀況邁向下一個階段。1973年公布「農業發展條例」，條例第一條指出：「加速農業現代化，促進農業生產，增加農民所得，提高農民生活水準。」在1976年六年經建計劃後陸續有「保證收購餘糧價格」、「提高農民所得加強農村建設方案」及「第二期提高農民所得加強農村建設方案」。接著在1983年實施的「八萬農業建設大軍之遴選及組織要點」，其實施構想有三點為建立八萬農業生力軍、重建農民信心、開創農村新面貌（黃俊傑，1985：252-253）。

由政府開始重視鄉村建設的時間可見，自國民政府來台、以現代化及經濟轉型等提升經濟為發展目標以來20多年間，將資源、建設完全投入在都市、工商業之中；而對於農業區域、鄉村，則是僅投入最低限度的建設，以及以政策、產銷面向來維持農產經濟價值，以抑止鄉村人口向外移動，安定地方經濟與生活。

3.1.4 鄉村向外流移原因－鄉村與外部都市區域的時空距離與隔閡

上文敘述城鄉性質，以及台灣的經濟、城鄉發展策略，所造成的城鄉差異。

至此可稍微歸納鄉村居民向外部流移，或移動、生活場域脫離家鄉、在外部停留時間增加之因素：

- (一) 農業技術提高，單位面積生產量提高，但所需勞動力降低。
- (二) 產量提高，供需比例轉變，單位農產價格並為明顯提升。
- (三) 經濟結構轉向，傳統農產價格衰退。
- (四) 鄉村人口增長，土地面積有限。
- (五) 整體經濟發展，生活水準欲提升；生活上對貨幣消費、分工工業製品依賴性提高。
- (六) 鄉村現代化、交通建設緩慢；內外溝通性低、時空距離大。

針對(六)黃俊傑曾對其做出解釋：「愈是農業色彩濃厚的地區的農民，對農業的疏離感越愈強。住在都市或工業區邊緣的農民，則由於農業外就業機會的相對充裕，使他們對農業危機的感受和體認較不深刻，因此，他們對農業的疏離感也較不顯著。」(黃俊傑，1985：284)。因此，鄉村的向外移動、遷移情形，則會因鄉村跟都市間的時空距離、隔閡的程度差異而有所不同。

3.1.5 鄉村經濟性質轉變—傳統經濟不合時宜、鄉村無法作為定居的場域

上述為經濟、現代化、技術發展等角度歸納出造成鄉村村民向外流移之因素；也是台灣一般性的鄉村村民向都市移動而造成的都市化現象。鄉村在面臨劇烈、快速的經濟結構轉型狀況，原本以傳統農業為主要經濟活動的鄉村；長久依據地方、場域環境性質而來調適出的經濟型態在整體經濟結構轉型下，不再得以作為經濟來源的依賴方式。因此必須尋找、調適新的安定方法，即傳統農業難以再適宜作為鄉村居民緊密依附於地方定居的純粹方式。

而許多學者也在當時以各種方法指出傳統農業與居民關係之改變，誠如黃俊傑對農業、農村在台灣經濟發展過程關係的變化上的敘述，由人口變化上來看：

四十八(1959)年以後至六十七(1978)年間，幾乎所有農業縣份都有淨移出人口[...]。以上這種人口學的統計數字具體而微地烘托出一幅老弱婦孺留守農村，壯者移往都市的景象，強烈地顯示青年農民對農業與農村的疏離感(黃俊傑，1985：284)。

由認同的轉變來看：

農業在全國經濟結構中的重要性逐漸降低，農民收益偏低，所以農民逐漸對農業產生疏離感。[...]長期不景氣，造成農民對農業普遍缺乏信心。[...]愈是農業色彩濃厚的地區的農民，對農業的疏離感愈強。(黃俊傑，1985：293)。

而其對於農業對於鄉村居民的性質、意義轉變描述：

[...]農村居民職業的多元化，逐漸使他們不再像以前的農民一樣把農業作為生活方式，把土地視為安身立命的寄託。現在的農村居民逐漸把農業作為一種生活手段，而土地則成為一種具有價值儲存功能的商品。就社會及心理的角度來看，現在的農村居民已經從農業及農村中游離出來。(黃俊傑，1985：293)

[...]土地的性格逐漸從「神聖」走向「世俗」，農業也逐漸從一種韋伯(Max Weber)所說的「志業」(vocation)或生活方式轉化成一種謀生工具或生活手段(廖正宏 黃俊傑，1992：101)。

由上文敘述來看，傳統農業在整體經濟結構轉型、並內納入整體經濟體系之後，已無法作為滿足區域、傳統生活場域中所需的經濟來源。原本在地方上能達到「定居」的方法，已然失效，而導致鄉村、聚落與傳統「定居」的生活型態疏離，進入了不安定的生活型態與場域變動的狀態。整體經濟結構在區域上的不均衡轉型現象，促使鄉村居民不能再在時空性質與外部有所落差的傳統生活場域之中生活；在時空流動性、滲透性日漸加劇後，必須向外部拓展，以找尋自身在時代中新的「定居」方式。

3.1.6 城鄉變遷的意義－鄉村居民向外流移是為文化、認同的調適與修復

本節敘述鄉村在整體社經、文化結構轉變而促使鄉村居民向外流移的頻率增加。此時期在現代化、經濟發展皆著重在都市的狀況下，鄉村難以傳統的方式達成「定居」，基本的生活延續變得困難；因而鄉村村民在此時期遂向外部尋求發展機會，藉由生活場域的移轉試圖與外部社會、經濟結構連結，以渡過整體結構注重於都市發展、早期資本主義轉換所造成鄉村經濟的空窗期。

若將移動與生活場域的轉變視為延續地方主體為延續自身的文化與認同，則

可跳脫以往對於鄉村問題的範疇。鄉村雖有地方主體向外流移的狀況，而持續關注其流移的過程則發現有不同的移動現象。本節以台灣整體社經結構、城鄉發展狀況做出與生活場域轉移關係的概述，而以下將以公興村自身的性質、居民自身的生活經驗、文化脈絡來探討公興村的移動、歸返等狀況。

第二節 公興村民向外流動、轉移生活場域—公興無法維持生活

公興村在社經文化結構變遷下，同樣面臨現代化硬體與道路建設緩慢、傳統農產業價格衰退等狀況。本節將敘述公興村在該時空性質時下與經濟、地方狀況時，居民向外流動、拓展移動場域範圍、與外部互動的狀況。

3.2.1 現代化程度、交通建設狀況—交通不良、汽機車不普及、內外時空隔閡大

(一) 阿里山林業轉向觀光—現代化程度與都市的落差

阿里山區域包含公興村，其現代化建設與交通道路設施的發展狀況，可以1982年阿里山公路開通做為分水嶺。在此之前，阿里山區域由日治時期便以林業為主，而現代化狀況，也以林業設施為主，如阿里山林鐵。截至1960-70年代，阿里山林木資源逐漸砍伐殆盡，隨後阿里山區域的經濟角色遂逐漸轉向觀光。阿里山遂由原本以林業經濟為主，而觀光、旅遊休閒都受到嚴格限制的狀態，逐步開放轉向觀光發展。另一方面也開始規劃阿里山山區的各項建設，如阿里山公路、阿里山遊樂區等設施，此時以將阿里山區域發展為觀光重地為目標，進行各項現代化建設。

其中阿里山公路的開通對於公興村有較直接的影響，居民對其生活經驗、經濟狀況也以阿里山開通前後作為一階段的區隔為多，並且在村民的認知上，經濟狀況較差的時期與阿里山公路開通前有直接的連結。嘉義市做為林業都市，其都市發展、現代化設施，多是依靠林業遂得以有所發展；在戰後政府持續的砍伐阿里山及其周邊的林業資源，以支持發展嘉義市經濟發展。而後林業資源於1950-60年代殆盡，此時正為上文所述台灣經濟結構轉型之際，農業價值衰退，現代化、經濟建設以都市為主而忽略鄉村。政府由1960後才逐漸為發展阿里山觀光而開始重視阿里山區的現代化建設，而到1982年阿里山公路方建設完成；但與整體經濟結構轉型與都市現代化過程已差距已久。

(二) 交通、道路與運輸狀況—路況不良

阿里山公路開通前，除了公興村聯外交通狀況不佳外，通往各聚落的聯絡道路狀況更是不良。根據村民所述，阿里山公路未開通前，要販售其農產品，經常需要以步行的方式，將產品運至山下的觸口，方得以販售。而要載運較大量的物資之時，則有定期性大型貨車流通：

[...]到1982年那時候路才開通，之前路都很差，都要挑出去到觸口去賣。[...]大卡車有時候要爬起來也還是有困難，比較大件的東西都是用卡車起來這邊

去載運，路也蠻差的。[...]有時候你要是比較大的農產品，大卡車起來可以叫他載運下去。不然其他的人一定要用走的，要到觸口那才有公車。(訪談 3-A3：2)

由此可知，當時若要通往嘉義市則需先到達觸口，方能透過大眾運輸到達嘉義市。

而當時公興村連接各聚落的交通狀況發展緩慢，直至 1970 年代左右仍常需依靠步行來作為日常生活如通學等需求的移動，而到後來道路狀況改善之後才逐漸以機車取代步行。

[...]在我們這代，小時候都曾經走很長的一段路去讀國小，我們是覺得那很累。[...] (訪談 1-A1：10)

[以前]山上不是柏油路，山上現在要去我們家的那一條路比較小，現在是拓寬過的。以前比較小，又是石頭路。(訪談 2-A2：8) [...]因為交通真的很不方便。[...]以前真的是像我們那個交通，只有人可以走嘛，腳踏車摩托車甚麼都不行。[...] (訪談 2-A2：10)

[...]我們歲數少的時候[機車]技術就不錯。[...]一個橋沒多寬，機車還給他騎過去，我聽說別人載一袋米又載一個人，那你看多危險。[...] (訪談 3-A3：4)

儘管機車較普及後可以機車代步，但道路狀況差，得已以機車通行的道路有限。通往各聚落的聯絡道路狀況則更晚改善，至 1982 年阿里山公路開通後，才逐步鋪設、改善至各聚落之內的聯絡道路。

(三)資訊傳遞與接收－零星的接收

在上述交通狀況之下，報紙、信件等資訊的傳遞上也有所受限：

[...報紙]都一個禮拜來三天、兩天而已。(訪談 3-A3：17)

[...]因為我們那邊連郵差也沒有啊，郵差也上不去。[...]信就在那個我們阿里山公路中華民俗村那邊有一個。[...]我們七鄰的郵筒。(訪談 2-A2：13)

而當時資訊媒體的傳播技術也尚不完善：

我們那時候山區也沒有裝那個小耳朵，也沒有有線電視。[...]你電視就台視、中視、華視嘛，像民視稍微有時候會接收到。[...]如果天氣不好氣候不好還接收不到，所以固定只有三台，所以你的資訊甚麼的都沒有啊。(訪談 2-A2：6)

由上文敘述可知，在當時台灣工商業經濟、都市現代化發展最蓬勃的時期，公興村在交通、道路等基礎現代化建設仍未完備。此落差遂影響了日常移動溝通、通學、經濟、產業運輸、向外部移動的頻率與易達性等層面，為時空距離、隔閡與外部較大的時期。

3.2.2 傳統產業價值衰退、發展前景低—地方經濟難維持造成居民外移

公興村當時在上述的現代化、交通狀況下，伴隨著整體經濟結構轉型，一方面傳統農業衰退，地方時空性質無法滿足新的經濟結構需要流動性、集散性質的需求。公興村在該交通狀況之下，著實使地方經濟的發展、轉型遇到的困境。地方經濟衰退，無法維持生活所需，而必須向外部移動，尋求新的經濟來源。

(一)公興村經濟狀況—傳統產業衰退

儘管在日治時期已有相當程度的現代化，但大體上鄉村僅限於農業設備與技術的層面。公興村在日治、國民政府來台時的產業，根據村民口述，得知有稻米、竹筍、五穀、玉米、樟腦、石灰、造紙等產業。1950年代開始，台灣是以「農業培養工業」的原則在發展，此期間台灣農產量提高，但相對的農業資本不斷的轉移至非農部門。在農業產量增加的同時，也使得農產價格持續下降，加上各種新興工作機會出現，鄉村村民有普遍的向外流移現象。至於耕地面積較小的公興村更失去與平地農業競爭的基礎，以至於公興村在此之後面臨產業與生活上的劇烈變遷。以下為公興村村民敘述當時公興村經濟變遷的狀況：

我比較記憶深刻的就是說，最大的變遷是五、六零年代[民]這邊，那時候該出去的出去，土地該賣的賣，阿當然也有人進駐啦。也有人進來這，多少討生活。可是這在地的產業在那個時候變遷很大啦，這筍沒割了嘛，沒割了以後改做茶，不然你生活上不夠用啊。早期光靠一根扁擔就可以養活一個家庭，現在不行了，你有一台小貨車，你還有時候餵自己餵不飽。(訪談 1-A1：6)

可見當時台灣為發展工業而不斷利用農業資本之時，受到影響的不只是平地大量耕種的農業型態，公興村較小規模的農產也受到整體農產價格低落的衝擊。而在工業逐漸發展、許多工業製品開始大量生產之後，原本的地方產業也再無生產價值，地方規模的經濟體系遂分崩離析。公興村村民敘述對當時狀況的感觸：

在我們公興裡面，有辦法靠雙手生存下來，自己打出一片天的人，是值得佩服的。[...]有的出去外面甚至待工廠、吃頭路。[...]出去的占差不多一半。(訪談 1-A1：3)

(二)時空隔閡造成遷移性移動—無法以日常性移動與外部溝通所致

此段期間公興村經濟變遷的劇烈程度，造成了許多公興村村民向外流移。而此種向外流移。傳統農業價值低落、轉型上的困難、以及地方現代化與交通發展緩慢、無法以家鄉生活場域中的資源條件轉換為符合市場價值之產業，在上述各種情況的交互醞釀之下，使向外流移偏向以較極端的形式產生。

其主要原因則為交通上的不便，使公興村對外部連結的時空距離、隔閡過大。導致公興村在日常性的經濟活動無法維持之後，無法輕易轉向依靠外部、都市具備的勞動力需求、無法與外部達成日常性的溝通。因此公興村在該時期，無法以原本傳統產業在公興村求生的人，經濟來源則轉向外部零碎、短期、不穩定的兼職工作(訪談 1-A1：7)。或者將土地房產變賣，以遷移的移動形式，日常生活、移動場域轉移、脫離公興村，至外部其他都市或區域尋求新的機會。

(三)公興村發展性低—青壯年向外移動多

山地鄉村的產業、經濟型態與都市有相當的不同之處，儘管某部分轉為現代的生活方式，但在經濟型態上，仍能與都市有一定程度的區隔。遂當時儘管公興村經濟型態受到衝擊，但若在公興村擁有一定程度的土地及能力，便能設法在公興村維持生活上的經濟所需。公興村居民在自身的生活場域中，所具備的生存方式相當多元。根據受訪者 A3 所述其自身的經驗得知，公興村可以獲得的經濟來源之方式相當多。儘管過去作為主要的經濟來源的筍子經濟價值以衰退，但綜合其餘少量的農產、各種山地的資源等也能成為公興村居民經濟收入的來源，已得以維持基本生活所需。

另一方面，青壯年與中老年族群對經濟要求的差異，則體現出青壯年較欲向朝外部移動、發展的狀況。受訪者 A3 表示，當時台灣都市的發展、所具有的都市機能、及現代的生活方式，對於他們來說影響並不大；因為公興村擁有自身長

久形成的地方生活方式，都市的機能如消費、休閒等接觸不多。受訪者 A3 敘述當時面對台灣都市高度發展的景象與公興村狀況比較下之心情，認為雖然看到都市繁盛的狀況，但當時公興村的經濟狀況並不理想，因此心力皆放在如何維持生計之上，並無暇去接觸都市。雖然看到都市的發展，但以自身有實際在都市生活的經驗過後卻發現自身並不適應都市的生活方式。

中老年族群通常已以公興村傳統經濟方式維持生活一段時期，有穩定、習慣的生活、經濟型態，並且對於現代化、工業化的消費較少。但青壯年正值自我發展的時期，未來發展可能性較多，因此則較有向外移動的傾向，如在外求學、到外地工作等。

3.2.3 土地限制與法令—人口增加的自然移動

(一)人口增加的土地壓力—財產分配

除了上述傳統產業價值衰退造成村民的外移，農業技術增進、地方人口持續增加，也使得本已不敷生產的土地、地方村民所能分配到的經濟價值相對減少。由圖 16 公興村人口的變化可以看出，至 1970 年公興村人口到達頂點，此時傳統產業價值以政府緩和農業價值衰退的策略方能維持一定程度的穩定，但其後仍止不住其衰退的趨勢，而至 1970 年代中期後人口逐年減少。而戶政人口資料的減少，則表示以遷移的形式、使日常生活場域脫離公興村的移動形式居多。土地無法負荷隨人口增長而增加的經濟需求，此也是造成向外部移動、遷移的原因之一。其中包括財產、土地的分配。根據公興村村民所述，居民的土地是大多長輩留下來或使用家族中間置的土地，而土地分配的狀況根據公興村居民所述：

山裡的產業只會越來越少，因為人口越多的話那產業就只會越少嘛。你兄弟姊妹分的時候，要是你本來有兩甲，你以前的人又生多，你兩甲地你可以生活，你要是四個兄弟姊妹分，就是可能連自己都沒辦法生活。[...]後來就是造成說人口一直外流。[...] (訪談 4-A4：6)

因此可以得知，公興村隨著人口的增長與傳承，各人能分配到的產業、土地資源就相對減少，也促使公興村村民向外流移的狀況發生。

公興村歷年人口										
年分	戶數	男	女	人口		年分	戶數	男	女	人口
1961	165	497	466	963		1988	180	416	298	714
1962	165	498	477	975		1989		409	278	687
1963	170	536	501	1037		1990	201	409	277	686
1964	170	542	512	1054		1991	195	399	267	666
1965	169	535	502	1037		1992	202	415	288	703
1966	172	553	521	1074		1993	202	425	281	706
1967	174	561	537	1098		1994	202	425	281	706
1968	178	566	540	1106		1995	216	440	311	751
1969	179	580	537	1117		1996	223	445	314	759
1970	181	614	542	1156		1997	240	441	306	747
1971	187	623	526	1149		1998	252	476	338	814
1972	192	626	534	1160		1999	292	455	306	761
1973	186	604	490	1094		2000	282	437	285	722
1974	180	565	476	1041		2001	279	429	271	700
1975	186	568	466	1034		2002	281	450	262	712
1976	181	537	442	979		2003	279	445	258	703
1977	184	535	426	961		2004	271	422	238	660
1978						2005	270	417	238	655
1979	193	519	386	905		2006	270	413	230	643
1980	186	490	360	850		2007	274	402	227	629
1981	187	466	349	815		2008	294	405	242	647
1982	183	444	338	782		2009	291	391	248	639
1983	189	448	339	787		2010	303	391	252	643
1984	182	421	319	740		2011	302	375	243	618
1985	184	427	321	748						
1986	182	422	300	722						
1987		407	285	692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自番路鄉戶政事務所

圖表 16：公興村歷年人口

(二)土地使用限制、擴建限制－產業與居住空間少

公興村位屬山區，其地形多為坡地或不穩定之地質。因此在土地使用的法令管制則更加嚴格。公興村居民敘述公興村的土地使用狀況：

土地的部分，我們這邊大概佔七成的國有地啦，不管是林班、國有財產局的。所以在整體的硬體發展上，當然是有所限制啦。可是這方面的限制對我們來講並不完全是壞處啦。因為怎麼樣呢，某層面的限制使我們有很好的林相啦，但另一方面來說這些限制，你林相雖然是很好沒錯，可是算說，我們的資源豐富可是我們的產業發展上頭相對的是受阻的。(訪談 1-A1：3)

可見公興村在土地使用上有諸多的限制，而這些限制對於公興村的產業、經濟、地方建設等，是有所阻礙的。而這些阻礙是否影響了公興村居民繼續留居公興村的意願？受訪者提到：

[...]林業法規就是既有的建地，他設一個標準給你重建、重蓋，可是你就無法拓展。你重蓋只是特定面積的重蓋而已，你沒辦法拓展，新的建地更不可能。[...]國家很少重視這個區塊啦，國家認為這個區塊跟市區又不能比，人口選票又少。[...]我們農委會勒，我們在這邊管理這片森林我們是沒辦法有甚麼福利。他們不為人設想，只為他森林設想。農委會是在保護土地、保護資源，並不是保護人[...]你要是一片森林給你，叫你不能砍，你敢生小孩嗎？
[...] (訪談 1-A1：3)

根據受訪者 A1 的敘述，土地限制除了使地方產業、建設受阻之外，連帶影響到的是公興村內部人文發展的永續性。隨著經濟、技術變遷，以及公興村內部的人口擴增，基於土地使用上的限制而無法使公興村擁有負擔更多人口與經濟的能力。也因如此隨著公興村家庭與人口的增加，並考量公興村未來的發展性，土地限制便成為公興村民向外流移的因素之一。

3.2.4 教育與求學經驗－就學必須跨越時空隔閡

(一)鄉村無法具備完整教育系統

台灣現行的教育是以國小至大專為普遍完整的系統。類似公興村的偏鄉地區，在整體國民教育系統的完整度、延續性上是難以在地方完成的。就算是最基本的國民小學教育，教育資源也難以與地方有良好的分配與溝通性；另一方面，政府

在公共建設的投資上是以經濟成本的邏輯來做資源分配的考量，以現行的狀況來看，台灣偏鄉要獲得完整的教育資源是有困難的。

(二)隨求學過程向外移動、遷移

因此在上述的狀況之下，求學、教育是促使公興村村民與向外部移動、流動的因素之一，此因素拓展了公興村日常的移動與生活場域。公興村村民，在國民小學的求學階段，大多就近就讀公興國小與黎明國小。在上述交通道路不良、公興村地理範圍廣、移動限制多的狀況之下，大多以步行的方式，選擇就近的學校就讀。國小教育在公興村生活場域周邊得以滿足，但國中則必須要更遠的菜公店民和國中就讀，就學作為日常性活動，也因而擴大了移動的範圍。根據公興村居民敘述：

早期這邊讀書的，畢竟我們這邊有小學而已，國中就一定要出去。(訪談 3-A3：8)

以前要走那很遠喔。你讀民和要下來坐公車，就從民和走路下來到阿里山公路旁，那個腦寮那裏，那裏才有車牌，從那裏坐回來，那都走很遠的。(訪談 3-b1：6)

因公興村與學校的時空距離，加上當時的交通狀況，面對日常性的就學需求，除了以大眾運輸通學外，可能以家庭遷移、借住、租屋等方式來調適。如到了高中階段，公興村村民大多往嘉義市區就讀，因此家庭為滿足現代孩童的教育需求，遂必須將孩童送往市區居住、或將家庭居所遷移至市區陪伴孩童就學。如公興村村民敘述自身求學過程的移動狀況：

[...]國中那時候就住在外面了，[...]就在外面租房子買房子了。[...]讀高中後到市區，[...]我白天在外面市區工作我就住外面了，要是生活環境比較好的，有的市區有買房子。[...] (訪談 4-A4：1)

[...]我們幼稚園就去外面讀了，[...]剛開始是住親戚家，後來再租房子，[...]我奶奶帶。[...]之後租房子[在嘉義市]到國中。[...]高中讀東石，[...]坐校車。[專科]到回籠[...]桃園跟新莊交界那邊。(訪談 6-A5：4)

由此可知，公興村村民因求學過程，促使公興村移動範圍向外拓展、流動頻率增加。



圖表 17：公興村及其周邊聚落教育資源位置圖

(圖片來源：底圖截取自 Google 地球，本研究繪製)

(三)藉由教育被納入整體結構中－在外流移尋求發展

因就學需求而促成的日常性的向外移動、停留，則對公興村村民日後的生活型態發展、變遷有所關聯。根據村民敘述：

[...]為什麼人口會一直外流就是說，這段期間這些有讀書可以讀上去的人，說不定他會有比較好的前途，或是說他在外面有比較好的就業，他就乾脆定居，離開山區。[...]就是說對山比較有興趣，還有書比較不會讀的，一定都會回來這邊做山。(訪談 3-A3：8)

[...]因為讀書比較厲害的都在外面找工作，等於說你在外面有比較好的工作。

[...](訪談 4A-4：6)

綜合上述當時公興村的經濟、生活狀況，即傳統產業的不合時宜與公興村與經濟轉型過程的空窗期。在公興村傳統產業衰退、經濟發展前途灰暗時，藉由教育試圖融入整體經濟結構，進入結構中所需求的勞動技術、知識體系之內，是為在未來得以在新的經濟、社會結構中求生的考量與選擇。

除了求學需求促使公興村民向外流移，公興村的經濟、土地狀況同時促使在歷經求學過程後，便持續在外部發展、就業等，促成了生活場域的轉移。

3.2.5 向外流移－以脫離原鄉的形式轉移生活場域

由上文敘述可知，公興村由原本傳統生活場域範圍，向外流動、拓展移動場域的原因；其原因在公興村傳統產業的衰退，而工商經濟模式在都市發展、現代化過程先都市後鄉村，公興村無法在經濟結構轉型之初未被納入市場之中、也尚未發展出相應對之策略、使其地方經濟無法與結構接合。另一方面，公興村在人口增加的情況下，伴隨傳統產業衰退、農業技術增長，過剩的勞動力也促使村民必須至外部尋求剩餘勞動力的吸收。在公興村的地理條件、與嘉義市的關係，及當時交通狀況來看，公興村向外移動的狀況大約落在上文所歸納鄉村向外流移的範疇之內。

教育則公興村融入經濟、社會結構的方式，求學過程遂為公興村向外流移的一大原因之一；不再視傳統農業為志業後，藉由在教育過程中所學、在外部流移、接觸的過程中，促使往後日常移動、生活場域轉移。造成公興村原本的移動與生活場域已日常脫離原鄉的形式拓展、轉移至外部區域。如為跨越時空至市區就讀，必須租屋或置產於市區，並且長輩需陪伴移動、照顧孩童。

此時因公興村內部與外部時空性質的差異，公興村民必須打破原本具一定範圍、固定疆域的日常生活場域；轉移生活場域至外部、並持續的在外部流移。此種向外拓展移動場域的狀況，因公興村與外部時空距離較隔閡的狀況，使得以日常生活場域脫離公興的轉移形式發生較多，如到市區就學、遷移至嘉義市、外縣市工作，而不再在公興村活動等狀況。

此節敘述公興村移動場域向外流移、擴展過程的背景，一般來說此移動型態的變化，通常被視為鄉村衰退，為現代經濟、發展對鄉村的忽略之下所造成的鄉村、社會問題。然而流移族群在之後則有生活場域歸返於公興村的轉移現象，下文將詳述。

第三節 公興村民的歸返—公興產業興起及生活場域擴張

公興村在聯絡道路狀況逐漸改善後，內部時空性質的流動性提升，內部區域之間的溝通性增加；內部到外部區域的互動、流動性增加，時空隔閡減少；時空性質得以與外部銜接，使公興村及周邊區域在經濟、產業的發展與轉型有新的契機。原本遷移至外部、日常生活場域在外的公興村民，則得以歸返公興村、增加在公興村的活動頻率。

3.3.1 交通改善—阿里山公路開通，地方時空流動性提高

自 1970 年阿里山由林業轉向觀光，逐步開始進行阿里山區以道路、觀光設施為主的現代化建設。阿里山公路在 1982 年通車，而之後公興村遂以阿里山公路做為內外聯絡主要道路；而連接至各內部聚落的聯絡道路，也沿阿里山公路而逐步向內鋪設完備。根據村民口述，在 1982 年阿里山公路通車後，連接至各聚落的道路方逐漸通暢。(訪談 3-A3：2)

因此至 1980 年代中期後，公興村與外部之間的現代交通道路逐漸完善，也使得原本僅能以步行或機車作為往來區域之間的交通方式，得以透過較寬闊、平坦的現代化道路，以汽機車、及較輕鬆快捷的方式溝通，此一硬體基礎改善，也促使了公興村汽機車的普及率提升：

[...]阿里山公路開通的時候，我也想要有車。[...]有道路，我那個需求出來了。

[...]本來是摩托車，[...]後來]我也想要有四輪的啊。(訪談 1-A1：7)

現代化道路與汽車普及後，公興村與外部的時空距離與隔閡減少，而汽車的性質則可擴大日常性的移動範圍。即公興村與外部得以保持日常性的互動狀態、日常生活場域得以擴張，內外流動性高、往返移動便捷。公興村與外部時空流動性的提高，以及移動能力的基礎彈性增加、限制降低，也對地方的經濟、資源、生活型態等層面有所影響，以下分述。

3.3.2 地方經濟復甦—依賴時空流動性的茶產業與檳榔

(一)交通帶動產業興起—時空性質與流動性接合促使的地方產業與經濟的轉型

在上述公興村交通改善、整體流通性提高、時空隔閡減少後，公興村較能與依賴時空快速、流動性質而建構的社會、經濟結構貼近；也因此使得公興村能與轉變後的經濟結構有所結合，公興村在突破傳統的移動能力之後，遂具備由傳統產業轉為現代產業的條件，也因此產業逐漸轉型，公興村地方的經濟興起。舊有

的農產業以及兼職等不穩定的工作型態，逐漸轉以茶葉、檳榔等為主要產業。據村民敘述：

阿里山公路開通之後，大家就發覺說，以前的農產品還是現在現有的作物已經不符合那種收益了。所以你會改變你的產業型態。[...]到 1980 年代開始有進駐的就是說大家開始可以算是說茶葉啦、高冷作蔬菜，大家思想改變，開始有茶園開始有種檳榔，開始累積。[...]時候在 1980 年代的時候，[...]就是檳榔的價格都還很好，大家都想要種植檳榔，或是高冷作、高山茶。(訪談 1-A1：7)

阿里山公路開通以後才開始，開通以後兩三年才開始慢慢的種茶。(訪談 4-A4：9)

[...公興的茶]1980 年以後好到現在。你大阿里山茶區也是差不多 1984 年、1985 年才有人種。差不多都在那幾年有人開始種茶，那你先種的人種 4 到 5 年，那茶很漂亮，他們就感覺不錯，後面的人就一直跟上去。(訪談 4-A4：6)

[...產業]變化就是在 1980 年那時路開通的時候變化最多，那時候茶開始正在好，就是那一段時間，經濟開始改善，大家的生活才比較好一些。(訪談 3-A3：8)

由村民敘述可以得知，公興村在阿里山公路開通後，產業有所轉型、經濟興起，而以茶葉、檳榔與其他經濟作物為主。除了公興村的地理條件，適合轉作上述產業，且在當時具有相當高的經濟價值，因此公興村民遂紛紛投入新興的產業。另一方面，交通條件、載運能力、跨越時空距離範圍的提升，則是作為茶葉、檳榔得以在公興村興起的基礎。茶葉的生產必須有賴於大量人力密集採收，並須注重製茶的時效性；在茶區採收完畢後，需要迅速載運大量的茶葉跨越山區進行製茶的過程。檳榔也注重長程、迅速的載運、配送。因此足見現代化交通，對於公興村產業轉型、經濟發展的重要性。

(二)產業經濟價值高，流移村民逐漸回流

有了阿里山公路無論在內部運輸往來、以及連結外部銷售等有莫大的助益。在地方的新型產業出現之後，地方經濟得以逐漸穩定下來。茶與檳榔為公興村帶來了一定的經濟潛力，如村民敘述：

1980-90 零年代，這山區的產業吼，比較有價值、好賺錢，所以大家想要保有一塊土地。[...]在那邊工作比當公務人員好。(訪談 1-A1：1)

[...]那時候會回來是看中這塊茶葉的產業[價值]，那時候茶葉的經濟效益算不錯。[...]經濟收入不錯的話，跟外面工作比較起來的話，在這裡可以賺比較多一點錢，又比較自在、不用讓人家管，要來做就做。(訪談 4-A4：6)

可見公興村在產業轉型為茶、檳榔等經濟作物後，其經濟價值在當時相當的高，產業便逐漸發展、村民跟進。除了使村民向外流移的狀況略為減少，也使得原本在外的村民，其生活場域有向公興村歸返的傾向。

以在外求學、經常性至公興村之外的場域移動的公興村村民來說，在外部的接觸，而有工作機會、或已有工作的，在當時公興村茶、檳榔等經濟價值高的因素而有所歸返，如村民敘述歸返的情形：

那時候剛好是[公興村經濟]最鼎盛的時候。本來有一個職缺，公務人員是兩萬多塊，[...]就可以進去縣政府上班，他(受訪者 A1)本來是還沒畢業人家就已經跟他找好工作了。[...]但老一輩的家長會說，現在甚麼時代你賺那兩萬多是可以養一個家庭嗎？[...]我們台灣的茶也是正好在起飛，[...]那時候真的很好賣。(訪談 2-A2：15)

我也是在台北住了四五年。[...]那時候會回來是看中這塊茶葉這個區塊的產業，那時候茶葉這個區塊經濟效益算不錯。你像經濟收入不錯的話，跟外面工作比較起來的話，在這裡可以賺比較多一點錢。(訪談 4-A4：6)

由上述村民所述可知，由於當時公興的產業主要以茶業經濟價值最高。公興經濟復甦後，使得原本在外求學、學得一技之長以能在當時的經濟結構中求生存、或已在外尋得工作的村民，有歸返公興村活動的意願；相較於外部其他職業，茶在當時屬於相當有價值的產業。即是公興村在經濟上具有市場價值、有獲得生活所

需經濟來源的可能後，原本向外流移的狀況便有趨向歸返公興村的傾向。

3.3.3 交通發展後的學校的轉變

(一)公興村資源使用性質－資源集中不代表中心

阿里山公路開通，其沿線也通過原本作為公興村資源中心的區域；該區域包含派出所、衛生室、活動中心、公興國小等資源。基於上述公興村地理條件，公興村的資源原本就難以使全村村民皆能平均、方便的使用，因此各項資源設施集中坐落於該區域之上，僅代表各項資源集中於此，而不代表公興村中的各個聚落皆依賴該區域的資源、將其作為中心。

此狀況並未因為現代化交通、流動性提高、時空隔閡降低而有所不同。反而因阿里山公路的通過、交通流通之下使該資源集中的區域成為被忽略、過道的性質，因交通而導致的資源集中化狀況更加明顯。在其設施長期閒置而導致廢棄的狀況即為該性質的體現。而教育資源的狀況則更為特殊。

(二)「既獨立又開放」所影響的地方教育資源狀況－教育資源極化

在上述該區域的性質之下，公興村村民由原本以步行通學時選擇最近的學校就學，公興國小在阿里山公路開通後、交通運輸進步後，其時空距離的差異減少，轉而選擇資源較完善的學校；未必再需遷就距離而就學。如村民所述：

[...][現在]你要是用走的，是沒有人要下去讀書的，可是那時候用走的，我們也是走下來到觸口[黎明國小]讀書，我們並沒有讀公興國小。(訪談 1-A1:5)

而除非身為學生家長，否則也鮮少接觸學校活動：

都是[公興國小附近]那邊的人參與[學校活動]比較多，七鄰這邊比較少。[...]或是有學生讀在那邊的。(訪談 4-A4:18)

公興國小的學生往上向隙頂國小、往下向黎明國小等移動；同時人口的外移及與市區的互動隨著阿里山公路的開通而增加，使得原本學生已少的公興國小學生向其他學校轉移：

[...]公興的地理位置距離嘉義市也是蠻近，差不多二十分鐘至三十分鐘的車程。[...][公興]在地理位置裡面也不是說太深，不像隙頂國小，那就比較進去，

你要出來有一段。所以隙頂國小到目前還在，隙頂國小又接近我們瀧美，所以瀧美的學生也上去讀。[...]因為八、九鄰位於市中心比較近，人員都遷出來了，包括四鄰那邊。[...]所以等於三鄰以下沒人讀我們公興國小。(訪談 1-A1：1)

公興村與嘉義市的時空距離與隔閡不再如過去般大，上述村民敘述之狀況，即為公興村相對於嘉義市在區位上「既封閉又開放」的特殊性；頗受交通技術發展而造成的時空流動、壓縮幅度改變而影響。也因為上述狀況，公興國小在政府節省成本與經費的考量下，於 2005 年併入黎明國小成為公興分校，並於 2006 年短短的一年間廢校；可見官方在現行學校制度與經濟成本考量之下，公興國小已無存在的必要。

3.3.4 因流移性而起的歸返—公興因經濟復甦而重新得以作為「定居」的場域

(一)公興村流動性、開放性提高

本節闡述公興村在現代化交通建設後，村民生活場域向公興村歸返的情形。以下可歸納出幾點造成歸返的原因：

1. 時空流動性提高，公興經濟復甦，吸引村民歸返

公興村原本因傳統產業價值衰退，村民無法維持經濟需求而向外流移；而其狀況為變賣公興村土地、財產，遷移至其他區域、拓展生活場域、向外部移動、發展，以儲備未來的經濟能力等。而經濟復甦後，公興村具有經濟發展價值與潛力，對原本傾向向外流移的村民產生吸引力；而後逐漸有生活場域朝向公興村歸返的傾向，即原本日常生活與移動場域脫離公興村之村民，因可由公興村獲取經濟價值，而端看其依賴程度多寡，而有所在公興村移動、與其互動。

2. 公興村地理區位的時空壓縮效率大，內外流通、互動性提高

現代化交通建設，對公興村所處區域帶來的另一差異，即是時空距離隔閡減少，移動性、流通性提高、內外互動性提高。此性質得以提高原本在公興村周邊流移的村民，其與公興村的互動性、至公興村的日常移動性提高；儘管遷移在公興村周邊區域，但與公興村的隔閡降低。而此性質則產生上文敘述公興國小、公興村資源集中區域的狀況；因移動性、時空壓縮，而導致可觸及資源之範圍擴大。一方面提高了公興村區域內對外部、資訊、資源的可觸

及性，地方資源的必要性也降低，即資源極化現象。

(二)歸返後移動與生活型態的選擇彈性—日常能觸及的資源量增加

儘管有村民移動場域朝公興村歸返、回公興村發展經濟的狀況，但公興村土地在法令上的限制、財產的分配、適宜使用的土地有限、土地經濟生產力有限等情形依舊。因此儘管有歸返的傾向，但卻不代表得以搬遷至公興村內居住；但此狀況因上述時空壓縮、公興村對外流動性提高而使得歸返公興村村民的選擇彈性提高，而促使在歸返後有不同的調適現象。下節將敘述流移族群歸返後，居住場所、移動與生活場域在地方持續的調適狀況。

第四節 歸返後的持續轉移—時空性質與社經結構轉變後的地方「定居」調適

上述公興村地方經濟復甦所帶動流移族群歸返現象，並不是完全回歸於過去公興村的聚落、生活樣貌；村民向外流移、向內歸返的過程，即代表地方主體與外部社會、經濟的再結構、銜接過程。因此地方經濟復甦並不是促使村民生活場域歸返的唯一原因，也未必所有的流移族群皆會歸返；而歸返的形式，也因與整體社會再結構、時空性質持續的轉變等，而得以以不同於過去的形式呈現。

3.4.1 歸返族群所需具備的條件—生產空間的具備與居住場所的適宜性

(一)擁有可發展產業的土地

公興村產業復甦後，以茶、檳榔為最具價值的產業。而若要在茶、檳榔上獲取較高的經濟受益，而不是依附於該產業所需求的勞動力，則自身必須擁有得以生產、採收該產業的土地；擁有土地，公興產業的轉型才對於在外流移的村民有較高的吸引力。如村民所述：

[...]都是外面找工作比較多，[...]除非說父母有留產業[或土地]下來，像 A1 父母有留產業下來，如果父母沒有留產業下來，或是比較沒有辦法行銷的，就住在外面[工作]。(訪談 4-A4：2)

[...]沒地就自己看著辦了，[...]你沒地就是依舊打零工，為了打零工，隨著[茶]產業出來，你就需要去學做茶，去學一些有技術性的東西，產業就一直走到現在。(訪談 1-A1：7)

產業轉型仍在公興村產生許多額外的工作機會，對於穩定公興村的基本經濟需求有所助益，但仍屬較附加的經濟來源。若是在外部發展較不順遂，也有回公興，以在山區流動幫忙各茶廠製茶維生：

[...]大部分都是公薪，[...]我請你來[做茶]一天多少這樣。[...]像我也一樣，我做過很多地方，我曾經到過里佳、到過南投，我都去過。[...] (訪談 4-A4：3)

[...]你要看你[茶園]的產量，有的種了可以採一千多公斤，有的人量比較多他可以採一萬公斤。(訪談 4-A4：4)

[...]他們茶比較多，產業比較大。一般來說產業不大的就住在外面[工作]。(訪談 4-A4：2)

因此若要在公興取得較穩定、較高的經濟收入，則與自身可生產的土地大小、產量有關。而上述在公興村的土地性質、財產分配等狀況之下，未必在外流移的村民都在公興村具備足夠、可生產的土地。因而足夠大小並可生產的土地空間之具備，即是村民在公興茶產業興起後，是否歸返的主要條件。

(二)歸返後有無適宜的居住場所－原居住場所無法滿足地方新的「定居」需求

村民的歸返，與村民在公興是否具有適合的居住場所有關，但並未如上述生產空間有決定性的影響。儘管現代化交通，使時空流動效率提高、日常可移動範圍擴大，但仍有其時空限制、移動極限存在。因此若仰賴公興的產業作為主要經濟收入，其居住場所與生產空間的距離仍必須保持在一定的範圍之內。

居住場所如同生產空間的狀況一般，未必歸返的村民在公興及其周邊皆有適宜居住的場所，因居住場所也面臨上述公興村土地的狀況，如村民所述：

[...]你總是有兄弟，[...]大家都結婚生子了是不是就住不下去，有機會的話就外面自己找房子、自己買，[...]不然要住哪？(訪談 4-A4：5)

但因經濟而歸返的村民，無論是否在公興周邊有適宜居住的場所，皆會另外在一區域置產。其代表在整體社經、文化結構與時空性質轉變後，若歸返公興村作為日常生活場域後，為重新調適在地方「定居」的型態。儘管在公興村內有「可居住的場所」，但村民歸返後、在公興村發展經濟後，皆會在外部區域另外尋求「適

宜的居住場所」；而原本無可居住空間之村民，為能歸返公興村活動，則也會在公興村外部尋求適宜的居住場所。其代表處於公興村的區位與內部的居住空間，無法滿足在現代社會、文化結構與生活方式影響下的流移歸返族群需求。下文將闡述促使歸返族群另外尋求居住場所的原因及對居住場所的需求。

3.4.2 歸返後的居住場所決策—在日常生活場域得以擴大的基礎下，同時滿足日常產業活動與日常生活所需的居住場所

在上述公興村產業復甦、經濟價值高的狀況下，促使在公興村具備足夠生產空間的流移村民歸返。公興村在得以提供村民穩定的經濟來源、收入安定的基礎之下，將促使村民在生活場域歸返後持續調適更細微的內容，以滿足現代經濟、社會結構下在屬於公興村新的「定居」型態需求。上文已闡述居住場所與生產空間的時空距離關係仍需保持在有限度的範圍之內，而在能顧及日常產業活動、與生產空間移動關係的狀況下，仍需盡力滿足其他生活需求，遂促成居住場所有調適移動的狀況。以下將闡述居住場所的區位因素與所需滿足的需求。

(一) 產業移動需求—注重流動、可及性

公興村因現代化交通而產業得以復甦，而其產業性質則轉為現代經濟性質，即注重銷售、運輸、集散的流通性，因此儘管主要移動場域及經濟歸返公興村，但因經濟型態、產業需求，其移動型態仍須在公興村與外部之間流通。其為因經濟而歸返公興村後所必需的移動型態。表示公興村當前的經濟型態，即需與外部保持密切的流動、互動關係。

(二) 教育需求—對教育的特別注重

基於上述經濟所需的移動型態，並在上述促使村民向外流移因素之一—教育的需求之下，形成對居住場所的特定需求與區位的選擇。根據村民所述：

[...]一些農產品的輸出行銷，都需要到外面出來。所以跟隨著孩子也要跟著帶出來，孩子也跟著帶出來那當時的孩子也盡量可以讀外面，家長要回去工作的時候只有半小時的車程，[...]近近的就到了。(訪談 1-A1：1)

[...]很多人都是這樣，孩子教育出來外面住。[...]你如果產業還留在山上的話，他都會出來外面住。[...] (訪談 4-A4：11)

教育需求則為居住區位調適的最主要原因，公興村村民對於孩童的教育一直以來特別重視。如村民所述：

[...]山上的每一個人幾乎都是外面有房子，你沒有買不行。[...]外面沒房子的話你小孩子讀書要哪？[...]就是為了教育，你一定要在外面有房子。[...] (訪談 4-A4：4)

就算不考慮經濟移動需求，村民仍會因孩童教育所需，而選擇歸返公興後的居住區位所在、或調適原本的居住區位。

(三)區位選擇－滿足產業與教育需求

村民依附於公興村經濟而歸返公興，而另一方面則又需兼顧教育需求、及附屬的部分現代生活資源。過去因交通溝通不佳而需搬遷至嘉義市以滿足教育需求的狀況，在現代則在居住場所、生活場域上獲得更大的選擇與彈性。其條件、需求可由公興村民所選擇的居住場所看出，根據村民所述：

[...]所以這邊是山裡，一邊是都市，我們都會住在中間這邊，只比較靠那邊，或比較靠那邊這樣[差別]這樣而已。[...]大部分遷]在後庄那邊。(訪談 4-A4：18)

其居住區位所在的選擇，通常也會選擇其主要移動路徑、主要聯絡道路的周邊：

[...]大家都會選擇地緣性，都在阿里山公路旁邊。[...]總不可能搬到台南去，除非他山裡面的產業不要，如果山裡的產業他還要的話，他都在阿里山公路邊而已。(訪談 1-A1：7)

得以顧及公興產業，又方便孩童就學的區域，在大眾運輸、學校校車的輔助之下，得以提高就學的可及性：

[...]校車都有到，[...]下課補習完，坐嘉義客運回來，[...]九點半從嘉義市坐客運回到中埔十點，我們十點要去中埔載他回來，我們這邊的客運沒到這邊。[...]這鄉下讀市區，大家都讀市區，所以不管是私立公立，校車都很方便。[...]中埔這邊離[嘉義市]都不是很遠，應該[交通往來]都算蠻 OK 的。(訪談 4-A4：

由上文得以釐清村民在歸返後，選擇、調適居住區位所在的因素，是為取得在公興村維持日常經濟活動，以及家庭需求、教育需求的日常機能之間的平衡。公興村經濟價值存在的與否，是促成村民歸返公興、在公興村持續活動的關鍵；而在公興村的區位環境性質、以及借助時空流動性增加後而得以擴大的生活場域下，居住場域遂可轉移、調適至公興村與嘉義市之間，以滿足生產活動與教育需求等地方完整的「定居」型態。



圖表 18：居住區位與公興、嘉義市、道路關係圖

(圖片來源：底圖截取自 Google 地球，本研究繪製)

3.4.3 一直以來促使村民向外移動的教育因素

公興村村民自過去內外部互動性、流動性較低，一直到現今流動、開放性提高、村民歸返後，教育需求即是經濟之外一直促使村民向外流移、遷移、調適居住場所的主要原因；在滿足經濟需求之後，最緊迫、影響生活、移動型態最深遠的便是教育需求。其移動型態、居住區位則隨著流動性改變而有所不同。以下闡述公興村在流動性改變後對因教育需求而改變的移動、生活型態的不同，以及公興村家長特別注重孩童教育的狀況。

(一)生活、移動經驗與產業在結構中的性質

—家長期望孩童未來不再依靠山區勞動產業

以公興村產業為生的村民，儘管產業轉為茶、檳榔等價值較高的產業後，仍然認為山區產業屬於較不穩定、較靠勞力的工作性質。公興村的耆老、當前的青

壯年，皆在公興村歷經過整體結構變遷、生活較艱苦、經濟不安定，以及過去資源建設較不完善的時期，因而認為山區的生活是辛苦的：

[...過去山區的部分生活經驗]感覺是很痛苦的，所以極力的想說，經濟資源要顧之外，同時要給孩子一個好的教育環境、或是好的生活環境。[...]山裡人普遍的一個通病，賺的錢除了生活需求以外，全部提供在孩子的教育之上。[...] (訪談 1-A1：10)

[...]現在你們年輕人也一樣，到這個年紀的時候，以前要是不讀書，就是要付出勞力。[...]後來的教育的問題就是，孩子在外面有讀書，受教育高了，在外面找工作找比較好的，當父母的都不希望小孩子回來當勞力。[...] (訪談 4-A4：6)

[...]我們山裡人[...]大家都希望孩子拚一點，也就是說孩子能讀就讓他讀。[...]那個時候[國小]會廢校就是，家長有一個觀念，不要再讓孩子這麼痛苦。[...]我們只能跟[孩子]說我們的故鄉很美，剩下的我不能叫他們回來，[...]你回來根本就活不了我叫你回來幹嘛？(訪談 1-A1：11)

由村民所述，深刻的描述出村民對於公興村的生活經驗、自身產業的不安定感。歸返公興的村民，依然認為山區的產業就算轉型、維持一定的經濟價值，但仍屬於以勞力為重的工作；在整體結構持續變遷之下，屬於較不被看好、未來發展性低的工作，因此遂將可能性投入至教育之上。

(二)教育為在結構中保持競爭力、獲取角色的管道—提升未來發展可能性與保障

公興村的區位性質、過去向外部移動、與外部接觸的經驗、移動型態等，則促使村民對於公興的產業與外部結構、經濟狀況的差異有所認知：

[...]家長常常都往市區跑的話，畢竟所接觸到的訊息或層面，當然會比更深山的居民多一點。認為說小孩子就必須要出來受更好的教育。[...]變遷比較大的是我們這些位居半山腰的社區，變遷比較不大的就是更深山。[...] (訪談 1-A1：2)

基於上述家長自身經驗而衍生對山區經濟的態度，使其對孩童教育特別關注。導致對於教育關注的原因，有賴於國內教育體系的性質。受教育即為融入主流社會、經濟結構的主要方法之一；教育作為投入整體結構體系中的管道，是為能在不斷變遷的社會結構中能保持競爭力、在社會結構中獲取一個清晰的角色定位。

即公興村民過往的移動、生活經驗，即是因為整體社經結構的變遷所致；而其不斷試圖在新的結構中，尋求適應、融入、安定於結構的方法。訴諸於教育相較於在外部流移、尋找機會而言，是較扎實、具保障、穩定、踏實且最易投入的方式。愈受教育，則愈能融入整體社會、經濟結構之中；教育遂成為家長對孩童未來出路、工作在心理上的安定保障。此即為教育所具備的性質，對公興村民的意義所在。

(三)教育環境在鄉村與都市根本性質的差異－鄉村競爭力弱

上文已有闡述公興村在教育資源上的不完整性。而其不完整性不只單指區域上教育系統、資源的不完整；而是無法由軟硬體去著手轉變的，如村民所述：

[...公興]人數太少了，根本不可能[再有更多的教育資源]，那是無稽之談。[...]你算那個人口數，投資報酬率，你今天的政府有可能去給你蓋一間國小、國中、高中嗎？(訪談 4-A4：6)

根本環境性質上的差異，即鄉村與都市性質上的差異。上部段落提及都市作為整體社經結構變遷的所在地，結合上述村民對於藉由教育試圖融入現代社會、文化、經濟結構的態度，鄉村的教育性質與都市便有根本上的不同，公興村民認為：

[...過去山裡]放任式的教育已經不符合時代了，你像是整個森林小學好了，那也不符合時代了。[...]現代的教育制度，[...]快樂不等同於可以學習。(訪談 1-A1：2)

鄉村與都市教育資源與性質的最大差異，在於其接觸、融入整體社經結構的程度，以及所具備的競爭力與否，如村民所述：

[...]產業在山上可是你孩子總要受教育。[但]你在區域拿第一名，[...]山裡的學校]全班才幾個人你拿第一名。出去到市中心讀的時候不要排在最尾巴就好了。這個資訊會衝擊到社區的人，社區的人當然就把孩子推出來讀書。(訪

談 1-A1：9)

小孩子需要讓他到大環境，到大環境有一個好處，學習獨立，學習怎麼跟人家共處。[...]你在[山裡]的環境，小孩子很少，競爭力就會很少。[...]到大環境來就不一樣，競爭力很強。[...]競爭力不夠強的話，以後你在這個社會怎麼獨立自主？(訪談 4-A4：6)

因此就歸返村民的角度來看，公興村與嘉義市的教育性質，在投入教育結構後，所具有的競爭力、接觸的資訊等有根本上的差異。因此假設在公興村有完整的教育資源與教育軟體、政策的制定，仍然無法滿足公興村家長對於教育的需求，而該需求則是必須藉由傾向都市、投入主流社會、經濟結構中去競爭，才能被滿足。

(四)不同時空性質下的教育需求調適、移動—居住場域調適的常態

由上文可知教育為促歸返族群調適居住空間區位的主要因素，並是一直以來促使村民向外部移動、向整體社經結構靠攏的主要因素。而在過去現代化交通建設尚未完善，公興村與嘉義市時空距離、流通性，尚未到達能做日常性溝通的程度之前，村民為滿足教育需求，日常移動、生活場域必須以脫離公興村的方式，在外部、嘉義市租屋、購屋、借住，為能使日常性的教育需求得以在市區被滿足。

而在歷經時空性質變遷過程，公興村社會、經濟、生活型態的再結構，促使公興村村民向外流移尋求新的「定居」型態。而後以公興村對外的流動性提高作為基礎，隨經濟復甦而歸返的村民，得以已不同的移動形態作為「定居」的方法。即為上述所調適的居住場所，一方面得以維持日常在公興村的產業活動，一方面也得以滿足日常教育需求，而使得日常生活型態的完整度更高；不再需要如過往般必須日常脫離公興村方能滿足教育需求。

3.4.4 日常性的往返—日常移動距離、範圍擴大

本節闡述在流動性、移動能力增加的狀況下，歸返族群對於居住場所的調適，以及其為滿足歸返公興村後的新「定居」需求，而在生活場域上的持續調適因素。生產空間處於公興村，同時必須兼顧教育需求；而生產與教育皆是屬於日常、每日性的活動，因此其居住場所便處於能在日常移動能力能兼顧生產與教育日常性需求的區域之中。

往返於公興村的產業空間以及居住場所遂形成村民歸返後的日常生活場域。相較於過去較固著於公興村內的生活場域，在歸返後雖然日常移動範圍包含了公

興村，但也包含了公興村之外的區域；體現了移動、生活場域範圍的擴展，日常得以移動的距離擴大。每日需由居住場所移動至公興村工作，工作之後回到居住場所；以居住場所為據點，接送小孩上下課，而有所消費、資訊等現代需求時前往嘉義市，也得以就近的滿足。

因此藉由現代化道路、交通工具，日常性來回於公興村與居住場所的移動型態，滿足經濟、教育、生活等機能，是為歸返後所調適出適宜的、安定的生活型態。此移動、生活型態對於村民是必然形成的常態性現象。

第五節 小結—時空流變性提高、移動能力增加的生活場域轉變過程

本章由公興村自身的性質、條件，敘述其在時空性質轉變、社經再結構過程中，公興村民移動型態、移動場域範圍的變遷狀況；即因整體結構變遷，促成原本在公興村「定居」的方式不再適合，其生活、移動型態因而變遷。而當時空定義朝向更為流變、動態的性質，地方對其時空性質轉變的過程與調適狀況各不相同。以下對本章討論之內容做出歸納。

3.5.1 時空性質重新定義—流變性、移動性提高不均衡發展下促成的地方再結構過程

(一) 地方與社經結構隨時空定義趨向流變性的辯證過程

—地方由穩固轉變至流動的脈絡特殊性

時空性質朝向流變性轉變後，並不是整體世界便轉瞬改變。上述已闡述時空性質之所以日趨壓縮、流變，是因現代化、交通技術、資訊傳播科技的進步遂引起此轉變。其轉變是以現代化、科技普遍程度作為基礎，各個不同的區域、地方則以不同的方式、脈絡，進行著將時空朝向流變性轉變的工程。即整體社會、經濟結構的型態，是依附於時空性質而建構；時空性質之所以轉變，則是因移動、傳播技術進步促使。因此地方的現代化、交通、移動方式轉變的特殊性脈絡，即是造成地方社會、經濟、生活方式變遷的關鍵因素，也促成了屬於地方獨特的生活型態與文化樣貌。固然在整體結構皆趨向時空流動性轉變，但因地方性質的不同，而得以在流變中仍具有各自獨特的樣貌。

(二) 經濟價值的充足與否為「定居」於地方的首要基礎

本文於第二章提及，一區域得以「定居」其基礎條件為得以滿足「構築、建造」；而現代資本社會下，其勞動、生產活動能否達到「構築」，是以該活動能否轉換為資本經濟下的貨幣而定，在地方上的活動所能換取的貨幣價值，必須滿足在社會結構中生活的所需。公興村在現代化建設較為緩慢、地方時空性質與結構的落差，而出現的「空窗期」，實為因地方經濟活動、構築無法滿足「構築」的需求；與地方產業價值的衰退，因而促使公興村村民移出原生活場域、向外流移，公興村無法再做為「定居」的場域；村民轉移生活場域，向外尋求新的「定居」方式。

然而，公興村藉由現代化建設、地方時空性質與結構銜接之後，根據公興村區域環境的條件，在整體經濟生產結構中，具備了轉換貨幣價值的角色地位，即是茶、檳榔等山區產業。藉由上述新興產業所具備的價值，公興村遂重新成為得

以「定居」的場域，即在公興村有得以作為維持生活主要經濟來源的生產活動。因而促使生活場域轉移、在外流移討生活的村民得以歸返公興村。

因此一區域是否能作為適合生活的場所，日常的移動、活動是否能在一區域持續，取決於地方的構築、生產活動在結構中是否能轉換足夠維持「定居」的價值。公興村時空性質與結構銜接後，依據時空流動性質而自然衍生出能達成「定居」的地方經濟模式；是隨整體結構轉變而起的經濟，而不是策略性的意圖性價值創造與榨取，則更能維持較平衡公平的經濟狀態。

(三)歸返族群的地方移動、生活型態形成—歸返後具開放性的「定居」調適

地方經濟因素為公興村民是否以公興村做為主要日常移動、生活、「定居」的場域之基礎；若不具備該因素，其日常移動、活動將會脫離公興村。但在滿足經濟需求的狀況下，要達成「定居」，仍必須賴於村民自主調適出適宜的地方生活型態；即公興村民因應在公興村的經濟活動型態、公興村地理環境性質的特殊性、以及村民自身的需求，而衍生出村民自身認為最適當的生活型態，以求穩定於地方，達成「定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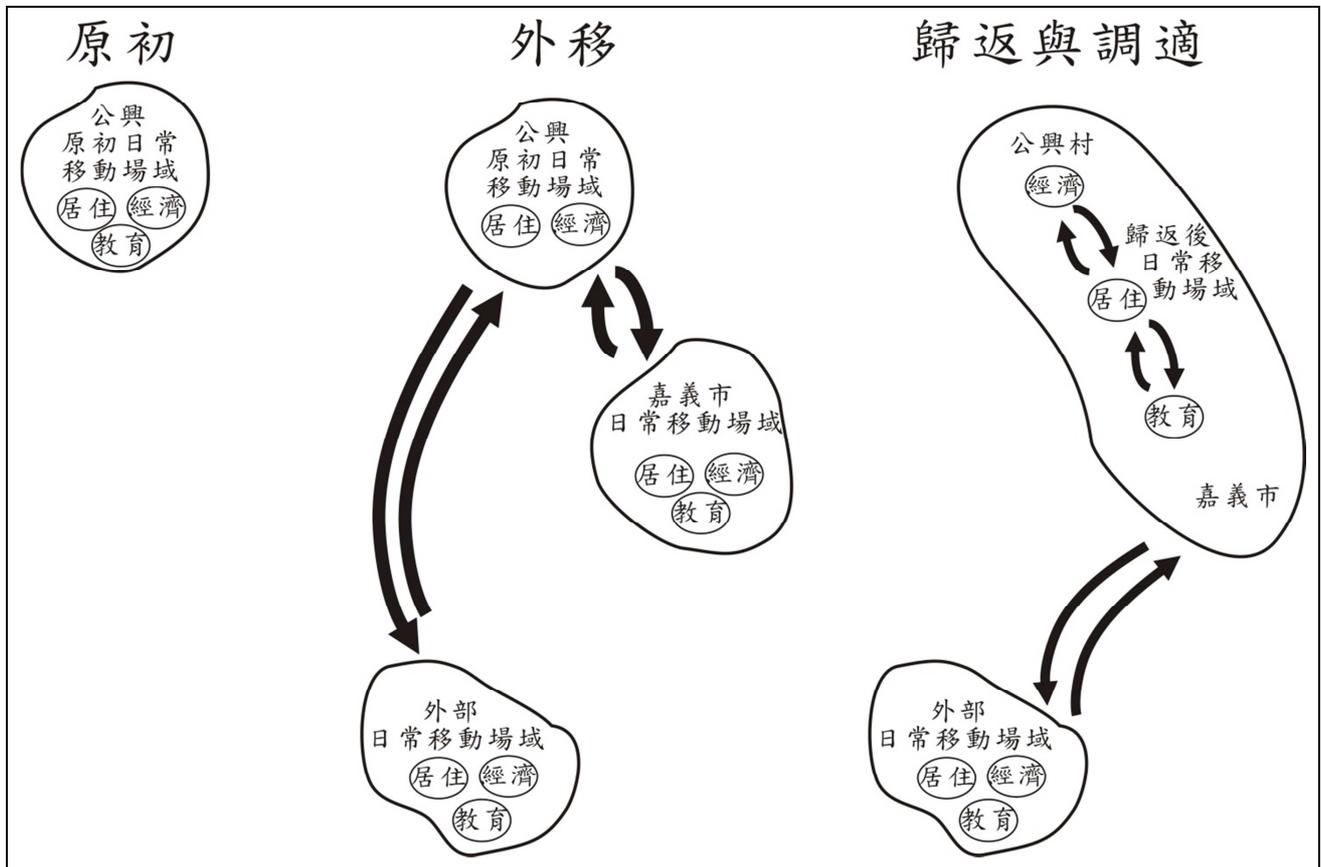
由本文所敘述脈絡來看，人之所以在區域間、外部不斷的移動，即是為尋求「定居」的安定感。生活型態也隨社經結構、時空性質的變動而不斷調整；因此沒有一種恆定不變的文化、社會或生活型態，而是在不斷的流移、變動中尋求「定居」。上述公興村重新得以作為「定居」的場所的因素，是因地方與整體時空性質朝向流動性的銜接，而促使村民歸返。在此脈絡下，歸返後的生活型態也勢必順應著此時空性質所生產的結構而調適；如因現代交通工具的普及，能做更大範圍的時空移動，便做為村民調適生活型態的基礎。

村民向外部流移，試圖接觸外部、融入結構尋求「定居」；而後因公興融入結構而得以歸返。村民即便在歸返公興村，仍不斷試圖持續的融入時下社經結構中，以在現代社會得以「定居」。即上文所闡述的，藉由移動能力增加，用以滿足教育需求，而造成生活調適。其居住區位、與移動型態，體現了村民在流移而歸返之後，持續試圖跟上時空性質的轉變、與結構融合，並依賴其作為定居於公興村的方法。

3.5.2 日常移動能力轉變歷程—交通技術進步促使日常生活領域擴大

村民隨著經濟與教育需求而衍生的移動、生活型態，因交通技術進步而使移動能力、日常移動範圍增加，而有所不同的形態。如下圖 19，首先整體交通移動技術、時空流動性較低的時候，村民的移動領域較固著於公興村內。

而後外部交通移動技術、時空流動性增加，而公興村流動性尚未與外部銜接時，公興村為滿足教育需求，其日常生活、移動場域必須脫離公興村至嘉義市方能滿足。而向外部尋求經濟需求的村民也必須脫離原本移動場域，長時間在外部流移、停留，方能維持其經濟需求。



圖表 19：移動場域階段圖

而後公興交通改進、與外部流動性銜接、移動能力增加，致使歸返公興的村民得以有更具自由性的移動型態，來選擇其居住的區域；得以在日常的移動範圍內，兼顧各自在公興村與嘉義市所倚賴的機能、滿足現代生活中的需求。因此交通能力提升、流動性增加，同時也增加了生活型態的變異性、與可選擇性；新的日常移動型態得以產生。

3.5.3 移動與認同再生產－持續性移動與轉移的觀點

本章闡述了公興村民流移歸返，並調適適合地方「定居」型態的生活場域移動脈絡與內容。許多討論遷移、城鄉聚落、地方認同之觀點，認為鄉村人口的外流，是國家策略、資本經濟發展主義、現代化所造成的問題，是為人對地方認同感喪失、資源分配不均、都市資本主義對鄉村的剝削等。但本章探討公興村民生

活場域轉移的狀況，將其轉移視做為達到「定居」的調適之觀點來看，將不同於前者所認為，視移動、遷移為單次性、具問題性的現象。

另一方面，儘管生活場域持續的轉移，但部分公興村民的日常生活場域終歸返公興。本文在回顧認同論述，提到認同的形式與生產的方式所具有在空間上延續、流變的性質；因此公興村民向外流移的狀況可視為認同在空間上的流變，與外部場域接觸、在空間上移動促使認同的再生產。而村民歸返公興村活動，代表生活場域脫離公興村，並不是認同出現斷裂，認同仍以某種形式維繫著。歸返後的日常移動場域與生活型態，在公興村、居住區域、嘉義市之間往返移動，也持續凝聚、加深生活場域的認同，進而拓展新的地方感。在生活場域中的生活內容與活動性質，如產業活動的內容與性質，也是影響認同在空間上的再生產狀況的因素。下章將討論生活場域、內容與認同在空間上的生產狀況及差異。

第四章 公興村民生活場域轉移過程中的離散認同狀態

本章將探討上述公興村民流移、歸返的過程中，認同的離散狀態；探討村民移出、歸返時認同的變化。並由其生活內容、經濟活動性質等層面，探究流移族群的認同再生產在空間上的過程與差異。

第一節 流移過程認同的離散狀態

公興村民日常生活場域的轉移，並不代表與公興村脫離聯繫關係，而是持續藉由過去對原生活場域中隨時間而累積的情感、記憶、想像所生產的認同作為聯繫；即對公興村的場域、地景、人事物有持續連結，此為促使流移族群歸返的重要因素。而村民向外流移則開展了認同的疆域，而能將原本與自身有所差異的事物納為己用。

4.1.1 離散認同具有歸返與抵抗力量

人在不斷流變的時空中，欲依賴過去生活中所熟悉、記憶、接觸、經驗的事物；因時間的累積與在空間場域持續的移動，使其產生認同並建立彼此的關聯，藉由相應對的地方生活型態，得以安定於一場域上。儘管一切事物都不斷的變動、隨時間前進而改變；人卻帶著對過去的寄託，試圖在不斷流變、推進的浪潮中歸返過去，卻仍無法完整歸返、保持原本的樣貌。即是因欲歸返但無法到達，但仍以歸返做為目標而持續的實踐與行動而產生了鄉愁；因此鄉愁包含時間性、認同、實踐、抵抗等概念在其中。

鄉愁為人隨時間愈久而累積的一種恆常狀態，無論如何都想著歸返；而變遷程度越發劇烈，其主體所能感受到的鄉愁則越為強烈。快速、劇烈的流變，迫使人與所依賴的過去瞬間疏離，歸返則更難以達成。即如整體結構、時空性質歷經現代性的快速轉型，而使其歸返的實踐較難以個人來達成；即整體結構、自身所面對的狀況使歸返更具困難度。

4.1.2 歸返記憶中家鄉的困難

上述公興村民向外流移的移動現象，可以視為村民在歸返上的力不從心。因公興村傳統經濟活動無法維持，相繼的是其於生活內容、活動的衰減，而無法再歸返於過去的生活樣貌。因此村民向外流移即是村民無法歸返心中原鄉的體現。待在公興無法「定居」，公興成為無法歸返的家鄉，歸返之路困難，遂以其他較消極的形式體現出歸返的實踐。

公興村內部時空性質未與外部流動性銜接的時期村民的需求，必須依賴處於

公興村外部的經濟、教育；而時空隔閡較大、移動能力較差而致使日常生活場域無法將公興包含進去，則是歸返困難的實質因素。但村民脫離公興、在外流移，是起於非自願性的因素造成，是在不得以的情況下流移。然而在流移的過程、狀態中，村民仍以各種自身能力所能實踐的方式來達到歸返，試圖抵抗流變，趨向歸返的狀態。而當歸返的困難、阻礙減少，家鄉得重新作為「定居」的場所，則其鄉愁的力量便由實際的歸返移動所體現出來。

4.1.3 流移族群與原鄉的認同－離散的文化、認同延續與再生產

上文試圖闡述公興村民移動過程中具有離散意義的概念，本文於第二章已闡述離散的形成與認同具有的性質。而離散的產生，是起源於受難式的被迫離鄉，並且難以歸返，因而引起失落、惆悵的心情；離散族群帶著對家鄉掛念、惆悵的心情，在他鄉的日常生活實踐中，試圖用各種形式來彌補此種失落的心情，塑造出存在於他鄉的歸返、安定感。即儘管無法以實質的接觸與移動，來達到歸返的滿足，但在心理、想像、認同上，則總是依歸於家鄉，而影響其生活型態、實踐的不同。即文化的異地再生產、地方與認同的再建構，異地的環境性質、社會、經濟將成為不斷累積的鄉愁的一部分；在持續、連續的移動過程與時間流動中，將無法將當下與過去所累積的認同與鄉愁分離開來，而是成為一個具完整脈絡的整體。

4.1.4 流移族群與地方的聯繫－記憶、空間與物

公興村民在外流移而後歸返公興，即表示儘管日常生活場域脫離公興，但公興村的狀況仍然足以對流移族群的移動場域與型態有關鍵性的影響。此狀況指出兩個現象，即便日常活動領域不在公興村，並不代表流移族群對公興村認同有所喪失；而是以過去對公興村的認同為基礎，在受迫外移的狀況下，認同遂向外開展。過去所累積的記憶、認同，經驗過的空間與物、人，都是豎立主體的過程、與主體有密切的關聯。另一方面，儘管不是日常性的活動場域，但透過間隔較久的返鄉、電話通訊等，公興村的資訊、脈動仍然與離散族群保持聯繫。

此種非自願性的移動，即使原本「定居」於地方的村民向外移動，而原生活場域具有眾多與村民有密切關聯的事物。上文提到流移族群得以歸返的條件，包含土地財產、生產空間、適宜的居住場所的具備，方能在公興村重新得以作為定居的場域時，促使流移族群歸返公興村。即認同在活動、移動過程中，依附於所接觸的空間、人與物之上，若空間與物能保有其具體清晰的輪廓、形體，人則能持續的與其接觸、互動並累積時間與認同在空間與物之上；物與空間的健在及歸

屬感、歸屬權的與否，使認同更能延續並保有清晰的連結，而能使其成為促成移動的因素。若認同的載體已不復存在或形體改變，該認同將僅能停留在過去所累積的印象與記憶中，而難以藉由實際的歸返來幫助追憶。

4.1.5 移動過程的認同生產

認同是隨著主體在物與空間上，移動及時間的累積程度而有所強弱。因此認同的建構即與移動型態有密切的關聯，即便以一個既定的生活場域來看，其對所移動的各處場域也有認同上的落差。於場域範圍內的移動頻率、持續在其中活動、移動的時間、內容的豐富度等，皆影響了認同對特定人、物與空間的強度差異。

因此由公興流移族群的生活場域的變遷、以及日常活動、經濟活動等內容來，即可看出村民在移動過程中認同的變化狀況。人對場域認同的強度，視其移動型態、活動性質等而影響。社會網絡、對空間與場所的記憶、對物的情感等，接是透過互動、活動、移動，使認同依附在人、空間與物的情況。而其中促使在其中活動的因素，又圍繞為滿足「定居」的內容中。如經濟生產、烹飪飲食、消費、政治結社、教育、家族關係、休閒娛樂等。以下將由移動、歸返過程，以及經濟活動、生活內容來探討公興村民認同的流變與再生產的狀況。

第二節 生活場域轉移過程的認同轉變狀況

— 離散的認同再生產與文化傳承

村民在外部流移時仍保持與公興的關聯，以過去對公興村的認同作為基礎，隨受迫性生活場域的轉移而生產、拓展新的認同場域。此認同上的連繫，促使日後流移族群歸返公興，而得以使日常移動、生活場域，能持續的在公興維持、推進對公興的認同再生產，是為離散認同的狀態。儘管居住場所轉移至傳統生活場域之外，認同仍是以公興為基礎，具累積性、延續性、脈絡性的持續在新的生活場域進行認同的再生產。

4.2.1 公興村民在流移過程中對社會、經濟結構產生的認同一體認到差異

(一) 零星接觸與認知—認同的初步轉移

村民之所以體認到公興與外部區域、都市的差異，始於在外流移而產生的接觸與互動。首先即為經濟上的互動，即地方產業經濟價值在整體經濟結構中價值的差異。其次為零星的接觸、移動與資訊的接受；相較於所見的外部發展狀況，有感於公興村與外部的差異，認為到公興未來發展性較低。儘管當時資訊、交通尚不發達，接觸、移動的頻率較少，但在已知外部的發展狀況後，認同即已開始建構；甚至在想像中所建構的認同，會比真實移動中所建構的認同更為膨脹(程超澤，1995：133)。根據村民敘述：

[...]老一輩覺得說山區的孩子沒有辦法融入市區的生活，沒有辦法跟外面接觸。[...]他覺得小孩要提早出去，才有辦法獨立。[...]在公興]任何資訊都沒有，你會覺得說跟社會是斷層的。[...] (訪談 2-B1：10)

[...]電視就台視中視華視，[...]固定只有三台，所以你的資訊甚麼的都沒有啊，因為我是在市區成長的小孩子，我知道市區的一些科技甚麼都比較先進一點。[...] (訪談 2-B1：11)

因此資訊的移動以及零星的接觸與移動，促使村民逐漸對整體社經結構的轉變狀況有所認知；而與外部資訊流通、時空連結關係的隔閡，則使村民對地方生活型態感到不安與危機，使之轉向認同外部都市，對其有所寄託與憧憬。此現象伴隨日後公興傳統經濟衰退，促使公興村民持續以與整體結構融入、銜接為努力方向；並且也因而促使村民向外流移，而拓展了認同的領域。如村民所述：

[...]現在原有的產業你要留到下一代，一定沒落、一定不行。以經濟利益來講，小孩子要回來的機會根本不高。[...] (訪談 4-A4：10)

(二)流移過程拓展的認同—村民認定歸屬的所在

因此家長將孩童送往市區受教育，即為使孩童投入至社經結構、大環境之中，與之互動。求學過程長時間的在外部移動，促使孩童在成長過程中，對整體社會、經濟、都市發展與生活等狀況較為適應與有較深入的認知，也對外部的文化、社會有一定程度的認同。

另一方面，隨著公興傳統經濟衰退，促使村民必須向外流移尋求新的經濟來源，也促成村民非自願性的向外移動，並對外部產生認同。村民在接受外部生產型態、經濟來源的同時，即必須接受不同於自身公興村的新的認同的轉型；村民在此狀況所體認到，唯有在非自願性的移動中產生新的認同，順應、接受、依賴現今社會、經濟結構中部分資源，方能延續、歸返原本對原鄉認同與歸屬的想像。

4.2.2 流移村民與公興村的聯繫狀況—因鄉愁、懷舊而歸返與其具有的抵抗性

(一) 與原鄉在認同、情感的聯繫—一心懷舊、欲歸返的地方

因經濟需求而在外流移工作的村民，仍與公興村有密切的連繫。首先，無論公興是否重新得以作為「定居」的場域，但仍然曾經作為村民長時間在其中生活、移動的場域；另外空間與物的歸屬感，也聯繫了地域與人的關係，並保持了清晰的認同感，如村民所述：

[...]畢竟你的土地還在那邊，是傳承。[...]公興[對我來說]就是一個你生長的地方，小時候長大的地方，對他有一點懷舊。[...] (訪談 4-A4：10)

[...]那是一個懷舊的地方，我也是想說，以後老了回去走一走，就是希望那個地方不要荒廢掉，你回去那邊你有很多固屬在那裏，但是要叫我回去住那邊不可能。[...] (訪談 4-A4：11)

因此過去長時間累積的記憶與認同，伴隨著該空間與物的輪廓存在，村民在鄉愁本能的引導下，有歸返原鄉的傾向。儘管流移在外，仍對過去的生活場域有深刻的連結。根據村民向外流移時，自身對家鄉、公興認同而促使的心情之描述即可體現：

[...]山裡的地，就好像是一個包袱一樣。[...]這個包袱存在著你對這片土地的感情，你總不能放掉，放掉耆老看不下去，你出來外面找頭路？[...]這片土地當然是帶著長輩或是我們這一代對土地的感情，愛這片土地的感情，可是相對的也是一個包袱，就像把我們這些年輕的綁住了。[...] (訪談 1-A1：3)

此段訪談資料足見村民在流移與歸返之間的離散狀態。村民在試圖與整體社經結構銜接以維持競爭力、欲融入結構的同時，村民欲歸返的力量則是不斷抵抗向外流移的反向力量，因而村民仍盡力的調適生活方式與場域，而使自身能維持與公興村的關係。

(二)持續關注原鄉的變遷狀況－鄉愁與認同在離散狀態具備的實踐力量

流移族群除了以想像與記憶維持著對公興村認同的連繫之外，非日常性的歸返及藉由通訊器材，也使得對公興村的認同是持續連繫的，而流移族群也能保持對公興村脈動、變遷的資訊的掌握。根據流移族群對於歸返公興的原因之敘述：

[回來公興]想要賺錢而已，[...]以前就山裡這塊自己的地，很單純的要把自己這塊地創造出一些經濟利益。[...] (訪談 4-A4：8)

有回來的話會比較好，未來比較好，所以就回來了，看好茶這個產業。[...]還沒回來[我]就[先]種茶了，[...]我把錢拿出來，要請人來種茶、整茶。[...]雖然[我]人在[台北工作]但是把錢帶回來這邊。[...] (訪談 4-A4：6)

[...]很單純，我就只是要賺錢而已。我出去外面打拼就是要賺錢，我回來這裡種茶也是要賺錢。想要有一個自己的產業，比較永續一點的產業。你外面也都做工，要是被裁就沒了。[...] (訪談 4-A4：7)

由此三段訪談資料可以看出，村民因公興經濟衰退而出外流移，但仍對公興的變遷狀況有持續的關注；既然因經濟因素而流移，也因與自身有歸屬感、有所關聯的場域之經濟復甦，而產生歸返的意圖。因此儘管在外流移，但在認同與歸屬的聯繫下，原鄉的變遷狀況仍能影響遠在他方的村民的活動與決策。除此之外，相較於依靠外部，村民更願意投入至自身歸屬感、認同感較為強烈的場域；一方面能免於承擔外部強烈流變性、不穩定性的工作性質的風險，另一方面得以歸返公興村熟悉的場域上活動，自由性與安定感也較高。即在公興村「定居」與歸返的

條件滿足後，鄉愁勢必帶領在外流移的村民歸返公興村。

4.2.3 產業性質與經濟活動為認同在一生活場域持續生產的核心

上文已闡述經濟是使場域上的活動得以持續的關鍵。如村民所述：

如果你完全沒有產業的話，我跟你講那留不住人，你人總要吃、要生活。[...]你不是做工就是產業，你沒有產業怎麼留得住人？[...]你大人沒賺錢孩子沒辦法讀書、沒辦法繳補習費、沒房子、沒飯好吃、水電沒辦法繳。[...]有在那邊工作的人，會在那邊，你要是沒產業在那邊，你一樣不會在那邊。如果我今天我在公興沒有產業的話，我一樣離開。(訪談 4-A4：8)

而此狀況在鄉村則更為明顯。傳統的農業聚落，即是以產業活動在一場域上衍生其餘各種的活動，而形成完整的地方「定居」、生活場域樣貌；如因經濟活動過程，而必須移動、操作、與人共事互動、休息、消費等。其因經濟活動必須長時間的在特定場域中密集、高頻率的移動，因此經濟活動所衍生的活動，則充實了區域上活動的豐富性。上述狀況皆可指向「定居」的概念，以下將討論公興村經濟復甦後主要的產業－製茶業，其產業的活動性質，及其活動性質所建構的認同。

4.2.4 以製茶業為主而衍生的活動與開展的生活場域樣貌

(一)製茶業的基本性質－自由性高

製茶葉的產業內容包含茶園照料採收、茶廠製茶到包裝行銷等過程，由種植、採收、生產到行銷皆需耗費相當多的勞動力與時間。根據公興村從事製茶葉的居民述說製茶業工作的時程情形：

管理茶園你就是說除草、灑藥、施肥，那不用很多天。[...]一年也要[上山]五、六個月，你要是產業比較大的，一年就要到七、八個月了。[...]如果以一片茶園一甲地，你真的要做的話，你差不多四十天就做完了。每天一天做八小時，是四十天。(訪談 4-A4：2)

而若以一年採收 4 至 5 次的茶來估算，一年也約需工作 5 至 6 個月。因此一年之中有相當長的時間是需要到公興村的茶園或茶廠，因此這樣的工作時程與公興村保持了一定程度的互動頻率。而關於工作的性質據受訪者敘述：

[...]你去茶園多少做，做沒八小時就做兩小時，草割幾株。有時候如果懶懶的、比較熱或比較冷就又下來了。山上的工作就是這樣，下雨也休息，要是太冷、懶惰也休息。[...]彈性不大的就是說，你自己把它放到過頭，有蟲害甚麼的，就比較立即性要處理的。(訪談 4-A4：2)

由此可歸納出製茶業的工作性質如下：

1. 單次工作的時間性

村民前往公興工作，如正值製茶密集時期，則單次工作是長時間在公興村內製茶。而非製茶時期也必須以一定的時間管理茶園。

2. 前往生產空間的頻率性

需密集、高頻率、日常性的前往公興生產空間，除了密集製茶時期外，必須日常性的照料與管理茶園。

3. 密集生產與停產的季節性

製茶的季節性，連續三季密集的工作期，而有一整季較閒暇的時期。

4. 工作的自由性

茶葉屬於農業型態，因此自由度高；村民可自行分配照料、整理、製茶等時間，且工作期間仍多有空檔。

(二)空間使用與社會互動

因此在上述所歸納的性質之下，製茶業在管理茶園上有較大的彈性，但仍須有固定的頻率至茶園察看。而也因上述製茶業的性質，雖然居住場域已不在公興，但因產業仍在公興，因此在工作閒暇、休息之餘，返回公興工作的村民皆與其他村民有較多的互動機會，或者有一自身休息、集合的據點或棲身之處。根據村民所述，他自身回到公興村、工作休息之時便會回到原有的老厝：

[...]我們的老家還在。[...]茶廠那邊，就像理事長他們家一樣。雖然那邊晚上沒有人住，但是都會回去，白天都有人在啊，我們的叔叔都有回去，大家的產業在那裡啊。[...]都是人家來我們那坐，回去大家都是來我們那比較多，

甚至你工作開車從那邊經過，要是看到在都會去那邊坐。[...]那算一個據點啦，山上很多這種據點，這個地方人氣比較旺，大家都會經過的時候，停下來在那邊坐著聊天。(訪談 4-A4：11)

此段敘述足見產業對於地方生活、社會網絡與認同及空間使用之延續的重要性。產業的留存與性質，使得村民在返回公興村工作時也一方面延續著地方生活方式的進行。雖然村民返回公興村的主要目的是產業活動，但在產業活動之餘所衍生出來的活動則有利於地方上空間、生活感受、社會關係的延續，並能保持自身對公興村的認同及聯繫，得以持續與原本的生活場域互動，進而更新與實踐自身在原生活場域的認同。



圖表 20：居民聚會空間

圖表 21：居民聚會空間

(三)流移歸返族群與原生活場域之社會網絡重合

因此公興村藉由製茶業而形成了不僅單純以經濟為目的的地方社會關係，是一種具有地方深層交互關係並具有拓展性、實踐性的網絡。製茶業做為公興村目前主要的產業，多數的村民轉型製茶或由外歸返製茶；村民藉由過去的共同的生活場域、生活方式等，已建立了自身的社會網絡關係，因此不是藉由經濟體系才建立的，是一種具有脈絡性、多重因素交會下而形成的網絡，即原本即是在相同場域、文化基礎生活的親戚、朋友、鄰居關係。而根據公興村村民描述這樣的關係與製茶業的興起過程與工作情形：

茶廠要是像說理事長他們就是他們爸爸兩兄弟，他們兩個是合資蓋的，合資的話就是說，你做茶的話你那個日子可以錯開，你摘一天我摘一天啊。[...]

那些茶以人力分工的話，三個人來做就可以。[...]他自己一個人沒有辦法做，我們就是說會支援。[...]我幫他們做他們付我工資，我也不是只幫他們做，我幫很多人做。我幫他做他就付我工資，然後他幫我做換我付他工資。(訪談 4-A4：3)

由上述訪談資料可以得知，經濟體系在一地的建構過程，仍是建立在原本地方社會網絡的基礎之上。在以經濟目的為考量的活動之下，首先互動的對象則是在已存在的網絡之中；藉由原本已彼此熟悉、經常接觸、共同生活場域等，而優先從此族群中來選擇。雖然是經濟作為目的，但此經濟、產業而形成的網絡關係，填補了公興村民因時代變遷與地域斷裂的鏈結，並重新建立、增加了村民彼此互動、維繫關係，如受訪者所述：

會比較常[在熟悉的茶廠]做而已，不固定。[...]我比較知道他們工作的習性，[做茶的]默契會比好。[...] (訪談 4-A4：4)

而根據受訪者 A3 敘說公興村做茶時的工作情形，表示由於做茶之時，村民便能一起聚集在茶廠共同工作與互動，彼此之間也會討論關於製茶技術、產銷方面的事情，茶業也因此形成地方的經濟網絡。由於製茶業是屬於全村共有的產業活動，加上製茶業是需要大量的勞動力以及較長的工作時間，並需要自行銷售，固茶業為公興村建構了一定程度的地方生活內容。

(四)茶業的區域流移性

產業活動除了增加地方上、聚落中村民活動的可見度，日常生活中村民彼此的互動機會提高。而除了作為公興村地方上主要活動的核心，製茶業做為區域上最大規模的產業，此種區域型的經濟體系，使得以製茶為業的公興村民得以在區域中流移。根據受訪者敘述製茶業的產業活動行為如下：

都請人在做[茶]。[...]不一定是住公興，要會做。都是在這個茶界裡面的師傅。[...]我們都有交流。[...]我做(茶)過很多地方，我曾經到過里佳、到過南投，我都去過。[...]他那個就是海拔的高低不同，但是做茶的時間也不同。[...]比較高那個茶就比較早採。[...]他們做完之後，這邊就採第二區，就是這樣子巡迴。[...] (訪談 4-A4：3)

由此可知在整體大阿里山茶業經濟體系中，公興村從事製茶業的村民除了在村內製茶之外，也會在整個大阿里山茶區中的茶廠流動。而此經濟體系內還有其他的組織如茶班：

茶班的話一般平地人比較多。[...]量很多的話，以山上人口數這麼少，沒有辦法採。然後外面平地的人看中了這一塊，說有機會可以賺工錢。[...]組茶班的話就是比如說，我組的茶班，阿你(種茶者)有茶嘛，打電話給[茶班]，然後我這些茶需要幾個人採，哪一天要採，[茶班會]幫我帶工人上去。(訪談 4-A4：4)

因此從事製茶業的村民，其整體生活的內容、所接觸的人與組織，都脫不開整個茶業的經濟體系。投入製茶業之後，對於區域上的茶業經濟體系的運作方式，有自身所熟悉的網絡，從種茶、採茶、製茶、賣茶各個過程，都須仰賴區域上整體的經濟網絡系統方能，在自身能力範圍內得以維持穩定的經濟收益，並得以延續地方生活型態。

4.2.5 歸返後經濟活動促使的認同再生產—製茶業支持了豐富的地方活動內容

由上述可知，公興村在以製茶業為主的經濟活動下，支持了公興村地方活動的完整性。一方面其經濟性質仍然維持較貼近土地、生活場域的傳統性質，不如都市經濟上的講究分工、獨立、流動、快速。製茶業的生產性質，結合了上述幾點的性質，與地方有較緊密的關係。較長時間在空間場所、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接觸等，即是緩慢並長時間的移動，在空間上的人與物的建構出較深入細緻的認同並具有較強烈的地方感。同時製茶業也因為是屬於較固著、依附場域較強的產業，因為茶業是較具地域上的固著性及較長、頻繁的工作時間，也加強了認同在地方的再生產強度。

另一方面，是由過去在公興的活動、移動而來的認同，與其融合並持續疊加。前往過去即在公興村所熟悉的地方環境、認識親友互動；村民在此歸返的實踐下，依據新的結構性狀況而調適出的認同再生產，是與地方能相當緊密的結合。一旦產業、經濟活動能留存、返回原本村民的生活場域中，村民的活動、社會網絡、生活型態等便能有相當程度的、自然的與原本的地方脈絡融合。儘管必然的與過去的生活型態、文化與價值觀有所差異；但以產業做為基礎，使公興村能維持地方生活內容的豐富程度與交互關係的情形之下，不至於使村民僅以單一目的作為回到公興村活動的因素。公興村在這樣的關係而維持了生活方式的延續，得以自

行醞釀、推進、創造地方的文化，原本的生活內容卻仍能維持一定程度的完整性。

4.2.6 居住場域的活動狀況－依賴居住場周邊因流動性所提供的機能

第四章已闡述促使公興村民調適居住場所的主要因素是為滿足教育需求，而使得村民居住空間不處於公興村內，而是在轉移至較靠近都市的區域；也因此使得日常移動的範圍擴大，形成目前的生活型態。而在上述村民生活各內容主要依附於經濟、產業活動而衍生的狀況下，歸返族群調適後，其依附於居住場域而衍生的活動，則較傾向於整體結構下流動、快速、機能性的性質。

首先，在居住場所周邊的活動，以提供孩童教育，方便接送孩童、或供孩童通學的移动性機能為主。其次，由於居住區域較靠近嘉義市、交通易達性與流動性較高，則有作為經濟上銷售、生意的功能。根據村民敘述：

[...]所有的時間我如果有空、不是晚上，如果白天我都回來山裡。[...]出來活動就是回來山裡而已。因為在[後庄]只有睡覺而已，還有賣茶葉這樣而已。[...]
(訪談 5-A1：16-17)

由此可見，大部分的活動仍以經濟場域為中心，而在居住場域上是以提供孩童就學、銷售產業等少數幾種活動為主。

儘管主要活動、移動場域仍在公興為多，但村民也認為居住在較靠近都市的區域是有幫助的。如村民所述：

[...]反而我認為要住在外面，你一些資訊、一些網絡，比較能和外界在互動，你就是要住在外面。[...]和鄰近社區動、外縣市社區互動比較快，如果蹲在山上，你只要距離[就是阻礙...] (訪談 5-A1：17)

即是村民所以倚賴的是居住場域在區位上的流動性、移動性，如教育通學、產銷流通、資訊互動等。

4.2.7 歸返後移動型態所建構的認同比重

－最終歸返的想像、認同再生產與實踐仍以原鄉為重

(一) 生活場域內的區域性質差異－穩固與流動之間的認同生產差異

上述說明了生產空間與居住場所各自衍生的活動內容與性質，因經濟復甦而歸返公興的村民，以經濟活動做為基礎，在過去即熟悉的生活場域作為基礎，並

在地方拓展出新的生活場域。依附於原本即存在對原生活場域的認同，而後歸返地方、持續的在地方推進、累積認同與記憶；抱著鄉愁在他鄉流移，最終以不同於以往的形式，實現歸返的欲求，得以使自身的認同重新歸返原生活場域之上實踐。

另一方面，鄉村與都市性質的差異，也影響了認同的再生產狀況。如上所述，公興村民的產業經濟及其衍生的活動，是緊密依附於土地、原生活場域。儘管時空性質持續趨向流變，但其活動性質較趨於傳統的時間性質狀態；除了區域間的時空距離因交通工具有所壓縮，其餘主要的活動仍然是以較緩慢、細緻的移動為主、與場域的互動關係較為緊密，因此其在公興村、生產空間上所再生產的認同較為深厚。

而越趨向都市區域，場域中的結構脈絡、時空性質將越趨於現代性及資本主義的流變、快速片段等性質。如歸返族群將居住空間調適至較靠近都市的區域，即為滿足社會分工下單一目的性的需求，如教育需求；其餘附加的活動性質，也是因依附於靠近都市區域而所具備的流動性方能達成。在居住場所區域的此活動性質下，其認同的建構則與地域的關係則相對的比在公興村為薄弱，作為單一目的性而活動的場域，無法與具有較完整生活脈絡的原鄉般能即刻建構出深刻的地方感，該區域上的認同是得以在時空瞬息流變的狀態下被不斷取代。

(二) 各認同主體心中認定的歸屬—最終歸返形式的不同

上述受訪者 A1 對於自身在居住場域上的活動來看，即是將居住場所視為單純的滿足居住、教育、資訊等純粹目的性的機能，而使得對其居住場所上(認同不是均質性的)的認同感薄弱。據村民 A1 所述：

[...]產業在山裡[生活重心]當然在產業這邊，你只是住在[後庄]可以生活嗎？
[...]山裡還是重心，[...]你住在[後庄]那邊只是說為了小孩子受教育。[...]後庄]就一個空間這樣而已。(訪談 5-A1：15)

由上述可看出 A1 所認同、想像的歸屬之所在為公興村。但 A1 之所以會有如此的認知，不僅因場域上的活動、結構、時空性質的不同，導致認同再生產在場域上的差異；自身對於最終歸返型態的條件及想像的不同也影響區域的認同再生產差異。如村民所述：

[...]我是山裡沒房子了，你要是山裡有房子的人，A1 也是想說孩子把他栽培到大，A1 也想去住山裡，像他爸爸那樣，空氣好、自在、房子旁有菜可以吃。[...] (訪談 4-A4：11)

[...]A1 也想要老了要回去，大部分的人都是這樣子。[...]以後你會回去住那邊，比如說我跟 A1，他會回去住那邊，[...]我是不回去住那邊，但是我以後我會常常回去那邊走走。(訪談 4-A4：12)

各人對歸返型態的想像因自身條件而有所不同，以上述訪談資料可以看出，於公興村原生活場域是否有可適宜居住的場所則有關鍵性的影響。即在條件允許、得以達成的狀況下，村民將盡可能的歸返公興村。因此以 A1 自身的狀況來看，目前的居住場域即只將其視為滿足階段性的教育需求，待此需求滿足後，則將進一步歸返公興村；原居住場所的存在，使其具有歸屬感，認為回到原居住場所，才是最終歸返的型態。

而 A4 的情況則略有不同，由於在原生活場域中並無可適居的場所，因此可能已認為當前的居住場域與生產場域之間的關係所形成的生活型態，已是最大能歸返、「定居」於此的型態，而使認同的再生產有所不同：

[...重心]一定是放在[當前的]家裡，如果是擇一的話就是這樣，家裡以外其他的時間，你就可以把它放在[公興]社區。[...]過去的家]那個是小時候的記憶成為回憶了。[...]你可跟他(過去的家)做評比、你可以跟他做討論，但是你要回頭去那邊住不太可能。(訪談 4-A4：16-17)

因此其認同再生產的場域，則以各人的自身條件作為基礎，進而對最終歸返的狀況有所想像與描繪；而將其想像作為認同再生產的場域。但無論歸返族群各自之間的生活型態、對歸返的想像有所差異，但共同的狀況為一只要條件狀況允許，勢必會盡可能的朝原鄉、原認同的場域歸返。即無論如何皆心繫著心中想像的家鄉而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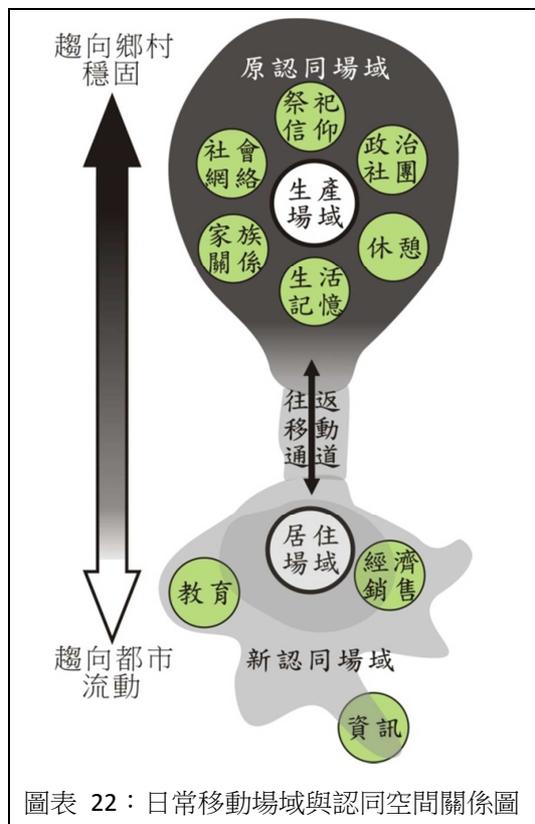
(三)歸返調適後移動形態的認同空間

一 依附流動性、都市機能作為延續與傳承文化的方法

歸返族群藉由流動性的增加，而得以在歸返後調適居住場所，為滿足新的「定居」需求遂拓展、調適生活場域的樣貌來觸及都市所提供的資訊、教育等機能，

即日常生活、移動場域範圍擴大。而此種新的日常移動型態在上述日常活動的性質下，即促成了認同在場域上向外拓展的情形；隨著日常生活場域的擴張，認同遂在隨著移動的過程而開展。但在上述認同再生產在場域上的差異狀況，認同的強度則隨場域上的活動性質、對歸返的想像而有所不同。歸返族群對於原鄉公興村仍然是作為主要活動、認同歸屬的所在，而外部場域為新拓展的認同空間，是依附於外部的機能而拓展，因此對該場域的認同則較為薄弱。而連接兩區域的通道，作為快速往返區域之間的功能，過道性質為重，因此認同的形成也較單薄，如下圖 22 表示。

本研究所指的居住場域向外調適的現象，若僅單方面關注鄉村、並視移動為特殊、單次的現象，則多將其解讀為鄉村人口外流、地方衰退、認同危機等狀況。但以本研究觀點來看，公興村民除了在向外流移之後有歸返公興的現象，代表了對原鄉在認同上的強烈連繫、視公興為歸屬的場域；而居住場所脫離原生活場域，也不代表對原鄉的認同危機，其主要活動、認同場域仍然歸屬於公興、原鄉之內。公興村民與在與整體結構、時空性質轉變的相互辯證過程中，在鄉愁的抵抗下、及條件允許的狀況下盡可能歸返原鄉。以新的生活、移動形態的實踐歸返公興，以原認同持續的再生產新的認同形式。



村民在與整體結構辯證、流移過程中，為能適應、持續「定居」於持續轉變的結構中，由生活、移動型態的轉變中，展現了自身對其流變的抵抗、適應、修補能力。由圖 22 來看，歸返族群所調適的移動型態，是日常往返、流移於鄉村的穩固與都市的流變，兩種不同地域結構性質之中。藉由現代化交通，每日流移往返於時空性質不同的兩個端點，而居住場所介於其中。此移動型態、居住場域的調適，體現了村民在流移、歸返的過程中，對自身在結構中的詮釋。即村民藉由現代性的流動性、都市的機能，做為延續自身文化、認同的方式；即順應流變的結構，而在其中找到了自身「定居」的方式。

本節以離散認同的方式，建構公興村遷移、歸返，及歸返後的居住調適、移動型態、活動內容等，與認同的關係。其認同隨著現代性、時空性質、整體結構的趨勢而轉變；地方與結構之間的辯證，而呈現出新的認同樣貌。本節也提出此認同的再生產，由鄉愁、離散、定居的概念來看，仍是依附著原鄉的認同作為基礎，以新的形態呈現、具有隨時代結構的改變而適應、調整的能力。因此認同是以任何形式有脈絡的流變、延續、傳承，而不是固守原貌、固著於原鄉的。

然而在現代性、時空壓縮、流動的狀態下，認同則更容易受到技術方法、知識論述、策略、權力等層面的影響，下文將闡述影響認同建構的各股力量。

第三節 計畫性認同的支配力量－認同自主性的壓抑

公興村民認同再生產狀況，是為村民憑藉自身對公興的鄉愁、欲歸返公興，並與整體結構變遷的辯證下所形構的。然而後繼有下一股結構對地方的滲透力量，試圖影響地方的認同再生產、社會文化再結構的方向。即可支配自主性鄉愁的支配型鄉愁力量，或 Castells 的計畫性認同之力量。其力量源自技術、知識論述、權力等層面，試圖在整體時空趨向流變性質的狀況下，廣泛的滲透地方、並支配地方的自主性鄉愁，進而影響認同的再生產的方向。此狀況否認了不安定狀態的作用，剝奪了認同主體自身面對不安定的機會，也抑止了以自身的能力調適、修復、適應變遷的能力。另一方面，則忽視了歸返族群在自身狀況與結構之間辯證下，自主形塑出的歸返型態；鼓勵進一步的歸返並創造了虛幻不實的原鄉樣貌。

4.3.1 鄉愁的內容－自主性被支配的認同生產

(一)具信任基礎、自主性的認同再生產－獨立於支配型鄉愁之外

鄉愁中帶有與流變抵抗的力量，Castells 稱其為原初正當性認同受到支配邏輯的壓迫而產生；本文認為在時空性質、整體結構持續的改變下，傳統、地方生活結構受到衝擊時，自主性鄉愁的力量便已被激起。其所呈現出社會、文化再結構、認同再生產、地景聚落變遷，即是地方住民感受到確切明顯的變化、並無法歸返，進而帶著鄉愁而實踐所造成的物質轉變。Harvey 認為此種轉變是一種「創造性的破壞」；即本文試圖闡述的在結構轉變對地方所造成的影響中，地方住民在流移過程中帶著自身「鄉愁」的力量不斷尋找新的「定居」於世的方式。而公興村民在流移後，結合外部結構的流動性機能，成為公興村民「定居」的形式。

上述為地方住民以具自主性的鄉愁力量，在面對受到時空、結構變動而產生定居的不安定感時，根據自身狀況調適、自我修復出的認為適宜的生活型態、新的定居形式。Castells 對此種認同再生產的性質有所敘述：

[...]網絡社會不但是以地方及全球間有系統地脫落為基礎，而且也是以權力與經驗在不同時空架構中的分離為基礎的。[...]要建立以信任為基礎的親密性則需要對認同重新定義，這種認同必須具有充分的自主性，獨立於支配性的機構與組織的網絡之外。(Castells, 2002: 11)

公興歸返族群在未受具支配性的機構與組織有計畫性的影響下，所獨立、自主調適出的生活型態，即得以促使具信任基礎的認同再生產；因其信任基礎不依賴、受支配於他者，而是憑藉自身意識的選擇、鄉愁下所形塑出的。

(二)支配性鄉愁的來源—時空流動下權力與支配性的介入

個人在現時空性質與結構的流變下而形成鄉愁，而一社會、文化結構中，也必然有鄉愁存在—即結構性、社會價值的鄉愁，而其具有支配自主性鄉愁的能力。支配型鄉愁，則是依附、利用自主性鄉愁的特質—歸返與抵抗性，方能形成。如面對前所未見的快速流變狀態所帶來的不安定、欲求歸返等。因訴求於消弭、撫平此種不安定狀態、呼籲歸返的知識、論述、技術等，即是現代主義機能式的面對此種即須解決的問題而生產出的解決技術。

而後如 Castells 所述的網絡社會的崛起，在資本流動的引領下，國家權力、政治也試圖利用時空流動的滲透力量，試圖廣泛的深入地方並實踐其鞏固國家權力的策略。有計畫性的利用所能獲取的資源、權力、知識、技術、規範等，促成影響—文化認同的轉型與導向。如 Castells 所述：

藉由市民參與、社會發展等多元體制、都市運動及其論述、行動者與組織，都直接或間接地被整合至地方政府的結構及業務當中。在杜絕都市運動作為另類社會變動的來源的同時，這種趨勢也大大地強化了地方政府，並引入了將地方政府做為重構政治控制及社會意義的重要例子的可能性。(Castells, 2002 : 71)

由此可見，支配性鄉愁為杜絕社會不安定、引導認同的走向、提供歸返的方式而存在。但另一方面，國家、政府、機構、或具權力的社會行動者則可能以帶有意圖性更加滲透至地方，並達到控制地方、促成地方文化、社會的再結構的影響。

(三)受控的自主性—認同集體轉向抵抗結構的流變性

支配型鄉愁為滿足自身支配地方自主性鄉愁的正當性，片斷的詮釋了整體結構流變、城鄉發展的狀況，並將其問題化、危機化。支配型鄉愁的實踐者，由於處於較高層的社會角色，較容易擷取資源、文化材料將自身的論述技術化、知識化或權威化，以具備社會實踐、控制認同的力量。如做為抵抗資本、發展主義的滲透，成為一股相對抗衡的主流論述；將社會價值導向抵抗資本累積、全球化、時空流動的範疇。

支配型鄉愁策動了自主性鄉愁期望歸返的性質，將論述技術、體制、知識、策略化，提供更多的歸返形式；鼓勵返鄉、試圖創造原鄉經濟、計畫性的地方活動策畫，增加流移族群移動於原鄉的頻率、增加在原鄉的認同再生產的方式、增加了流移族群自身對歸返的想像。

在上述支配型鄉愁對流移族群認同再生產的影響下，可能致使原本經過仔細衡量、以自身現實狀況考量下而調適出的歸返型態受到衝擊；忘卻自主性下自身對原鄉的想像，對鄉愁、固著於原鄉的歸返有過多的追尋，而忽視整體結構轉向流變的趨勢。Castells 認為此狀況延長了時空流動性下疆域性的延長：

[...]在社會變遷過程的核心中，主體建構所採取的路徑是與在現代性與晚期現代性中不同的；也就是說，當主體被建立時，它不再是以市民社會為基礎，因為市民社會已經在解體之中；而是社區抵抗的延長。在現代性之中(不管是早期或晚期)，計畫性的認同是由市民社會所建構；然而在網絡社會中，如果計畫性的認同如果鐘就能發展起來，他則是從社區抵抗所產生的。

(Castells, 2002 : 12)

Castells 闡明了市民社會的主體性正趨向解體—即整體結構、時空性質朝向流變的性質，而導致原本認同疆域明顯的狀態被轉化為離散流移的狀態，即本文闡述公興村流移的狀態。而支配型鄉愁欲重新建立具疆域性、完整主體性的社會、文化認同，則延緩了流移的現象，延長了原認同場域的形體；而其是藉由具意圖性、目的性的政府、組織、社會行動者的權力與技術，來做為延長抵抗的方法。

(四)過度鄉愁導致的封閉性

支配性鄉愁試圖製造地方認同與離散流移之間的疏離，增幅了鄉愁抵抗流變的力量，對原鄉的認同疆域感、歸屬感提高。Castells 認為，地方、一文化場域在當代以資訊主義、資訊快速與滲透流通而可能使得地方被均質化的狀況之下，僅能以自身所處的場域做為基礎，以空間、地域做為認同疆域，與之抗衡。(Castells, 2002 : 70)因而認同與文化在受到威脅與衝擊之時，其認同主體容易退縮至自身最為熟悉的認同之場域與載體之內，Castells 認為這是一種防衛性認同的展現。

「突然地未加防衛地面對全球化的風暴，人們不知所措，而只能緊靠再一起；而他們過去所擁有的，他們過去的做為，成為了他們的認同。」(Castells, 2002 : 70)支配型鄉愁即鼓吹此種退縮、防衛自身疆域的方式。

Castells 認為此類認同社群、社區、公社，表現了對於社會盛行趨勢、即資本累積、時空流動等趨勢的反動，所形成的防衛性認同是以避難及團結的方式來運作。(Castells, 2002 : 75-76)Castells 提到對此狀況的隱憂：

由防衛性認同(再)建構意義的過程是藉著脫離社會制度，並承諾將由底層

重建，然而卻將自己封閉於公社天堂中。[...]文化的抵抗仍可能侷限於公社的界限之內。無論在何時何地，如果此種情況發生，公社主義將會封閉逾其組成中潛在的基本教義派，最後可能導致公社天堂變成了天堂般的地獄。
(Castells, 2002 : 76-77)

支配型鄉愁可能造成認同失衡的現象發生，與結構、時空性質轉變趨勢的背道而馳；關閉認同的開放性與流動性，固守認同的疆域，拒絕與結構進行互動的辯證，過度的抵抗甚至敵視意圖去認同疆域的流變性。並放棄自身在與結構辯證過程中，所具備的調適能力。

上述為支配型鄉愁或計劃性認同的性質，以下先敘述支配性力量滲入公興村、促使其再結構的過程；而後討論支配型鄉愁對公興村認同在生產的影響。

4.3.2 計畫性認同力量滲透公興的過程

自 1990 年代起，當時正值台灣由發展階段步入後發展的時期，伴隨著批判聲浪，民間與官方組織、機構開始反思發展主義下對於文化、環境的影響，國內社會遂逐漸開始重視文化與環境上議題，而後續則陸續生產相關的論述、實踐的方法與策略。認同、文化保存與傳承便成為主流對抗的第二主流論述，而後社區營造之概念被提出：「文建會主委申學庸在 1994 年提出社區總體營造一詞，以建立社區文化、凝聚社區共識、建構社區生命共同體的概念，來作為一類文化行政的新思維與政策。」(Wiki, 社區總體營造)屆此，國家社會控制力量，便逐步廣泛深入的滲透至各個地方，並影響地方認同的再生產過程走向。

(一)社區組織的成立潮流—支配力的初步滲透

1. 計畫性認同、權力與地方初步的再結構

公興村之社區發展協會成立於 2001 年，根據內政部社會司的各區域社區發展協會之成立時間之統計資料中來看，在 90 年之後成立的社區，在整個社區發展協會之成立狀況來看，已屬於較晚期成立、剛起步的社區組織。至於公興村當時成立社區發展協會的契機與原因，目前的社區幹部述說當時的情形：

那時候的狀況，大家都不了解社區，就是番路鄉那時候有一兩個村還沒成立社區，上面說一些經費你沒成立社區你是沒辦法請的。[...]那時候根本不知道社區要做甚麼事情，那時候只會想說，平平這些社區，人家都有自己的社區，那為什麼我們沒有社區發展協會？(訪談 5-A1 : 1)

可見當時社區成立組織為一種區域性的潮流，公興村民基於自身對於公興村的認同，遂在 2001 年成立公興村的社區組織。而在成立前後，結構權力已逐漸滲透流入地方，如村民敘述成立前後對外的接觸狀況：

公興就是因為有一兩個人包括村長也是，接觸到公部門。那時候我們的老村長，他對社區這方面當然樂觀其成，可是他老村長身為村長也沒有甚麼概念。就是有幾個人跟公部門、跟我們的公所稍微有在接觸，就是我們社區的招集人。（訪談 5-A1：1）

為成立社區組織，村民與外部、權力單位有所接觸。此為繼經濟、教育與結構接合之後的計畫性認同、權力與地方的再結構的初步階段。

而後公興村原有的行政組織，隨著社區組織的成立，遂在機能定義、工作分配上有所變動。根據村民所述，社區成立之後，社區組織與村辦公室的工作有所重疊，而後方逐漸重新分配、釐清各自的工作內容。此即為權力結構滲透地方後，具體促使地方政治資源再結構的情況，如村民所述：

[...]最後硬體建設這方面，我就交給我們總幹事，就是村長。我說，硬體建設都給你發落，不要跟社造搞在一起，因為我發覺社造這個區塊把那個搞在一起的話，我就搶你的工作了。（訪談 5-A1：8）

2. 社區組織成為公興村認同再生產的元素

此時期為成立社區組織，公興村民遂必須以此目的流移於公興村內各聚落，籌備組織成立事宜。逐步促使公興村的流動性及村民之間互動頻率增加，並在公興村內投入了新的認同元素，如村民敘述：

[...]既然都在山上，劉理事長身為招集人，當然你找不到人的情況之下，大家都要幫忙挺，雖然是不太熟。[...] 那時候只是交個身分證影本交一個印章，不會[麻煩]到哪裡去。（訪談 5-A1：4）

由此可知，此時公興村內遂因為成立社區組織，而衍生出除以經濟目的外的，具目的性的活動，已介入了公興村民認同再生產的過程。

(二)地方行動者的組織化與學習－與計畫性認同及權力結構銜接

1. 為學習社區組織事務而受制度、技術的規範－與權力結構銜接

而在社區組織成立後，無論是外部支配力量意圖積極將地方納入制度、知識體系的掌控內，抑或是地方村民欲求融入結構；為能發揮社區組織的力量，遂有一序列接與制度、計畫、知識、技術接合、學習、納入規範的再結構過程。如行政工作的熟悉、計畫書書寫的學習、設備工具操作的熟悉等，如村民所述：

[...]寫第一份計畫書寫的很困苦，[...]身為一個社區幹部是被操出來的，因為沒有人懂。[...]接社區幹部這段時間，從電腦文書，包括一些軟體操作、繪圖，從頭到尾都重新學。(訪談 5-A1：3)

因此為經營社區組織，村民必須學習包括行政工作、技術設備使用、文案書寫等內容。而此學習、熟悉過程，也提高了與社會結構的接合與流動。

2. 流移歸返族群為地方社會行動者的適當人選

流移歸返族群，因與外部社會接觸較多如求學經歷，而使得對整體社會狀況較為熟悉了解，也對現代化的設備較容易上手。因此在社區組織的經營邏輯欲融入地方時，歸返族群則有較高的適應能力，如村民所述：

[...]那時候在社區我算是專科畢業，然後回來山裡務農，在這方面多多少少比我們其他的社區居民要比較有底子。(訪談 5-A1：3)

因此歸返族群在較有能力適應、融入社區組織的工作之下，則可能擔負較多的社區工作，頻繁的流移於村內、與村民互動接觸，而使對地方有更甚入的認識，地方認同感也隨之提高，如村民所述：

[...]重點在那個過程，[...]你會去了解這個社區[...]像這個過程演變，造成社區幹部之間的融洽、有參與感。[...]當然無形之中就會感覺到說，本來我跟他們很接近；可是搞一些關於人的事情，像之後我們也跟他們很接近。[...] (訪談 5-A1：9-10)

而地方行動者也必須密切積極思考、實踐於與地方資源、地方網絡的聯繫，建立社區組織與地方資源的關係，此過程則促使了地方行動者認同在地方的持續生

產。

流移歸返族群原本即對鄉愁、歸返的敏感度較高，並結合歸返族群與結構較有互動經驗，而使支配型鄉愁遂較容易策動歸返族群，促使歸返族群融入支配型鄉愁的制度、技術邏輯之下。而在地方社會行動者與支配型鄉愁有較高程度的結合、地方再結構後，以地方社會行動者作為與權力結構結合的地方主體，便得以逐漸發揮支配性鄉愁在地方上的實踐，影響地方認同再生產的走向。

3. 地方社會行動者為將地方導入計畫性認同支配的關鍵

地方社區行動者發揮支配型鄉愁的實踐角色作用後，進一步的影響地方認同再生產的走向，如藉由所欲執行的計畫、活動等，必須宣導提高其餘村民對社區組織的認知、策動村民參與社區活動、增加村內日常生活認同生產的內容

[...]有的人是算說，對那個[社區組織]根本就沒有概念。[...]經由一些會議，一些幹部會議你要慢慢的教育。[...]你就要宣導說社區的動作、社區的立場，社區的功能到底是怎樣。[...]一定要有幾個人去了解，他們在各鄰裡面茶餘飯後，會去醞釀出一些話題出來。(訪談 5-A1：3)

他們[居民]會曉得說，社區你做的有它的功能在，他們只是一個小區塊，小聚落，他們會開始約。(訪談 5-A1：3)

因此支配型鄉愁、計畫性認同的力量得以滲透地方，並持續對地方認同的再生產造成影響，地方社會行動者扮演了關鍵的角色。

流移歸返族群由初接觸社區組織、逐步學習相關業務，遂得以與外部權力組織、機構的計畫性力量銜接，成為實踐結構權力滲透地方的社會行動者角色。地方社會行動者遂能有效的策動權力結構所欲創造的地方認同再生產的走向。

(三)計畫性認同的實踐－策動村落的活動強度

在地方社會行動者對自身角色作用較為理解、與外部權力結構結合程度較高後，地方社會行動者遂得以逐步以支配性鄉愁的意識作為核心，在公興村內策動地方認同的再生產。地方社會行動者藉由持續的與村民互動、舉辦活動、執行計畫等增加地方流動性與植入新的地方涵構，增強的村民對自身生活場域的地方認同感，如村民所述：

[...]社區上課多、辦活動多，那些義工，願意出來幫忙的人認知度會比較高，你有共識，參與的人就會比較多，那就可以達到這個效果。[...] (訪談 4-A4：13)

[...]有這些民俗活動，[...]如果你有辦的話，資訊方面會增加社區裡面的資訊交流，參加的人也會比較多，你參加的人越多資訊交流越多的話，會改變居民的一些想法。(訪談 4-A4：19)

[...]我有感覺到說，有些社區居民你辦活動，是我最後一個知道，我是被邀請的對象。他們自己想要辦，而不是我說今天甚麼時間到了，我們就來辦怎樣。[...]是一鄰的做甚麼，人家會邀請我們去；三鄰的要做甚麼，也會邀請我們去。[...] (訪談 5-A1：10)

地方社會行動者一方面持續的在權力結構中所計畫、設計出的制度、技術與規範中學習與發展，並在公興村執行其計畫性認同力量欲實踐的價值核心。除了權力結構的滲透隨地方村民的呼應程度、擾動的增加而深入外，做為關鍵的地方社會行動者自身對地方的認同感、對地方的疆域感則也持續的增加。

(一) 進步的地方支配技術與策略

地方社會行動者與權力滲透所引起的地方再結構較成熟後，地方接受計畫性力量的程度也提高，也較能被納入支配型鄉愁的運作力量。社區組織、地方社會行動者在熟悉、基本的技術、制度、步入規範之中來操作之後，權力機構則持續透過上位者的權力角度，控制地方實踐認同再生產的方向、掌控地方分配資源的方式。如透過審查機制、提供特定的資訊輔導內容給予地方社會行動者、監控性的進度與時程分配等，來確實掌控地方認同再生產、社會文化在結構的方向能符合，支配型鄉愁、權力機構的價值期望。此為結構權力為能深入滲透地方而設計出的技術與方法。

1. 計畫性質審查－權力機構的否決權

權力機構在地方實踐支配型鄉愁的計畫，必定具有特定的意識形態與價值目的，由初部引導地方至受權力結構的支配，使其進入所設計的制度與規範之內實踐。作為資源提供與規範制定的機構，並在整體區域內有一定程度的網絡、社區

組織之後，伴隨著在結構內與想像中的共同體相互競爭的性質，權力機構對社區組織的實踐方向與計畫內容的認同與否，便使其能作為支配地方認同再生產方向的方法。如村民所述：

[...]縱使你社區有自主性，可是公部門還是你上頭，有某種的考量。[...]社區的公文去，不是說一定會[核准]的，這個從公關還是人脈下去操作。(訪談 5-A1：2)

[...]我們第一份計畫書讓人看到是搖頭的，[...]我不知道怎麼寫，我寫這樣上去做簡報穩死的。只是[指導單位]給我們一個機會，我們才會去動這個頭腦，這著手重於人與人之間這個區塊。[...]我們之前直線型思考，我們就想那些而已。接受到文建會的計畫，我們才開始辦一些活動，人要怎麼提拔、人才要怎麼拉，我們會去動頭腦。(訪談 5-A1：7)

此段訪談資料具體呈現了權力機構所具有的權威性，能否在權力機構的審查機制下受到青睞，成為社區組織意識形態上的目的。為能受到認同，即必須靠攏於權力機構、支配型鄉愁的價值。此狀況遂成為權力機構支配地方認同生產的重要策略之一。

2. 權力機構提供的資源與輔導

權力機構所提供的資源、資訊、輔導的內容與性質，也是支配地方社會行動者的思維價值的重要因素，如村民所述：

我們第一份計畫書[...]寫到今年的第三份計畫書，就有很明顯的落差，我們從想要做不知道要怎麼寫軟質的、軟性的計畫書，從硬性的計畫書寫到軟的去。[...]他們是給我們機會，可是也教我們之後，等於給我們駕照，然後我們就自己去學開。[...]有一些不懂得也是要給他們[社區輔導員]請教，[...]有時候不知道要請教誰的時候，他也是我們的一個媒介。[...]替我們找一些可以幫我們解答的人。[...]讓我們自己去感受、去改變。(訪談 5-A1：9)

可見權力機構欲在地方實踐的支配型鄉愁之內容，具備某種特定的方向與方法框架，而在權力滲透促使地方在結構的過程，即是促使社區組織在實踐支配型鄉愁的計畫時，能修正到權力機構預設的範疇、方向之內。

4.3.3 支配型鄉愁滲透後對認同、地方、文化造成的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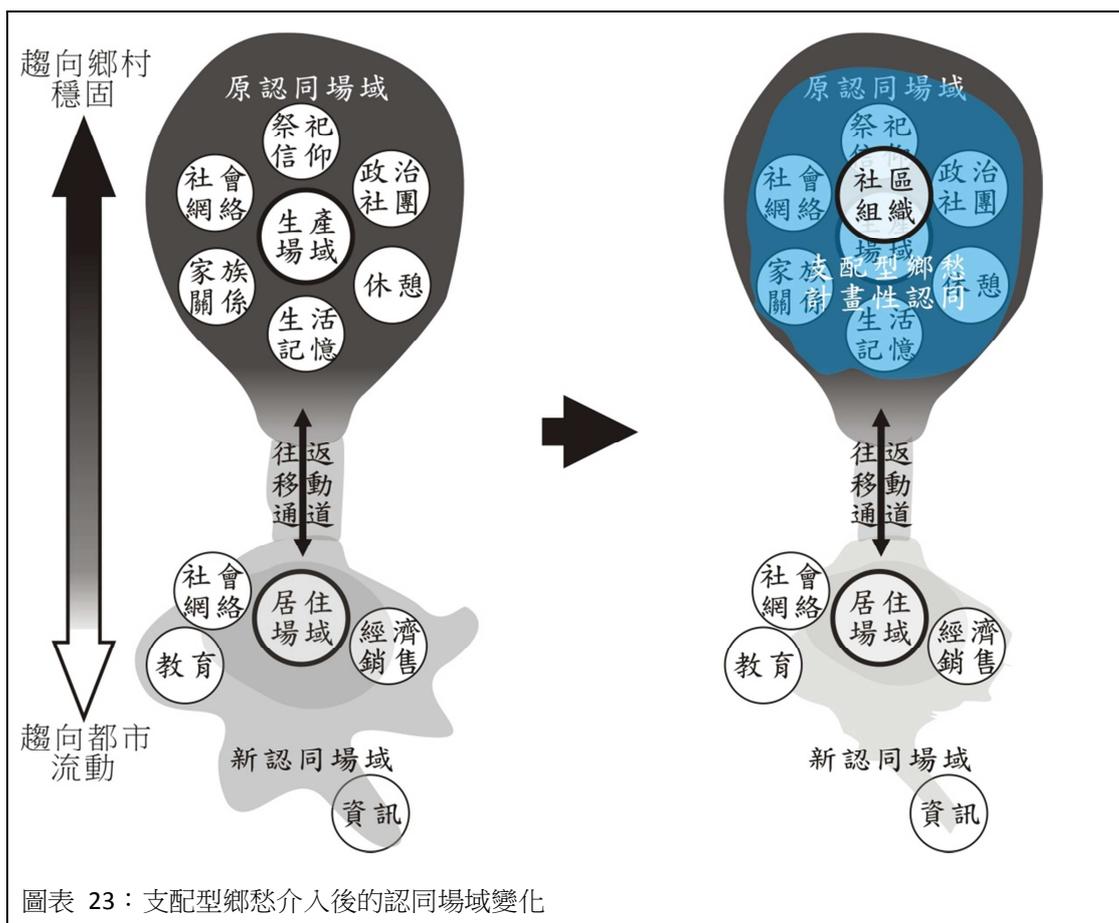
—地方抵抗與封閉性提高

(一)結構與技術的影響—鄉愁的可歸返性與實踐正當性的提高

上文闡述支配型鄉愁以計劃性的方式滲透公興村、並促使地方再結構的過程。其技術、制度是創造了得以實踐鄉愁的結構；原本自主性鄉愁下村民自主調適出的生活型態中，是根據自身條件狀況而決策、實踐出的型態。而後在支配型鄉愁的滲透下，除了在意識形態上允許進一步實踐自身的鄉愁之外，藉由倚賴其結構下、計畫性下所生產的方法技術、論述知識，伴隨可用資源的增加，而得以擴展鄉愁的實踐程度。鄉愁的實踐能力在結構性的推展下，得以進一步的實踐；因充足的條件、具有實踐的正當性，而得已更為開展歸返之路。

(二)認同再生產的內容改變—認同場域內縮

支配型鄉愁在計畫性在地方造成擾動、增加地方認同再生產的內容，而該認同是圍繞著支配型鄉愁的價值在運作；此認同再生產依附了該價值在運作，因而結構權力遂廣泛滲入的滲透地方。包含流移歸返族群的公興村民，由於自身在公興村流移頻率增加，而使其地方認同也隨之增加。支配型鄉愁的介入，改變了原本流移歸返族群在公興村認同再生產、流變的狀態、地方感的比重，如下圖 23。原本在整體時空性質的流變下，歸返族群的認同的再生產方向是藉由移動領域的擴大，而得以在歸返後處於穩固性質的原鄉與流變性質的都市之間；是藉助於現代性結構的部分機能而得以調適出以公興村為認同基礎的「定居」型態。然而支配型鄉愁的滲透，則可能促使村民與此種調適出的型態產生疏離，而促使認同的再生產失去自主性；即地方認同的再生產必須倚賴權力結構所掌控的支配型鄉愁來運作，而失去在整體結構、時空性質變遷中，在認同依附、生產與調適的自主性。



(三)支配型鄉愁造成的封閉性—地方認同、社區意識強化後造成的文化抵抗

在支配型鄉愁的計畫性操作下，村民隨著互動流移的增加，對公興村的社區意識、地方認同也隨之強化。而歸返族群因需求而調適的居住場域，原本作為歸返族群地方認同拓展的新場域。但如上述在支配型鄉愁的影響下，其認同拓展、再生產的狀況有所改變，傾向向公興村移動、其鄉愁的抵抗性更為強烈，其認同在空間上的變化狀況，在穩固與流變之間朝向穩固一方靠攏。而致使原本得以在調適後的居住場域進行的地方認同的建構狀況，有退縮的情形。根據村民敘述在居住場域活動的狀況：

[...]我不曾參加[後庄的地方活動]所以我不知道。[...]我不曾跟人互動過，因為我認為我的社區就是在山上，我去互動外面的幹嘛？[...]因為我不[想]要[互動]啦。(訪談 5-A1：16)

支配型鄉愁的計畫性實踐，促使鄉愁之中原本即帶有抵抗變動的性質強化了。歸屬感與社區意識的強化，可能促使地方主體與不屬於自身結構內的外部結構互動意願降低；排斥他者、抵欲入內者於門外，而一意欲實踐自身的鄉愁、延續對心

中想像原鄉的樣貌，如 Castells 所闡述的公社的危機。

(四)計畫性認同的論述困境

支配型鄉愁得以實踐，是以計畫性方式設計出包含制度、規範、技術等，影響認同再生產的方向，建構新的結構、或促成結構的轉型。而能以計畫性的方式實踐支配性鄉愁，通常是具有論述權威、能運用操作資源的權力個人、組織、機構或國家。支配型鄉愁與自主性鄉愁同樣具有歸返的性質，但支配型鄉愁為成為結構性的價值象徵，所動用的資源、網絡通常較龐大與複雜。因而需要一明確的價值典範與論述基礎，以其作為核心生產、設計得以實踐的技術、知識、策略以滲透結構。支配型鄉愁以既有的論述框架作為典範，形構成結構性的網絡，而得以具備影響認同再生產的能力；但另一方面，由於其結構性的龐大，而導致在典範的移轉、修正上的不易。

4.3.4 權力支配與自主性之間的矛盾－社區營造的反思

本節闡述權力結構在支配型鄉愁的價值下以計畫性的方式滲透地方、權力結構與地方進行再結構的過程。此概念接近劉立偉在〈社區營造的反思：城鄉差異的考量、都市發展的觀點、以及由下而上的理念探討〉一文中所闡述的：

[...]社區總體營造從文化建設出發，在社區為核心的多元草根民主之社會動員過程中，試圖建構市民社會的認同。綜觀台灣社區議題與政策的興起，始終來自於國家的倡議，在實踐上社區總體營造所展現的是重建國家認同的積極企圖，致使草根民主的奠基讓位給民粹主義的訴求，而民眾參與則弱化為國家用以達成特定發展政策的工具。[...]（劉立偉，2008：313）

國家作為掌控最多資源的權力組織，順應在現代性與時空流變的發展特徵下所造成鄉愁的普遍性，進而以社區總體營造作為一種計畫性的方式試圖支配地方認同再生產的方向。儘管社區總體營造的論述緣起來自現代發展下社會問題的修補，試圖透過凝聚社區意識、重建地方文化等計畫性方式作為實踐的方法；然而作為結構性修補的策略，其所需動用的資源為國家層級的單位方有掌控權力。因而在此權力單位的執行下，欲達成轉變結構性的目標，即需以支配性的方式策動地方方能達成。如劉立偉所述：

[...]顏亮一解析陳其南意圖藉由社會總體營造來召喚與培養「社區意識」，進而建立「公民社會」；前者建立在鄉土意識與傳統文化之上，後者則建立在政治與社會權力的基礎之上。由於在地社區認同被視為國族認同的基礎。社區總體營造政策變成了建構國家這個「想像共同體」不可或缺的元素。[...]（劉立偉，2008：328）

而其廣泛支配性的基礎源自時空流動性增加的時空壓縮，在其權力支配性的廣泛滲透下，原本具有自主性的地方也被納入權力體系的支配之下。而此種時空性質轉變促成的發展穿透國界轉化國家的角色，市民社會也相對失去自主性。（劉立偉，2008：329）

國家多年來策動此支配式的鄉愁價值，深入影響學界、民間組織、地方的思維結構，以吸收其作為整體權力控制的資源所用。而造成整體社會價值發展傾向朝向因襲守舊的保守主義，即鄉愁文化給予歸返原鄉過多的鼓勵、對原鄉的憧憬有過度的膨脹，如劉立偉所述：

[...]過去十多年來政府所推動的社區總體營造，雖然獲得社會基層的熱烈回應，但最大的問題應在於基本理念與願景釐清的必要。政府以公部門資源帶起社區營造風潮，卻也帶給基層參與者過多繁複與不合實際的願景。[...]（劉立偉，2008：316）

順應鄉愁而生產的計畫性策略，因滿足了地方、社會的普遍想像與期待，而得以在無形之中將其歸屬於支配之下。而公興村歸返族群在支配型鄉愁的支配下，可能造成生活型態與認同再生產狀況與原本自身自主調適出的型態背道而馳，忽略個人在結構中考量自身狀況的自主決策權，而鼓吹建構一致性的結構價值，人為的生產過多虛幻願景。

第四節 城鄉的相互依賴關係—時空性質轉變下新的認同、文化與聚落樣貌

本章以鄉愁以及離散認同的概念闡述認同的再生產、地方感的形成隨生活場域、地方生活內容性質的變遷而流變。而時空性質持續變遷所導致的地方再結構過程中，權力結構也計畫性的朝向地方滲透，試圖支配地方認同再生產的方向。此支配則影響了聚落文化、地方認同在時代中自我詮釋的自主性，將聚落、文化、認同收斂回傳統的定義框架之中，而忽略了文化、認同再生產的新樣貌。

4.4.1 聚落與認同場域流變—現代時空性質與結構中的「定居」型態

本文闡述了公興村民流移歸返的過程，與現代化、時空性質趨向流變性之間的關聯性，本章則由鄉愁與離散認同的概念來探討生活場域移動過程中認同再生產的狀況，說明文化、認同在空間上的流變脈絡。時空性質轉變促成的地方再結構、生活型態的樣貌，實為詮釋了現代鄉村聚落新的意義；為能「定居」於不斷流變的結構中，而須隨時改變、轉移生活場域、調適自身的生活型態，順應結構變遷的潮流並融入其中。

以移動能力隨現代化交通技術的進步而增加作為基礎，在整體社經文化再結構過程中，為滿足日常生活上的需求，所需要的移動領域範圍也有擴大的傾向。以公興村來看，依賴公興村的土地作為生活中經濟來源的同時，生活部分的需求則需倚賴嘉義市所提供的機能方能滿足；遂有調適居住場域的區位，並擴大了日常移動範圍。此為日常性的生活場域，在此場域內，流移歸返的公興村民方得以滿足現代生活中的一切日常所需；不同於過去在傳統聚落、生活場域中移動即可滿足日常生活需求，而是破除了傳統聚落的生活型態，隨時空流變性提高而日常生活移動場域也隨之擴大(見下圖 24)。

因此隨著社經文化的再結構，以及「定居」的調適下，現代聚落與日常生活的空間分佈將以不同的形態樣貌呈現。在不均衡的空間發展狀況下，透過現代化交通技術造成的時空壓縮、流動性質，使原本必須保持一定地理距離內的居住與生產空間，以及其他生活空間之間的地理距離擴大。以往在傳統生活場域中，也是藉由通道的連接方能移動於各生活空間之中；而移動能力增加後，同樣藉由通道移動往返於各生活空間。即僅為比例縮小，而現代日常生活移動型態的模型關係，仍與傳統生活移動型態類似。

以往明顯的聚落邊界、地方疆域的界線即被打破；時空流變性質的提高，即可能在驅車移動一小時的時空範圍內，皆可能為傳統聚落村民在現代的日常生活移動領域。

4. 4. 2 眾多鄉村聚落的移民區域—時空流變性下文化互動與混雜的新認同場域

在一區域中面臨相似狀況的傳統聚落，皆必須藉由調適居住場域於都市邊緣或傳統聚落與都市之間的區域，以依附都市所提供的教育、資訊等機能來滿足現代日常生活所需。以嘉義市為中心，周邊類似公興村條件，並以茶產業為主的阿里山區域中的聚落，通常都面臨如公興村所遇到的狀況；向外流移而後歸返、地方土地壓力、為滿足教育需求而調適居住場域。因此嘉義市周邊、邊緣區域如中埔鄉後庄，便因周邊山區聚落大量的移居，而成為居住房舍集中發展的新興場域(見上圖 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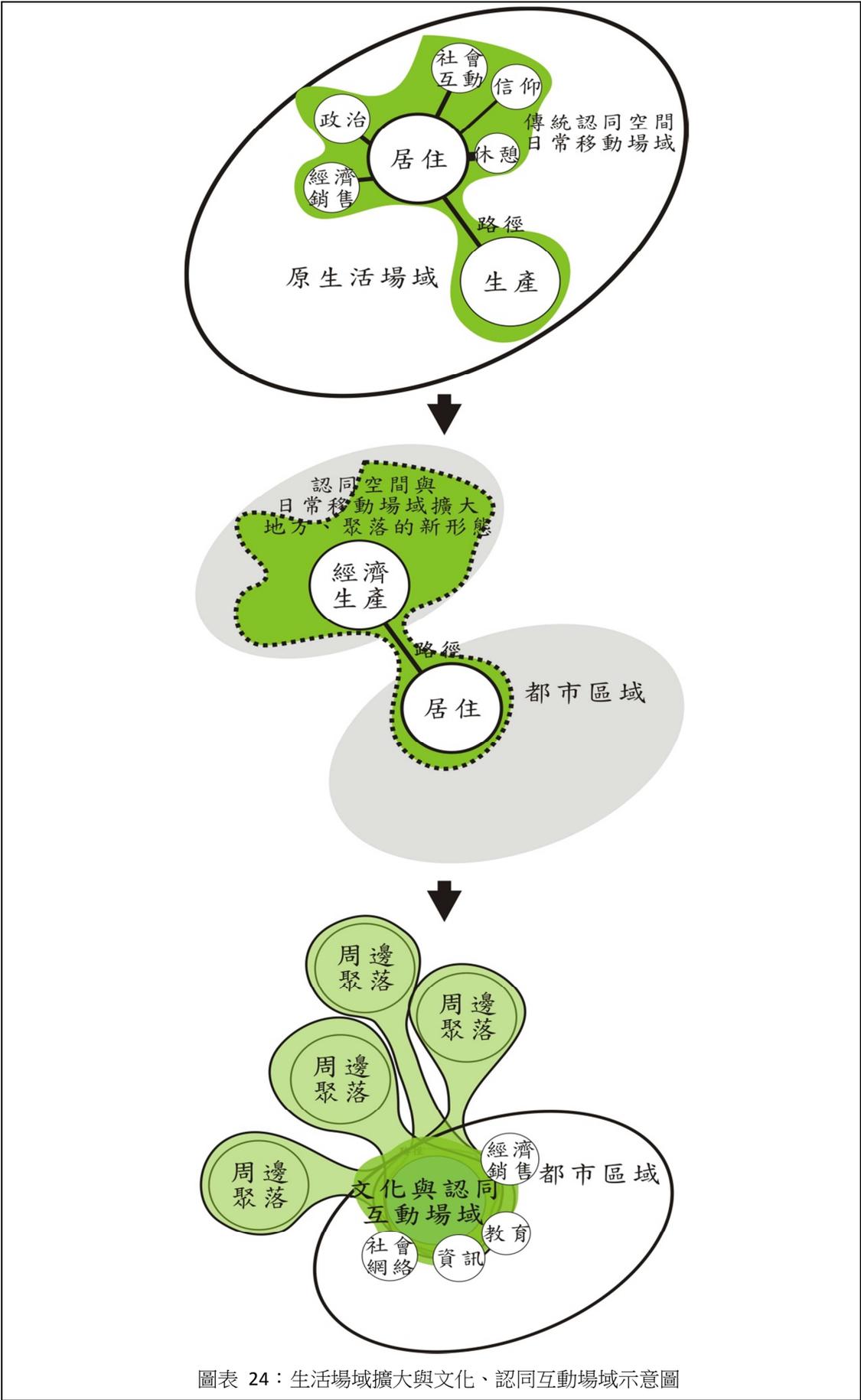
由於作為周邊來自於不同聚落的共同居住場域，該場域遂成為具有來自各地、具有不同的鄉愁與欲歸返的原鄉、不同文化與認同基礎的族群流動、混合、互動接觸的場域。而該場域處於都市與鄉村的交界地帶，即是作為時代結構特性、時空流變性質的象徵地帶，持續在流變、移動、混雜、離散的性質中試圖維持與原鄉的關係，並闡述了都市與鄉村之間的脈絡道路、不同於以往城鄉二元對立的關係。一方面鄉村聚落依賴都市機能，而得以在再結構過程中保持與原鄉的真實互動關係；都市則藉由各鄉村聚落流移歸返族群的移居，而得以持續豐富都市的文化，提供了新元素混合、碰撞、生產新文化內容的來源。

以此觀點來看地方再結構的變遷狀況一般認為上文所述的是都市化、鄉村人口往都市集中的現象；而認為都市主義與資本主義對的影響，破壞了鄉村聚落的文化與認同脈絡，是單向的遷移觀點所致。而若以本文離散、鄉愁的概念來看地方再結構的變遷狀況，則可以得知儘管鄉村在數據上的人口減少向都市集中，但其日常生活移動場域、認同的基礎與重心，仍然與原鄉保持緊密而深刻的關係；是為歸返族群為延續自身文化、認同，在不斷流移的過程中不斷尋求、調適而形塑出的型態。

4. 4. 3 支配型鄉愁造成的認同抵抗與僵化危機

— 忽視時代趨勢與時空潮流下生產的新文化認同場域

支配型鄉愁的計畫性的操作，則會壓縮到上述文化互動以及新文化場域認同再生產的發展。當前支配型鄉愁的形成脈絡，是基於認為國內經濟快速發展下對地方感的流失及鄉村聚落的衰退，因而以凝聚社區意識、喚起地方認同的訴求作為計畫性的操作目標。然而就上文的現象與結論來看，公興村經濟復甦後使流移族群歸返，其生活場域仍與公興維持密切的關係；而由鄉愁與離散的觀點來解釋，村民一直以來皆延續著對公興的認同連繫，在持續流移的過程中以其認同作為基礎，如 *Perd* 所闡述的感覺結構，持續的實踐著文化與認同的累積與再生產。而



圖表 24：生活場域擴大與文化、認同互動場域示意圖

在其所調適出的日常生活移動型態、以及居住場域的區位，則代表其與結構的辯證過程中，保持著具自主性的開放彈性與適應能力。

然而支配型鄉愁的價值意識並不鼓勵上述認同性質與自主性的發展；而是藉由計畫性的生產技術與策略、制度框架與規範、促成論述的生產等方式，創造新的結構體系，試圖支配自主性的認同並影響其發展方向。國內近代的支配型鄉愁所生產的計畫性結構，以社區總體營造的概念與方法最為主流。然而在本文的討論中，認為鄉愁與權力結構的支配介入是人類社會、文化歷史過程中的常態現象；而國家機構為確立自身支配正當性，將其作為監視、控制地方的工具也為之正常。然而就認同與文化發展的自主性喪失、文化與族群的排外性提高、自主調適能力衰退並習慣於依賴權力單位資源的支援等層面，確實是其中負面的性質。儘管具有改善地方環境、提升生活品質與幸福感的用意，但實踐者應時刻檢視自身反身性的時間效用性，不應投入過多與過度的鄉愁，以意識形態作為實踐的動力。如劉立偉所述：

有關「由下而上」的社區營造基本理念正當性的探討，缺乏相關文獻的廣泛討論，這可能是因為大多數參與社區營造的人，習慣將其視為不可挑戰的真理與事實。[...]今日民主政治已是普世價值也成為世界各國的政治體制，但民主政治卻是涵義最不清楚的政治概念。（劉立偉，2008：328）

屬於更為上層結構的民主政治，其涵義也未見清晰。究竟民主政治是自由與權力下放的象徵，抑或是集權政治的進程仍待可議。因此，持續的思考所實踐的論述核心價值的正當、正確性，促進論述的進步與修正是必要的。

另一方面，支配型鄉愁因與時空性質與結構趨勢的逆勢而行，與其抵抗的強度勢必逐漸增加，相對的所需投入的資源也勢必提高。Castells 認為此抵抗可能僅是社區、地方的抵抗延長，藉由計畫性方式以及投入各種資源，得以姑且維持認同的傳統樣貌。如當前以策略性、計畫性的方式，促進地方經濟產業的再發展，因而得以延長地方認同與文化的持續在生產。但其計畫性的地方經濟利益，往往造成地方內部更嚴重的疏離。並不如公興村的茶業經濟興起，是借助地方與整體結構的連結而自然興起般，具有公平平衡與穩定的性質。然而一但資源抽離、所依賴實踐的支配性結構解體，傳統地方認同與文化將會面臨比現代性有脈絡性的變遷所造成的認同變遷與再結構更為立即性、崩潰性的解體，屆時可能才是真正危機的開始。

第五章 結論－時代性文化、社會自主的平衡力量

(一)由遷移到離散－於當前鄉愁文化與城鄉發展觀點中開創新的論述方法

本文解析公興村民的生活場域在時空性質轉變下的流移歸返過程，以詮釋地方主體在與社會、經濟再結構的過程中，是以具累積性、延續性、歸返與抵抗性、流變性的在所處空間場域上持續進行認同的再生產；在鄉愁的導引下，以歸返記憶與想像中的原鄉樣貌作為日常生活實踐的基礎與目標。本文並試圖論證地方主體在面對社會、經濟結構轉變而導致處於在不安定、離散狀態時，展現了在持續流變的結構中自主調適的能力；得以在維持與原鄉的連結的狀況下重回安定狀態、找尋適合於不同時代結構特徵的「定居」型態，依附現代性所賦予的時空流動性來達到文化的傳承與延續。

筆者由國內城鄉發展論述之觀察及公興村生產與居住空間的關係切入，試圖探索不同於當前城鄉二元對立式的論述方法。而透過回顧國內討論城鄉聚落、認同、遷移等相關研究後，認為對於鄉村人口遷移之觀察與詮釋多將遷移視為地方發展歷史中的特殊事件，而無擴大觀察遷移的時間範圍；另一方面則在國內鄉愁文化的氾濫之下，對遷移有過於獨斷的詮釋、將其視為鄉村地方發展的問題化現象。而離散作為詮釋認同與遷移之間關係的新的論述，則提供本文不同於一般城鄉發展的觀點，突破二元式的論述方式。而公興村的生活場域及村民遷移的轉變脈絡，確實在向外流移及歸返之間不斷流變，若以過往單純的向外、向內遷移的論述方式，一方面過於單向式的解讀移動的現象，另一方面也無法作為整合遷移與認同之間的關係，並整體性的說明遷移過程內容及現象彼此之間的溝通關係。因此由遷移至離散，則是本文在書寫上以及研究方法與設計的一個關鍵之處。

(二) 認同具流變性的自主傳承與延續

而透過離散理論建構公興村生活場域與認同轉變關係，也得以在城鄉發展的範疇中提出不同的觀點。本文認為公興村民受迫向外流移之時，是以具累積性、延續性持續隨移動場域進行認同與文化的再生產，並根據認同在空間上的流變性，則可以認為離鄉流移之村民在與公興村認同的聯繫上仍保持著關係；認同再生產場域脫離原鄉，此本為認同既有的生產性質。認同是隨認同主體的移動而重新建構並根據，移動時間的累積而形成地方感；離開地方代表該場域及認同主體自身的條件無法再固著於該場域延續「定居」。

由流移族群對公興村脈動的關注、資訊的掌握，以及之後生活場域歸返、移動回公興村等脈絡來看，即具備了鄉愁、離散論述的概念。公興村無法維持生活經濟收入，使村民非自願性的離鄉、歸返具有困難。然而在他鄉流移時仍然維持

與公興村的聯繫與關切，代表認同與歸屬仍在公興；即記憶與想像所構成的鄉愁，使認同具備抵抗性與歸返性。而後在公興重新得以滿足「定居」的「構築」後—即維持經濟收入，歸返的障礙即消失，促使流移族群的生活場域歸返於公興。而為滿足現代「定居」的內容，遂調適生活場域與型態，如居住場所的轉移、依附時空的流動性來達到文化的傳承與延續。

由上述觀點來看公興村民生活場域的流移、變遷過程，其認同仍然是以具脈絡性、傳承性的性質在空間上跟隨著村民的移動而流變。而村民在處於認同的流變、不安定狀態時，則是認同主體正以自身所具備的能力來調適、應對生活上的轉變，適應與尋求新的「定居」方式。即一般所所指稱的認同危機，在本文的觀點中並不是全然的危機，即認同不曾失落與斷裂，而僅是處於不斷流變的定居調適；而是如 Harvey 所指出的「創造性的破壞」般，在受到衝擊動盪而處於不安、恐慌的情境中時，正是促使新的結構、認同、文化生產的必要元素與過程。

而公興村民借助現代的交通技術，而造成生活場域的擴大與變形；而其中可被明顯體認的變化即是，生產與居住場所之間的關係較於傳統狀態下，兩者地理距離的擴大，此意味當前生活場域與傳統的樣貌有極大的不同。在時空流動性質的不斷增加下，任何可見的物質如聚落、地景，或不可見的如文化、認同、社會等狀態，都處於出持續流變狀態中，並打破以往的形式被體現出來。然而此種流變、不安定的狀態，可以本文上述的觀點來說明；即認為其實聚落、生活場域的性質並未不同於以往的性質，只是在不同的時代以及不同的物質環境基礎下，被不同的樣貌與形式所表現，而無法輕易評斷將該狀況的好壞之處。

(三)社會價值生產的普遍認同危機—對公共與城鄉政策概括化實踐之反思

因此本研究以公興村的案例來看，認為公興村民在生活場域轉變的過程中，並不具有目前城鄉論述中所宣稱的認同危機。然而地方、鄉村聚落的變遷已然被當前城鄉論述全面詮釋為現代化與資本主義帶來的認同與文化的破壞所造成之問題，一方面宣稱認同危機的普遍性、另一方面召喚了集體鄉愁將其轉換成一種新的社會價值的同時，也影響了國家城鄉發展、公共策略的制定方向。

既然認同危機並不是一種普遍性、寰宇性的狀況，那麼即顯示現行文化策略、國家政策如社區總體營造一類具計畫性、組織性的文化、認同操作機制是以單一論述所生產的前提下，即無法落實有效根據地方特殊的文化狀況做出最貼近地方的策略。而僅能先將該論述落實為地方社會行動的核心價值後，召喚地方具有文化特殊性的主體做出意識形態上的支持；而剝奪了地方獨立思考、決策自身生活方式的權力與方式。然而這也是在時空的流變性質不斷提高後，新的社會、文化與政治型態轉型與崛起後，需要持續思考與面對的課題。

以公興村來看，茶產業的興起促使公興村民的歸返；實是在自然發展的脈絡下，不以計畫性策略干擾的前提下，地方文化與生活的自主延續。然而現行山林保育的政策，卻造成在村民的歸返上產生了一定的困難。而在文化策略上，公興

村必須藉由認同新的社會、文化結構的內容，來作為「定居」於公興村原生活場域的方式；然而在無法真實地貼近地方文化脈絡與生活狀況的計畫性組織的操作下，反而造成了本文所論述的認同的自主性、延續性等能力受到壓抑。原本不具有認同危機的公興村民，受到普遍性鄉愁的社會價值影響，附加了原本為緩和認同危機而制定的策略，違背對自身在考量環境與時代以及自身條件所決策與思考生活的能力，可能反而造成日後地方的認同出現危機及與時代趨勢斷裂。因此在論述的社會實踐及與策略的制定上，必須比理論的書寫更加謹慎，必須持續保持檢視論述的正確與正當性的修正能力，方能降低社會實踐所造成的負面效果與風險。

(四)城鄉二元論述對立的權力支配作用

在此觀點的論述之下，可回應本文之初所提之發問。在網絡社會的崛起之下，資本主義得以廣泛深入各個地方；以公興村的狀況來看，即是供流動性行走的道路開通之後，資本主義遂得以滲入、將地方納入資本經濟的結構當中，促使公興可重新作為滿足「定居」中「構築」作用的場域。然而網絡社會下「定居」的其餘內容，則需藉由日常生活、移動場域依附於網絡社會賦予的流動性而隨之調適方得以滿足；此調適後的型態體現出了時空流動性與地方結構的特殊脈絡，以及地方文化、認同遭遇流動性後所形塑出的特殊樣貌。

然而權力結構同樣欲透過時空的流動性滲透地方，遂利用社經結構因時空流動性而劇烈轉變的過度時期所生產具抵抗流變性的、較具本質與懷舊意識的論述；在社會、經濟、文化處在較不安定的再結構過程時，試圖召喚、鼓吹集體性的鄉愁使其成為一種社會價值。普遍的將認同、文化與社會的變遷現象，視為時空加速流動、資本主義經濟滲透地方所導致的問題；在社會呼應權力結構所召喚的鄉愁同時，權力結構遂得以確立自身滲透地方的正當性，達到支配地方以鞏固權力、作為操控權力利益的手段。

可以見得上述兩股論述力量始終維持著二元對立的平衡關係，並根據對方的論述轉向而相互調整。如資本發展主義欲開發地方，即對其施予忽視地方文化的批判；而欲融合地方文化開發地方經濟價值，則施予消費文化、文化本質扼殺的批判。由此可看出權力結構論述是依附於資本經濟論述而轉變的關係，其體現了時空加速流動、網絡社會做為時代進程的特徵；權力結構雖然召喚了文化鄉愁作為社會實踐的價值，但背後同樣是依賴時空流動性作為實踐滲透地方的基礎。權力結構在已然接受、理解現代性的流變特徵下，仍然召喚集體鄉愁向流動性抵抗，是為達到滲透、控制地方的目的，並依據資本主義的進程而修正論述以能確切的配合鄉愁文化的脈動、維持權力支配在論述上的效用性與正當性。

(五)文化理論及社會實踐策略的斷層

因此本文認為上述兩股的城鄉、社會、經濟、文化論戰，將會具有默契的以二元對立的平衡狀態持續進行；兩者社會實踐與發揮文化影響力的基礎，皆建立、依附於共同的時代特徵之下，實為一體兩面的論述。但由 Yi-Fu Tuan 地方感的身體經驗、Relph 指出人與地方情感、記憶的關聯、Seamon 移動過程建構的地方感、Harvey 指出現代性的時空性質差異、Pred 結構歷程的認同與文化累積、Cresswell 提及的全球地方感、Robertson 所述全球化的地方鄉愁文化、Castells 網絡社會與認同的力量、到之後 Woodward 等學者論述的離散認同，上述學者的論述發展脈絡來看，確實由文化、認同是恆定不變的本質論，逐漸承認認同與文化具有流變性，並以其概念作為對空間、社會、文化、歷史、經濟等範疇的再論述基礎。

姑且不論權力結構的操作與支配，以上述論述的發展脈絡來看當今國內在社會行動實踐的論述基礎，即可洞見行動論述對文化理論的疏離、缺乏溝通。其原因可能為將大多數的精力與時間投入至社會行動的實踐，或者僅在社會行動的計畫、制度或策略層面上進行設計上的調整，而缺乏關注論述發展脈動及導入新的理論概念，用以修正行動實踐的論述內容；即上層理論與底層論述之間具有溝通的斷層。然而在該計畫性策略、行動論述成為抵抗國家機器、資本剝削的社會結構中之價值時，確實再也難以進行論述修正的工程，因與社會、文化、政治結構緊密結合的狀況下，成為龐大複雜又互相緊密聯繫的結構。而在權力結構與經濟結構長期所塑造的二元對立論述方式，已然成為國內社會進行內部辯證的普遍意識，而缺乏對第三論述或多元論述的吸收、接受能力，也體現了國內在論述轉型與再實踐所面臨的困境。因此筆者期望藉由本文的分析辯證過程，以兼具論述性與經驗性的研究方法與架構，嘗試使文化理論與行動論述得以相互接觸；首先回顧城鄉、空間、認同相關論述之發展脈絡、具備對論述觀點的辯證基礎；而後進行地方田野變遷狀況的經驗調查與分析，試圖將經驗與理論結合。鄉愁式的社會行動論述的正當性與正確性可能必須重新被檢視，而不是以先驗的論述作為使用資源、投入社會實踐的動機與目標。

最後，或許在時空快速流變的現代性特徵下，所產生的各種現象，仍然具有某種力量使世界呈現著平衡的狀態；因此我們可有所為，也可無所為。猶如 Simmel 在〈大都會與精神生活〉一文中的結語：「既然這樣的力量已經從頭到尾結合在我們屬於其中的整個歷史生活之中，滲入了每一個轉瞬即逝的細胞，那麼，我們所能做的，不是抱怨或者寬恕，而只是去理解。」(Simmel, 2008: 102)

參考文獻

Castells,Manuel

2002《認同的力量》初版，夏鑄九、黃麗玲等譯，台北：唐山出版。

Crang, Mike

2008《文化地理學》初版，王志弘譯，台北：巨流出版。

Foucault, Michel

1999《規訓與懲罰》三版，劉北成、楊遠嬰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Harvey, David

2007《巴黎，現代性之都》初版，國立編譯館、黃煜文譯，台北：群學出版。

Harvey, David

2003《後現代的狀況》閻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出版。

Heidegger, Martin

1991〈建.居.思〉《建築現象學導論》，初版，台北，桂冠出版。

Hudong 互動百科

「時空壓縮」引自 [http :](http://www.hudong.com/wiki/%E6%97%B6%E7%A9%BA%E5%8E%8B%E7%BC%A9)

[//www.hudong.com/wiki/%E6%97%B6%E7%A9%BA%E5%8E%8B%E7%BC%A9](http://www.hudong.com/wiki/%E6%97%B6%E7%A9%BA%E5%8E%8B%E7%BC%A9)(搜尋日期 2012 年 4 月 29 日)

Peet, Richard

2005《現代地理思想》王志弘、張華蓀譯，初版，台北：群學出版。

Pred, Allan

1983〈結構歷程和地方-地方感和感覺結構的形成過程〉2002《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理論讀本》，增訂再版，許坤榮譯，台北：明文書局。

Robertson, Roland

2000《全球化－社會理論和全球文化》初版，梁光嚴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Simmel,Georg

2008〈大都會與精神生活〉《西方都市文化研究讀本-第二卷》朱生堅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91。

Tim Cresswell 著，王志弘、徐苔玲譯

2004《地方》初版，台北：群學出版。

Virinder S. Kalra,Raminder Kaur,John Hutnyk

2008《離散與混雜》初版，陳以新譯，台北，韋伯出版。

Wagner,Peter

2009《現代性的理論化之路》駱盈伶譯，台北：韋伯文化出版。

Woodward,Kathryn

2006《認同與差異》林文琪譯，台北：韋伯文化出版。

Yi-Fu Tuan

1998《經驗透視中的經驗和地方》潘桂成譯，台北：國立編譯館。

全人教育百寶箱

「地理-人文地理」引自

<http://hep.ccic.ntnu.edu.tw/browse2.php?s=1003>

(搜尋日期 2012 年 4 月 30 日)

江宗霖

2005〈歷史性場所的地景變遷與空間再結構過程- 台北市西門市場更新再利用案〉碩士論文，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何子安

2001〈以伊里亞斯組構(Figuration)理論看城鄉移民社區之形成策略以花蓮縣海西村台北市田尾社區為例〉碩士論文，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

李佳芳

2008〈朴子地區聚落發展與社會變遷之研究〉碩士論文，國立台南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

李謁政

2006〈台灣遭遇現代性的後果與社區總體營造的創造性修補〉《環境藝術期刊》(4)。

沈駿祥

2007〈空間與認同-太魯閣人認同建構的歷程〉碩士論文，國立東華大學民族發展研究所。

阮忠仁

2009《嘉義縣誌·卷二·沿革誌》嘉義縣，嘉義縣政府。

孟樊

2001《後現代的認同政治》，初版，台北：揚智文化。

林佑軒

2009〈花蓮瑞穗地區感官導向文化產業之研究- 一個身體感官導向的空間論述〉碩士論文，中原大學室內設計學系。

林玲如

2008〈高雄市草衙地區聚落發展與變遷之研究（終戰後—2006）〉碩士論文，國立台南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

姜蘭虹、黃禮強

2009〈日久他鄉是故鄉加拿大臺裔移民的心聲〉《中國地理學會會刊》(42)：25-42。

洪玉儒

2007〈遷移、嬗變與認同：從加州蒙特利公園市到聖蓋博谷華人移民社區之型塑(1965~2006)〉碩士論文，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

洪嘉瑜、銀慶貞

2008〈台灣人口遷移屬性與動機的變化〉《東吳經濟商學學報》(61)：31-66。

夏鑄九

1988〈空間形勢演變中之依賴與發展—台灣彰化平原的個案〉，《空間，歷史與社會》：165-232。

夏鑄九

2007〈台灣西海岸全球都會區域的形構〉2007年文化研究學會年會引言。

徐主驊

2010〈從地景觀點探討萬巒居民的地方認同〉碩士論文，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

張勝彥 吳文興 溫振華 戴寶村

1996《台灣開發史》初版，台北縣，空大。

郭柏秀

2007〈依附或割裂的地方經驗？台北市寶藏巖聚落的地方認同研究〉碩士論文，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陳心圍

2010〈跨界流動中的族群保存與跨文化認同建構之間的辯證拉據--以在台灣工作的馬來西亞華人為例〉碩士論文，輔仁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陳正茂

2003《台灣經濟發展史》台北縣，國家圖書館。

陳佩儀

2007〈近代都蘭部落社會變遷與地方自主性之發展〉碩士論文，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

陳彥文

2010〈頂山村聚落發展的歷史變遷〉碩士論文，國立台南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

陳淑美、張金鶚、陳建良

2004〈家戶遷移與居住品質變化關係之研究—台北縣市的實證分析〉《住宅學報》13(1)：51-74。

陳添壽 蔡泰山

2009《台灣經濟發展史》台北市，蘭台。

陳鈺淳

2010〈台灣 1.5 代年輕回流移民之適應與認同〉碩士論文，國立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研究所。

程超澤

1995《社會人口學》台北市，五南。

黃俊傑

1985〈光復後台灣的農業農村與農民：回顧與展望〉，《台灣地區社會變遷與文化發展》中國論壇。

黃崇憲

2010〈「現代性」的多義性／多重向度〉，收錄於《2010 文化研究學會年會「文化生意：重探符號／資本／權力的新關係」研討會》，台南：成功大學。

黃詩瑜

2011〈客家特色產業與地方發展：以銅鑼杭菊為例〉碩士論文，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

楊慶堃

1949〈中國近代空間距離之縮短〉《嶺南學報》 10(1)：151-161。

葉子香

2009〈文化的認同與變遷--以居住台灣的雲南人為例〉碩士論文，國立東吳大學社會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葉淑婷

2010〈台灣區域重大交通建設對家戶區域間遷移與住宅區位之聯合選擇決策〉碩士論文，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畫學系研究所。

靳燕玲

2010〈住宅改善與居住遷移行為--以經濟理性與社會關係雙元性觀點的解釋〉博士論文，國立台北大學都市計畫研究所。

廖正宏 黃俊傑

1992《戰後台灣農民價值取向的轉變》台北市，聯經。

翟振孝

2006〈遷移,文化與認同：緬華移民的社群建構與跨國網絡〉博士論文，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

劉立偉

2008〈社區營造的反思：城鄉差異的考量、都市發展的觀點、以及由下而上的理念探討〉《都市與計畫》35(4)：313-338。

劉憶萱

2008〈客家聚落之產業、地景與記憶變遷：以大湖草莓為例〉碩士論文，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

劉曜華

2004《台灣都市發展史》。

蔡宏進 廖正宏

1987《人口學》初版，台北：巨流出版。

蔡英文

2002《政治實踐與公共空間》，初版，台北：聯經出版。

戴佑純

2003〈一個沿海漁村的產業發展與生活空間研究-----以嘉義縣網寮為例〉碩士論文，南華大學環境與藝術研究所。

薛立敏、曾喜鵬、陳雅君

2002〈區域人口遷入台北都會區地點選擇之實證研究〉《住宅學報》11(2)：159-178。

薛立敏、曾喜鵬、謝鈺偉

2007〈台灣地區近年來遷移行為變化之影響因素分析—家戶遷移決策與遷移地點選擇之聯合估計〉《人口學刊》(34)：69-107。